

学术研究

XUESHU YANJIU



2

一九六五年

毛泽东思想是工人阶级力量的源泉	黄华庭 (1)
——创造发明63—101型电动夯墙机的体会	
我们怎样从实践中摸到圈猪积肥的规律?	新 牧 (8)
从必然到自由	黄友林 (12)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规律	杨 繁 (15)
——学习毛主席关于不断地总结经验的指示	
从徐寅生同志的“讲话”中学习辩证唯物论	林 临 (20)
略论生产新高潮的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	若 文 (24)
开展比学赶帮, 促进生产发展	黎定权 丘德良 (28)
——简述南海化肥厂是怎样追赶全国质量先进水平的?	
关于扩大第三类产品经营的一些问题	陈 庆 (33)
农作物良种经济效益问题初探	谭锦维 侯晓昌 (36)
“写中间人物”论是“暴露黑暗”论的翻版	蔡运桂 (43)
作家一定要有鲜明的态度	钟一鸣 (47)
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大力描写工农兵火热的斗争	林凤西 (50)
英雄人物的“现实性不足”吗?	文新兵 (52)
评李贽《忠义水浒传序》	黄海章 (55)
周谷城的艺术创作论的反动实质	毛 军 (59)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活动	师 东 (64)
贯穿着周谷城的《中国通史》(近代部分)的一条黑线	史 群 (71)
潮安县江东农业中学毕业生情况调查	管集调 (77)

动态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进一步发挥哲学课的战斗作用 (83)

——广州地区九所高等院校的哲学课教师座谈纪要

毛泽东思想是工人阶级力量的源泉

——创造发明 63—101 型电动夯墙机的体会

广东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黄华庭

63—101型夯墙机，是我们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斗争中，在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光辉思想的指导下的产物。在创造发明夯墙机的十年过程中，我们特别深刻地体会到“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我们工人阶级获得无穷智慧，获得战胜困难、有所作为的力量的源泉。

一 104 号图纸的诞生

我不是工程师，不是机械工人，也不是夯墙工人，而只是一个读了几个月书的木工。那么，我是怎样想起要创造夯墙机来呢？这得从头说起。

夯墙是潮汕地区建筑工程中最笨重的一个工种。它的使用范围很广，占整个建筑工程量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夯墙的主要优点是：所用的灰灰砂这种原材料，可以就地取材，价格较为低廉，生产工艺简单，质量较好。因此，夯墙在当前为解决民用建筑、包括农村广大农民的住房问题方面，是具有重要作用的。但是，由于人工夯墙的操作技术非常落后，一个工人站在墙板上，持着笨重的墙槌，工作八个小

时，弄得精疲力竭，一般只能夯半立方左右。因此夯墙工序常常拖着整个建筑工程进度的后腿。这就存在着当前生产的需要和夯墙工序操作方法落后、生产效率很低的矛盾，与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发展的要求极不适应，所以要充分发挥夯墙的优越性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必须改革操作技术，实行技术革命。

还在一九五三年，我带着木工小组参加某国防工地建设的时候，有一天，一位部队首长邀我去看夯墙，他指着在烈日下汗流夹背的夯墙工人兄弟对我说：“小鬼，你看了能过意吗？”当时我还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他接着说：“这种操作方法很古老，很费力，我自二里外就听到他们劳动发出的哼声，但一天还夯不到一个立方，你是先进工人，看了怎能无动于衷？”我说：“你要我怎么办？”首长说：“最好是创造出一部夯墙的机器来！”这话使我心中一震，感到确实应该用机器来代替人工夯墙，可是我却不敢想到由我来创造这种机器。等到了一九五四年，我到北京参观鞍钢技术改革展览会，听了许多创造发明的故事，并知道许多先进人物也都是普通工人，有的也只读过几年书，小学还没有毕业。我想起

那位部队首长对我說过的創造夯墙机的事情，心开始动起来。回来时路过武汉，又参观了电动砌砖机，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从此我就开始进行夯墙机的設計。可是我原是个木工，連图都不会画，加上許多人都說，机器夯墙是没有办法的，党委連年“出榜招賢”，也都沒人敢来接受这个任务。我就不敢公开的搞，只在暗地里“练基本功”，一方面学画图，一方面就进行設計。一直画到一九五七年，房子里堆滿了图纸，可就是沒有一张可以见人，不免动摇起来。我想，党委号召了好几年，全公司两千多职工，包括工程师、机械工、夯墙工，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认为不可能，我这个“三不是”，却想要来創造夯墙机，岂不是“狗抓耗子”？这样一想，也就停下来了。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形势下，党号召工人阶级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大搞技术革新。在党委的支持下，我又繼續进行夯墙机的設計工作。到这时，一共画了七十多张图纸。但因为都是“閉門造車”，脱离实际，全部报废了。但是我还是决心干下去。同时，由于夯墙工的缺乏，任务又紧，也給了我巨大的压力。不久，中共汕头市委宣传部組織先进工人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前，又听了领导同志作的有关《实践論》和《矛盾論》的学习报告。我过去也学过毛主席的著作，但因为学习方法不对头，沒有学到手。这以后，我就帶着解决創造夯墙机的問題去学习《实践論》。当我讀到“无论何人要認識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沒有法子解决的。”这一段話时，感到好象毛主席站在我的面前，对症下药地批評我过去“閉門造車”的錯誤。

我还从《实践論》中懂得：“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敗”的道理。用这个道理一对照自己，就发现过去画了許多图纸都失敗，主要的原因正是自己还不懂得夯墙工序的规律性。我接受这个批評，就背起包袱，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怀着从实践中去找寻夯墙的规律性的目的，到当时正在施工的潮阳华侨大厦工地去，和夯墙工人一起生活，一起劳动，有时和他們一样拿起墙槌，站在墙头夯墙。工人知道我們要研究用机器代替人工夯墙，都热情支持，但也有些夯墙工认为这是办不到的。有人說：“自盘古开天地，要有房子就要有墙，要有墙就要夯墙，要夯墙就要用墙槌，若是能改，还用等到现时？”我就請教他們：“別的工作可用机器，为什么夯墙就没办法？究竟困难在那里呢？就是不能做，也要找出一个究竟来。”他們說：“夯墙的困难多，別的机器可以放在地上开动，夯墙的‘墙路’（就是模板之間的宽度）只有二十公分宽，怎能放得下机器！再說，夯墙是在半天吊灯笼，机器一开动，岂不就連人帶机器一起掉下来。”他們还讲了許多夯墙操作的特点，如用力要均匀，下槌要魚鳞相接一槌压半槌，持槌要保持一定高度等等。經過这段時間的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之后，虽然发觉了用机器代替人工夯墙的許多难关，但也初步摸到了夯墙的一些规律，最后我总结出夯墙的两大特点和三大要求。两大特点是：一、操作场地有极大的限制；二、高空作业要绝对保証安全。三大要求是：一、冲程必須一致；二、必須一槌压半槌；三、冲击必須均匀密实。

这些特点和要求就成为我以后设计夯墙机器的主要依据。而这都是我过去“闭门造车”时所万万无法想到的。不过，只是摸到了这些规律，认识的过程还没有完结，更重要的是要运用已经认识了规律去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掌握这些规律来进行夯墙机的设计，因此，我在总结了夯墙的两大特点和三大要求之后，就把夯墙机的设计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夯机造型问题；（二）夯机锤击问题；（三）夯机移行问题。

在实践中，夯机造型是关键中的关键。我过去的設計所以一事无成，所以感到困难，也就是这个造型问题没有摸到门路。过去老是想着“墙路”只有二十公分宽，而要用机器夯，就得有动力，即使是用一点七瓩的马达，宽度也超过三十公分，马达放不下“墙路”，也就谈不上机器夯墙了。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我画的图纸，有的设计成象妇女舂碓一样，用人工来踩动，操作起来劳动强度还是很高，当然不行。我又曾从压路机得到启发，想做个大石轮，宽度可以放下“墙路”里，再以卷扬机放在墙头拉它走。当时觉得还不错，可是，夯墙要求有冲击力，才会均匀密实，用轮来压，灰砂只会象云片糕一样压成一层一层，质量不好。当然也不行。后来在电影里看到矿工开矿的电钻，联想起建筑业用的震荡器，我就想设计个可以拿在手上的机器，象电钻一样一下一下夯击。但计算起来这机器一百多公斤重，怎能够叫人拿着在墙上走呢？后来又想用皮带套在脖子上，我把这个设想告诉夯墙工人，有人说：“你的机器这样设计，不是来革命，是来要‘命’！”就是这样想来想去，始终没

有找到门路。现在，当我从参加夯墙劳动的实践中摸到了夯墙的规律之后，便初步解决了造型的设计了。因为我想人既然可以站在墙板上操作，不受“墙路”的限制，夯墙机自然也可以站在墙板上，就象人的两只脚那样，给夯机装四个轮子，利用墙板作为轨道，岂不是机器就可以不受“墙路”的限制，而且有了轨道，机器不就可以在墙上移行了吗？现在制成的夯墙机的动作有点象人，造型有点象小拖拉机的样子，就是这个缘故。造型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夯机锤击，也是一道难关。自一九五四年想创造夯墙机以后，我常常到外面参观，一有机会就研究各种各样的锤，画各种各样的锤。但这道关还是闯不过去。因为夯墙机的锤要求夯下去要与机身脱离关系，才能保证安全。如果锤不与机身分开，夯下去就要震动机身，使机器象蛤蟆一样在墙板上跳，就不能保证高空作业的安全。至于皮带锤虽然可以使机身不受震动，但没有管正，夯下去要摆动。其他象击轴锤、弹簧锤等等也都不合用。夯墙机的锤还要保证不论起点在什么高度，夯下去冲程要一致，不然每次加灰砂，墙渐渐夯高起来，冲程就要渐渐变短。以上考虑过的所有这些锤都不能适应夯墙的这一规律。后来还是在木工小组参加劳动时，看到组里革新的刨板机，受到了启发。因为木板的推进是由两个相夹的滚筒轮卷过去的，我设想把木板改为直竖，下面装上大锤，用滚筒轮卷动木板，再在木板被卷上去之后，两个滚筒自动移开一个，木板就自动落下来了，因为滚筒在任何时候转数都一样，木板被卷上去的行程也一样，夯

下去的冲程就一致了。这样，既可以保证夯击时不震动机身，也保证了任何时候夯击的冲程一致。

为了解决夯机移行这个问题，我研究了汽车、摩托车、三轮车、脚踏车、拖拉机……，后来还看了车床、刨床等机械运转的原理，都没有结果。按照夯墙的特点，夯机的移行必须是：（一）机器不能连续移行，必须跑一下，停一下，一直跑，锤夯下去就要在墙板中间拖着，机器就要损坏，锤击也就无力；（二）要保证一锤压半锤，形成鱼鳞状的夯面，每次移动的距离就不能超过锤的宽度：八厘米，而必须保证一停一夯，停时落锤，跑时起锤。这样，才能保证机器的稳定前进，保证安全，达到一锤压半锤，夯击有力，锤不拉墙。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做过几十次试验，做了好多设想，请教了好多有关人员。这中间经过多次的反复实践，最后才从活动吊车的棘轮的原理得到启发，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阶段的实践证明，人们如果不努力使自己的思想，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是休想使工作能得到预想的结果的。我就是在《实践论》的思想指导下，坚持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才初步总结出夯墙的特点和要求，克服了闭门造车的主观主义错误，经过了一百零三次的失败，才画出了第104号图纸，摸到了夯墙机创制的窍门，设计出夯墙机来。

二 技术革命的灵魂

事物的发展过程，总是充满着斗争的。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过程中，既有科

学实验的斗争，也有思想领域上的斗争。就我个人的思想来说，几乎是从立志要创造夯墙机那一天开始，就有两种思想在斗争。一种是：当我一想起夯墙工人兄弟还被束缚在落后的笨重的手工操作之中，想起我们的建筑工程常常被人工夯墙这个工序拖着后腿，想起党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号召，一种工人阶级的革命责任感，促使我立下雄心壮志，不创造出夯墙机，誓不罢休；另一种是，总觉得象我这样一个只读过七个月书、从来没有摸过机器的普通木工，能够闯过这道关吗？特别是碰到困难的时候，心里就不免犹豫起来。这两种思想的斗争，有时还是很剧烈的。实在说来，只是靠着毛泽东思想，靠着党委和群众的支持，我才真正树立起工人阶级的雄心壮志，才有力量闯过这一道一道的难关。

一九五九年五月，我画出了第104张图纸，同年七月一日才做成了夯墙机的模型。就在这时，又展开了另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夯墙机模型和图纸送到了公司的党委会和经理室，受到了党和行政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为了给模型作出进一步的科学鉴定，决定由公司的技术革新委员会进行研究讨论。当时，大多数工程技术人员都热情支持我们的创造发明，表示同意试制夯墙机，并对设计作了一些技术上的帮助，如校正夯锤重量的数据等等。但也有个别工程技术人员，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出发，不愿意承认工人的发明创造，害怕耻于我这样一个只读过七个月书的木工，真的制成了夯墙机，会使他丢脸，因此，在设计过程中，我五次向他请教，都遭到拒绝，现在，在公司技术革新委员会

研究夯墙机和討論試制时，作为委員的这个工程师又无理地再三反对試制，說什么他只能同意制成一部夯墙机的“展览品”。会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辯論，批評了他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最后他才算勉强同意試制。

夯墙机就在这位工程师举半只手的情形下通过了，正式开始試制。为了支持新事物的成长，党的领导大力支持，工人同志们不計报酬日夜苦战，他們都怀着一个心愿：只要能为夯墙机多出点力，就感到愉快。就这样連續苦战了两个月，终于把第一部夯墙机制造出来了。

夯墙机的創造基本成功了，这时，省委拍来了贺电，市委送来了贺信，全国好几种报纸和刊物发表了报道，登了照片，全国各兄弟单位也紛紛来信祝贺，有的单位还要求定货。这种情况引起了大家的議論，好几种人說好几种話。有的人好心好意地說：“华庭呀，一世人做这一件就够啦，出了名了，身体搞坏啦，該休息了！”也有人說：“汕头已經完成了历史任务，以后的发展是別人的事了。”夯墙机在汕头市工业专科学校校址建筑工地試产，质量不錯，有人就說：“人都搞瘦了，现在墙也夯出来了，以后就休息休息吧！”在这些議論面前，我也觉得有些話不是味道，但头脑也真的有点昏昏然。这时候我又重讀毛主席的著作，在《实践論》中讀到这样一段話：“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沒有完結，人們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認識也就永远沒有完結。”又讀到：“認識从实践始，經過实践得到了理論的認識，还須再回到实践去。認識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动的飞跃，更重

要的还須表现于从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重温毛主席的話，我更加清醒了，認識到这些議論都是錯誤的。我为什么能創造出夯墙机来？是党和毛主席教导的，现在只在工专建筑工地試产，大规模生产能不能适应还不知道，怎么就能說完成了历史任务？即使夯墙机在生产实践中經得起考驗，推广开去了，也不能因为这一点成就，就自滿自足起来，如果說这样就完成了历史任务，岂不是就会躺在荣誉上面，再也不能前进了么！这怎么能算是听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么一想，头脑也就冷靜了，認識到得了荣誉并不是目的，实现共产主义才是我們共产党人的最終目的。

在这一系列的思想斗争中，也就特別深刻体会到要技术革命，必須先有思想革命，要思想革命，就是要讀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是技术革命的靈魂。

三 我們还在不断革命中

在毛主席《实践論》的思想的指导下，我要求建立一个机械夯墙队，让我帶着机器到大南山华侨农场工地去实际施工，在实践中檢驗这刚刚出世的夯墙机。这个建議，得到了中共汕头市委和公司党委的同意和支持，便在一九六一年四月正式建队。这一年的秋天，全队开赴大南山农场施工。施工的第一天，六部机就搞坏了五部。当时工期很紧，工地个别技术干部就大挑毛病，說机器夯墙“咳嗽多过唱曲”。在这紧要关头，还是毛主席思想的力量使我坚持下来。毛主席在《实践論》中写道：

“人們經過失敗之後，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於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有了這種思想，我就懂得“失敗是成功之母”的道理。《矛盾論》中也說：“新陳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抵抗的規律。”我想，新的事物必然代替舊的事物，我搞革新，只要對黨、對人民、對革命、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有利，就是新生事物，就一定會成長。我一方面爭取幹部的支持，一方面以毛主席的思想教育機夯隊的工人，說明技術革命必定有複雜曲折的鬥爭，說明我們現在即使失敗了，能找出失敗的原因，也就是成績，堅定了機夯隊的同志的信心，同時又一手抓生產，為了完成工程任務，日里機器壞了，夜里趕修趕夯，以彌補工程的損失。通過這場施工，我們不僅提前七天完成整個工程任務，更重要的是肯定用機器夯牆是好的，也總結出試制的夯牆機的缺點：笨、重、粗、貴。笨就是機身太大，重就是每部機要二百多公斤，上下牆板要用起重機；粗是設計時理論分析還不足，用的是車床牙輪，加上操作不善，常要碰壞；貴是每部機的造價很高，影響將來推廣。

施工回來，我就根據工地再實踐中發現的新矛盾，提出了巧、輕、精、廉，與機器的缺點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這鬥爭是尖銳的。因為從笨、重、粗、貴變為巧、輕、精、廉，要解決一大堆矛盾，特別是在解決重的問題上，更加困難。在我們設計的時候，本來也是處處求輕，幾乎是一公分一公厘都計較的。我這樣計算：馬達三十五公斤，機座骨架四十公斤，夯錘三十五公斤，安全殼四十公斤，一共就一百

五十公斤了，機器的主要部件還沒有計算上去，怎能再減少呢？我問工人，機器多重就合適，他們說一百五十公斤以內，兩個人能扶上牆頭就行了。但是想來想去，矛盾重重：把機身改小，幾百個機件裝不進去；把錘改輕，冲击力又不够；把馬力改小，動力就不足。在這困難的時刻，工人兄弟們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他們說：“華庭呀！你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想不通呢？鉤不是由大大的一個掛在牆上變成小小的一個可以帶在手上嗎？”我想工人的話確有道理。我又聯系着這個問題去學習毛主席的《矛盾論》。毛主席說：“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着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毛主席給我指出了解決的辦法了，但要如何抓住這個主要矛盾呢？我想，機身這樣大，這樣重，除了馬達和夯錘不能改輕之外，就剩下馬達的轉數問題了。馬達是高速的，夯錘的夾輪是低速的，要把馬達的轉數變小幾十倍，就不得不大輪套小輪，一個套一個，齒輪多，軸心等零件也就多，機身裝不下，就不得不用鍊拉到座後。機身大，機座和外壳也就隨着大了。我這樣一步一步的分析，一步一步的追尋。終於發現了重是主要矛盾，而重又是從變速系統來的。主要矛盾抓住了，我就請教工人，請教書本，結果在一本制圖學中看到了蝸輪蝸杆的原理，可以減速幾十倍至百多倍。這道理本來很簡單，但我沒有用過，就去問機械工人，他們說這個辦法好，但蝸輪蝸杆摩擦大，會發熱，應該浸油，建議我把它設計成密封的，可以防止發熱，又不用老添油，還可防塵。這個主要矛盾解

决了，其他問題也就不难解决了。到一九六三年，我就画出新的图紙来，把过去变速系统中的几十个齿輪和机件改变成只有几个。这样，齿輪少，軸承也少，机座小，外壳也小，达到了巧、輕、精、廉。因为精了，机器更耐用；因为巧了，机身就小了，这样机重也就輕了，从原来的二百二十六公斤，減輕为一百一十五公斤，体积也比过去的縮小了三分之一；而且也便宜了，每部机的造价才相当于原来的一半左右。应当說，夯墙机的真正成功还是在一九六三年的十月一日，因此，夯墙机也就命名为63—101型。机器經過初步科学鉴定，效果很好，手工操作的夯墙质量試压强度是7—17#/公分²，机夯的质量达到17—27#/公分²，效率比手工操作也有很大的提高，一部机可頂十五个夯墙工人的劳动量。

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矛盾总是不断产生的。现在，我們碰到的新矛盾是夯墙机帶來的整个工序的革新問題，正如夯墙工人說的，我們有了夯墙机，

但整个工序却是“穿西装，戴竹笠。”为了使配套設備完整起来，我們现在还在不断革命，不断解决矛盾之中。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党委的領導和广大职工的支持以及技术人員的协助下，现在真正使夯墙工人兄弟从笨重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了。我們还必须不断实践，不断革命。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說：“毛主席常常告訴我們：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結。……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經驗，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創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論点，悲观的論点，无所作为和驕傲自滿的論点，都是錯誤的。”我做的和学的都很少，更没有什么可驕傲自滿。我一定永远听毛主席的話，戒驕戒躁，努力学习，繼續前进。我一定要干一輩子革命，学一輩子毛主席著作。

（杨秀根据口述紀录）

我們怎样从实践中摸到圈猪积肥的规律?

广东新会县畜牧局 新 牧

圈猪积肥是解决农田肥料的一项根本措施，也是促使养猪事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一九六四年，新会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经过反复的实践，逐步认识了圈猪积肥的重要性，找到了一系列的具体办法，因此，全县的圈猪积肥的推广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过去，我们也提倡过圈猪积肥，可是，大多数都是圈了又放，大圈大放，很不巩固。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一直不大清楚。一九六四年，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两篇文章，才初步领会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些基本道理。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我们过去没有圈猪积肥的实践，对于圈猪积肥，自然也没有什么正确的认识，许多问题，心里都是朦朦胧胧的。在群众中，对圈猪积肥也存在着争论，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们呢？对于“好”，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对于“不好”，也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反对。“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过去没有调查研究

硬要发言，也就只能作空洞无力的“一般号召”，不能使圈猪积肥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也不能具体地指导群众实际地解决圈猪积肥过程中所碰到的矛盾问题。群众大圈大放，那是很自然的。我们认识到，为了巩固地推广圈猪积肥，一定要改变工作作风，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蹲点，对圈猪积肥这件事情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才能了解到事情的本质和全貌，才能具体地指导群众的行动。

圈猪比不圈猪是不是能多积肥？许多群众有怀疑。我们也心中无数，讲不清楚。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亲身参加实践。我们到棠下公社中心大队的两个生产队去逐户逐栏清了两天肥，初步摸到了底。一个生产队，有私养猪十三头（公养猪未计），平均每天可积到猪屎猪尿二百二十二斤，平均每头每天十七斤。另一个生产队，有三十五头猪，平均每头每天可积猪屎四斤，猪尿八斤。去年四月，这个生产队未实行圈猪，全队四十七头猪，每天才积到猪屎一百一十斤，平均每头二点三斤，仅占圈猪积到的猪屎的一半左右，猪尿则全部流失了。一般说来，实行圈猪积肥，平均一头猪的肥料，可解决一亩半稻田一年所需的基肥。我们心中有了数，说起话来也就不会“口硬心软”了，也就能

說服其他生产队的群众实行圈猪积肥。群众认识到圈猪积集肥料多，对农业生产有很大好处，不但实行圈猪，而且养猪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实行多养猪，促进了养猪事业的发展。在蹲点的过程中，我們还和群众一起总结出圈猪积肥的一些其他的好处，如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节约开支；可以有保证拿到一笔肥料款，增加社员收入；可以避免生猪对农作物的损害；有利于搞好环境卫生等等。

圈猪能不能多积肥的问题，我們算是这样解决了。但是，生产队怎样才能收到肥料呢？我們在蹲点的过程中发现，要有合理的收肥办法。这是一个带关键性的问题。我們这里最初有两种收肥办法：第一种是按猪派交售肥任务，由社员担到生产队出售，按质分级论价；第二种是猪屎尿全部由生产队统一掌握使用，到猪养大上市之后，按照猪的重量付给肥料钱（每一百斤付给六至十元），或记回工分（每一百斤记回一百至一百五十个工分）。后来，有些地方采用私人圈猪后肥料归集体收集。由集体给固定报酬，并分一定比例的肥料给社员个人的办法。一般分三成肥料给社员，以适当解决社员自留地的用肥问题。经过实践比较，这种办法兼顾了集体和个人利益，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我們就在全县推广了这种收肥办法。

解决了圈猪能多积肥，怎样才能收到肥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圈猪积肥的全部问题。群众中还存在着圈猪不长膘的说法，这个问题不回答，群众还是不愿意把猪圈起来的。圈猪究竟能不能长膘？我們曾作过调查，有不少材料证明圈养猪能长膘，而且圈养之后，传染病减少，死亡率大大

下降。可是有的地方也发现有圈养猪不长膘，猪生癞等现象。这是一种矛盾现象。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猪栏比较干爽的，猪一般都长膘，肮脏不卫生的，猪多是生癞。这就引起我們注意到猪舍的构造问题。看起来，猪舍一定要建筑得合理，才能适应猪的生长发育的需要。有的猪舍是水泥地面，冬天冷冰冰的，猪睡不好；春夏天发潮，猪容易生癞；有的猪舍不通风，阳光晒不到，或者不能防寒，往往影响猪的健康；地面没有一定倾斜度的，猪尿不能流到尿池；过于倾斜，猪睡眠和大小便时又不方便。相反，那些通风好、阳光晒得进、有一定倾斜度、用碓砖铺地的猪栏，猪长得都很好。把这些感性印象集中起来，我们发现要把猪养好，既能多积肥又能多长膘，就要解决标准猪舍的问题。对于这个問題，我們起初也只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只是根据一些建筑得比较好的猪舍，概括成二十个字：冬暖夏凉，通风透光，日能晒，雨不淋，实用，耐用，经济。还有许多具体问题没有解决。一个猪舍大约是二十平方尺的面积，但如何建造却大有学问。我們不甚了解，就决定亲自参加建造标准猪舍的实践。但是，这时有的同志却不敢大胆实践，认为参加建猪舍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这就是要懂技术，不懂技术不能做。他们的思想上有二怕：一怕不会做，给人笑话；二怕弄坏材料，造成损失。为了解决这个思想上的矛盾，我們又学习《实践论》。体会到，要勇于实践，不是懂了才做，而是做了才懂。毛主席说：“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

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如果怕失败，不敢去做，那末，永远都不会做。在实践过程中，是可能遭到失败的，但这并不可怕。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帆风顺的，往往需要经历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失败才能获得成功。如果能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符合于外界的规律性，这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就能变失败为顺利。我们从毛主席说的，战争的领导者的“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穿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得到很多启示，觉得失败的教训也是很宝贵的。我们要尽量避免失败，但是不可能完全避免失败。若是失败了，就吸取教训，变失败为成功。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我们的思想开明了。至于在试建过程中弄坏了一些材料，我们规定从事业费内开支。这样就既解决了思想问题，又解决了实际问题。大家都放胆参加建猪舍了。后来，我们畜牧局经常下乡的十二个同志，个个都学会了建造标准猪舍的技术。同时，在自己实践的基础上，吸取一些好猪舍的优点，把标准猪舍的标准进一步概括成八要八不要。这就是：（一）门口要向南或向东，不要向北或向西；（二）上盖要前高后矮成“小金字”式样，不要前后盖密；（三）栏舍东面和南面要用竹栏围住，不要砌墙封密；（四）生猪睡觉的地方要用碯砖或沙灰板，不要用水泥或石板；（五）地面要内高外低，斜度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不要过于倾斜；（六）

天面要盖密，不要留运动场；（七）猪舍要有一个能装二百斤肥左右的肥池，不要浪费肥料；（八）猪舍最小要有二十个碯砖大，成“日”字形，不要过于狭窄成“日”字形。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又认识到，解决了猪舍问题，也还不等于全部解决了猪长膘的问题。因为同样的猪舍，有的猪长膘快，有的猪长膘慢。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过去实行放猪时，猪自由活动，生活所需的各种营养料，除依赖于人的供给外，还可以到处寻找。实行圈猪，猪的活动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一切营养料都要依赖于人们的喂饲，如果喂饲得不妥当，猪的生长自然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喂饲得当，适合于猪的生理发展的规律性，猪就长膘快，不合，猪就长得慢。圈猪以后，猪的生活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问题就在于我们要适应猪的生理特点，为它们创造有利的条件，促进猪的生长发育。

在蹲点的过程中，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解决了一些矛盾问题，这样，我们对圈猪积肥的认识逐步深化起来了，可以说是对圈猪积肥取得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这就是物质变精神。但是，取得对圈猪积肥的比较正确的认识，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它推广到群众中去。在推广圈猪积肥的先进经验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取得直接经验的问题，这就是要群众亲自来参加实践，大家一起来创造样板猪舍。我们在一个先进大队开了一个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社员群众的三结合，边提高思想，边明确要求，边实践，实地帮助生产队和社员研究如何选择建猪舍的地形，如何利用废旧材料，如何建标准猪

舍等問題。参加訓練班的人通过亲自实践，也就取得了亲身的經驗，回去后也就容易推广了。我們还开过評比会。在評比过程中，不但“动口”，有評有比，而且“动手”，参加評比的人都帶着工具，见到不合标准的猪舍，立即动手修建，使它合乎标准。在有的地方，还建造一、二間标准猪舍，作为示范。这是我們实行以点帶面的一些具体做法。

要推广标准猪舍这是肯定的。問題是怎样才能做到多快好省呢？我們从实践經驗中認識到最主要的是，要解决高标准和“穷”办法的矛盾。这就是要用“穷”办法达到高标准。因为如果建猪舍花費过大，那群众还是不愿意做的。所謂穷办法，也就是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尽量利用旧料废物。有的大队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經驗。建造猪舍沒有砖，就发动群众四处拾烂砖，挖取地下和河边的散砖，或用竹片圈栏，沒有瓦盖，就用竹木搭架，用蔗叶、葵叶、稻秆等結扎上盖；砌筑尿池所用的水泥和石灰，則由生产队购买，作为生产队的基建投資。所用的沙也由生产队派人到外地挖运回来。建筑猪舍所用的資金，主要靠自筹，自筹有困难的，实行互通有无，或

由信用社貸款。这也是如何从实际出发的問題。过去，我們曾和一些生产队干部一起建猪舍，但用的全是新材新料，成本高，猪舍建是建起来了，但群众却认为这种办法行不通，没有什么示范作用。我們吸取了經驗教訓，用“穷”办法，走群众路綫，事情就好办了。

随着不断的实践，我們不断的发现了矛盾，又不断地在实践的基础上解决这些矛盾，这样，我們对圈猪积肥的認識也就不断深化起来。我們这里的同志有这样的讲法：“听过不如见过，见过不如做过，少做不如多做。”这确是有道理的。毛主席說：“一个正确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認識，由認識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我們作了一些实践，取得一些比較正确的認識，但并不等于認識了圈猪积肥的全部規律性了。还有許多問題我們还是未認識到的，何况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还会出现新的問題。所以，我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不断地总结經驗的指示，不断地在实践的基础上积累自己的直接經驗和消化間接經驗，不断解决圈猪积肥过程中所碰到的新問題。

从必然到自由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某部 黄友林

任何事物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必然性即规律性；人们通过实践认识了事物的规律性，并在实践中学会运用规律，使主观符合客观，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才是真正的自由，违反必然就没有自由。正确认识必然和自由的关系，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必然王国的领域是无限广阔的，它的发展又是没有止境的。所以在我们的各项工作中，不管取得多大的成绩，也不能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必须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加深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扩大自由王国的范围。

我国制造一万二千吨水压机成功，标志着我国机器制造业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跃进了一大步。过去，我国因为没有这种大型的锻造设备，不少重型机械上的大锻件，例如大型轧钢机上的轧辊、大功率柴油机上的曲轴、制造化肥的大型设备上的高压容器、大型汽轮发电机上的主轴……都无法自己供应，需要仰求于人。甚至制造一台很普通的几千瓩的汽轮发电机，也要向国外购买锻件毛坯来加工。人家给我们多少锻件，我们就只能制造多少

机器。有些国家还卡住我们的喉咙，不愿意多卖给我们。但在党和毛主席提出的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鼓舞下，我国的工人阶级化了四年多的努力，经过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再试验、直到成功这样一个艰苦的历程，终于初步掌握了制造万吨级水压机的规律，成功地制造了第一台一万二千吨水压机，能够解决国民经济各部门，特别是发电、冶金、化学、机械和国防等工业部门所需的特大锻件，并为今后制造这种特重型的设备打下了物质技术基础。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东西没有认识到。中共江南造船厂委员会在经验总结中说得好：“这台大机器是不是尽善尽美呢？不！还有毛病。……大水压机算什么？在机器制造业中不过是沧海一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把设计和制造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应用到今后工作中去。”所以一定要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才能在今后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不象江南造船厂的干部和工人那样。他们取得了一点成绩，积累了一点知识，就自以为了不得，随之而来的是又懒又骄。对已经认识的事物，不能够深入再深入，熟悉再熟悉；对没有进入的领域，又缺乏反复实践、反复探

索的精神，結果在新的形勢面前，輕則碰釘子，重則摔跤子。我就有過這方面的教訓，長期在部隊的機關工作，有了一些成績，聽到一些贊揚，就逐漸背上了“年輕有為”的包袱，後來組織上又送我進政治學校學習三年，更覺得自己懂得了不少，對部隊實際問題的研究放鬆了，對自我改造也抓得不如以前緊。正如毛主席所說：“有許多的東西，只要我們對它們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覺性，就可能成為我們的包袱，成為我們的負擔”。（《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51頁）確實，一個人如果缺乏應有的革命精神和科學態度，總是可以找到一點驕傲的資本的。人們走路，要是背上有個大包袱，路是走不遠，甚至走不動的。使我感到非放下這個驕傲自滿包袱不可，是在去年下放到連隊當兵和代職以後。初到連隊時，對怎樣堅持四個第一的問題，怎麼改造後進戰士的問題，也能說出一套方針原則來，但具體做起来却常常碰釘子。在碰了釘子後，我的頭腦開始冷靜下來，想到自己雖然有一些基本理論知識，卻沒有和連隊工作實際很好地結合起來，對連隊工作的規律仍然停留在抽象的了解上，並沒有真正地認識這個客觀規律。吃一塹長一智，後來就注意從正反兩個方面來總結經驗，並虛心向連隊的幹部和戰士學習，經過一段時期的摸索，才初步掌握了一些工作規律，工作起來也就比較得心應手，工作也就做出了一點成績。在各級領導的幫助和許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終於使一個老後進連隊進入了四好連隊的行列。

回憶自己的教訓，對照江南造船廠的經驗，學習毛主席的教導，使我進一步体会到：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不

可能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實現的。從必然王國的廣度和深度來看，也可以說是一個永無止境的过程。對於我們不熟悉的事物，我們要認真地細致地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去熟悉它；對於我們已經熟悉的事物，我們要逐步深入、精益求精，去探索新的規律和新的特點，使我們取得更大的自由。

自由是認識和實踐的統一。自由之取得有兩個要點：第一，認識必然性；第二，單是認識還不夠，還要利用必然性，加以主觀努力，支配客觀規律，改造社會，征服自然界，才有自由。

怎樣才能很好地認識客觀必然性，掌握客觀規律呢？這裡的關鍵是反復實踐，調查研究。實踐是人們能動地改造世界的过程，也是認識客觀規律或必然性的过程。不能等待認識了規律之後再行動，而是要在行動中去認識規律或必然性。客觀規律或必然性總是在人的實踐中被發現的，只有在實踐中不斷的總結經驗教訓，對在實踐中所獲得的感性材料進行科學分析，才能認識和掌握規律。

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一個反復實踐，反復鬥爭的过程，決不是簡單地一下子就能辦到的。由於我們受到時間、地點和其他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在認識和改造客觀事物的實踐过程中，要遇到這種或那種困難，要發生這類或那類問題，要犯這樣或那樣錯誤，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實踐證明了我們某種思想、理論、計劃、方案的正確性，也決不等於我們的認識已經達到了盡善盡美的地步，更不等於我們已經窮盡了客觀真理。在軍事上沒有事實上的常勝將軍，在工作中也沒有永遠

不犯錯誤的人，重要的是不斷通過調查研究來總結經驗教訓，和在实际斗争中吸取經驗教訓。成功的經驗，證明我們的行動是合乎規律的，應當發揚；失敗的教訓，證明我們的行動是違反規律的，應當避免。經過這樣的總結，在第二次的實踐中就比第一次要自由得多了。總之，從必然到自由，不僅是個認識問題，而且是個實踐問題。我們要把認識了的自由用到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樣無限的循環往復，我們對客觀規律的認識就會一次比一次正確、深刻，我們的行動也就越來越自由。

我們在認識必然與自由的關係時，必須克服對自由的兩種錯誤觀點：第一，是把自由看做毫無拘束，為所欲為，隨心所欲，不以必然性為前提的主觀唯心主義。第二，是把必然性看做自由的否定，而忽視了主觀能動性的絕對客觀主義。前者在實踐上必然陷入“左”傾盲動，後者在實踐上必然陷入右傾保守。

這兩種傾向，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是常常要碰到的。有一種人，主觀願望是好的，熱情是高的。但就是缺乏科學的思想方法，缺乏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常常不顧客觀的必然性，想怎樣做就怎樣做，以為這才是自由，其實這不是什麼自由，恰恰是一種主觀盲目性，這種主觀盲目性只能把人的行動引導到最不自由的境地，把好事辦成壞事。另一種人，則一味強調客觀困難，“見物不見人”，片面地把客觀條件對人的行動的約束誇大到了不適當的地步，結果就否認了主觀能動性，對於那些經過主觀努力能夠辦到的事也不積極設法去辦，變成了右傾保守主義者。這兩種傾

向，對於黨的事業都是同樣不利的；在思想方法上，都是主觀和客觀相分裂，都是做了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隸。

必然與自由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因此，真正的自由不是完全主觀的與毫無拘束的，而是認識客觀規律，並在實踐的基礎上運用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來改造世界，以達到預期的成功。否認客觀條件，否認客觀規律，我們的行動就失去了任何客觀依據，只能是盲目的瞎撞，而盲目瞎撞是註定要失敗的。另一方面，又不能把客觀規律絕對化，認為人們在客觀面前是無能為力的。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所獲得的巨大成績，並不是大自然的恩賜，正是由於逐步認識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了人民群眾主觀能動性的結果。當然，這絕不是說，我們已完全掌握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我們對於這些客觀規律的認識過程已經結束了。事實上，在我們面前，仍然有很多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領域，還有很多很多不熟悉的事物。這就是在我們實際工作中還不可避免的產生缺點和錯誤的最基本原因。因此，我們要通过實踐去努力探求，逐步“攻克”那無窮无尽的必然王國。我們要把革命精神和科學精神很好地結合起來，不斷深入地去認識客觀規律，並依據客觀規律積極地、主動地改造客觀世界。我們必須牢記毛主席的教導：“……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

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規律

——學習毛主席關於不斷地總結經驗的指示

楊 繁

“毛主席常常告訴我們：人類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內，階級鬥爭不會完結。在無階級存在的社會內，新與舊、正確與錯誤之間的鬥爭永遠不會完結。在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範圍內，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其所以是錯誤，因為這些論點，不符合大約一百萬年以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事實，也不符合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體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種自然科學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歷史事實。”

——摘自周恩來總理：《政府工作報告》

毛主席的關於不斷地總結經驗的指示，正確地概括了人類對於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規律。這個指示有着強烈的理論性和戰鬥性，在理論上，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在實踐上，則有無可估量的巨大的指導意義。目前，我們正在緊張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是一個偉大的而又是嶄新的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革命事業。經過解放以來十多年的實踐，我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逐步地認識和掌握了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客觀規律，但是，在我們面前，還有許多個很大很大的“必然王國”，即是有許多個很大很大的沒有被認識的領域和很多很多不熟悉的事物。我們必須一個一個地攻克這些“必然王國”，變為“自由王國”，以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徹底勝利。認真地學習毛主席的關於人類的歷史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的原理，學習毛主席的關於不斷地總結經驗的指示，正是完成我們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的鎖鑰。

毛主席說：“无产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实践論》）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是密切相連的，要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而主观世界改造得愈好，客观世界才能改造得愈好。这也就是說，要解决必然和自由的关系，使必然轉化为自由。所謂必然，就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規律性。所謂自由，不仅是对規律的認識，对必然的認識，更重要的是要拿对必然的認識，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实践中善于运用規律，取得預想的結果，才有真正的自由。客观規律在沒有被人們認識以前，是自發地起着作用的，人們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完全受到客观規律的支配，成为客观規律的奴隶。人們通过不断的实践，認識了客观規律，只是表明了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开始取得主动权，还不是真正自由的。如果不善于把对必然的認識，运用于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并取得預想的結果，那末可以說，必然性还没有轉化为自由。通过实践，認識了必然性，这只是認識过程的一个阶段，这只是物质变精神的阶段，只是完成了第一个飞跃，整个認識过程还没有完成。这不仅是因为人們認識世界的目的正在于改造世界，如果認識不是为了实践，那是沒有意义的；而且物质变精神的阶段得到的認識，是不是正确，还需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因此，还要有另一个阶段，即精神变物质的阶段，也就是自觉地、能动地改造世界的阶段，完成認識过程的第二个飞跃。只有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才能認識必然，而且只有在运用認識了的必然去进一步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取得了預想的結果，証明主观符合客观，才能是自由的。必然性要辯証地轉化为自由，需要經過实践、認識、再实践、再認識的过程，也就是要經歷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必然性辯証地轉化为自由，其关键就是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經驗。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最初，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許多事物的規律性都不了解，因而不得不受到自然界和社会的奴役。只是經過了长期的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尝过了許許多多苦头，經歷了无数次的失敗，才逐步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規律有所認識，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較多。人类最初制造了石头工具和发明了火的使用，就是对自然界的必然性能够加以認識并由此取得支配自然界的自由的第一步，随着生产的向前发展，人类支配自然界的自由日益扩大。在社会生活中，过去长时期都受着自发的盲目的必然性所支配。当人們还不懂得階級和階級斗争的規律性时，被压迫、被剝削的階級，虽然也不断进行反对统治階級的斗争，却始終沒有摆脱社会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沉重鐐铐。到了近代大工业的出現，产生了无产階級，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无产階級的和历史的階級斗争經驗，制定了階級斗争的科学理論，用以武装无产階級，无产階級才認識了社会发展規律和本階級的历史使命，从而使无产階級从“自在的階級”变为“自为的階級”。这样，人們在自己的社会生活方面才开始脱离了盲目的必然性的支配，通过自觉的革命实践，逐渐变成社会的主人。

无产階級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这是人类由必然王国进

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在社会主义时代，社会的力量和自然的力量，已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听凭人们的使唤，使它更多地服从于人们的意志。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所能创造的生产力，最后总象恶魔似的统治者，反过来又把他們自己吃掉。只有在无产阶级手里，强大的生产力才“从恶魔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由此可见，我们的时代是大有作为的时代，无产阶级将比生活在旧时代的劳动人民前进得更快，将以一天等于过去二十年的速度，迈开了自己雄健的步伐。

社会主义的时代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于自由王国飞跃的时代，但是不要认为人們就沒有盲目性了，不要认为这个飞跃就是结束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了。不，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我们还要不断地去提高自觉性，反对盲目性。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运动是不断的，永远沒有完结的，因而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发展，也是永远沒有完结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势力企图复辟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和旧社会的阶级斗争是不一样的，它有新的特点和新的形式。虽然，我們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能够进行自觉的阶级斗争，但是如果不懂得阶级斗争的新的特点、新的形式，不懂得阶级斗争的新的方法，那还是不行的。这是一个新的课题，还需要有一个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矛盾的性质完全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应当完全不同。如何正确地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也是新的课题，需要有一个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斗争，也有它的新的规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充分说明，它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是我們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一个标志。这表明我们能够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性，利用它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但是，这也不等于說，我們已經完全地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問題上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历史完结了。社会主义的許多经济规律，都是客观地在起着作用的，如何进一步认识和运用这些规律，以比西方资产阶级較短的时间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也需要一个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发展的过程。总之，在我們面前，还有許多許多个很大很大的未被认识的領域，还有很多很多的不熟悉的事物。旧的領域认识了，新的未被认识的領域又产生了。旧的事物熟悉了，新的事物又产生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总是处在不断变化、永不停息的长河中，人們的认识也要不断发展，不断深化，永无止境。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剥削，消灭了阶级，也并不等于說，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终结了。在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矛盾仍然是存在着的。人們必然要通过不断的实践来认识 and 解决这些矛盾。而且在生产斗争的范围内，自然界也不是被人们完全地、绝对地认识了，同样存在許多必然王国。总之，只要世界上存在矛盾，解决矛盾的斗争就永远不会完结，人类从必然

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也就不会完结。

既然，人类的历史是一个永不完結的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社会和自然界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因此，我們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創造、有所前进。但是，我們怎样去实现这个目标，怎样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呢？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实践和認識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这个过程的延长或縮短，取决于許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在实践中善于总结經驗。

要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就是要解决客观規律和主观認識的矛盾。唯一的办法是通过实践，并在实践中总结經驗。实践是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的基础，而总结經驗則是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的阶梯。所謂实践，就是群众的实践，所謂經驗，就是群众的經驗，要取得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就要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道参加階級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然后将群众实践的經驗集中起来，总结起来，变成系統的理性的东西。这就是說，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創造，有所前进。当然，我們不能事事都直接經驗，經驗是有間接經驗和直接經驗两种，这两种經驗都成为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在一件新的、重要的事情开始而还没有經驗的时候，我們就必须亲自参加实践，解剖麻雀，以取得直接的經驗。因为没有直接的經驗，就不可能很好地接受間接的經驗，而且，就人类認識的秩序來說，是从直接經驗开始的。

我們要象毛主席一再指示的那样，經常地、不断地总结經驗，做了一段工作，就要总结这一段工作的經驗，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經驗，对于我們不熟悉的事物，要认真地、細致地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去熟悉它。我們做工作，就是解决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要求我們不断地去解决矛盾。我們做工作是一段一段地做的，我們也要一段一段地总结經驗，做了一小段，就要小总结，做了一大段，就要大总结，决不能經過很长很长的時間，做了許許多多的工作，才来作籠統的总结，这样去总结經驗，必然事倍功半，花費的“代价”很大，同时問題多了，要真正認識客观事物的規律性也有更大的困难。只有一段段总结工作，一个个解剖具体的矛盾，才能及时发现新的事物，及时发现群众的創造。因为新事物的萌芽总是隐藏在每一个具体事物之中的，而且，每一个矛盾之間是互相联結的，互相影响的，只有分析了每一个具体矛盾，才能够全体上掌握客观事物的規律，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因为客观規律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它在整个过程之中的每一个具体环节上表現出来，看了一段，有时是認識不到規律的，要逐段逐段地看，經過几次反复，才能把規律認識出来。同时上一段工作和下一段工作是互相銜接的，往往要总结了上一段工作的經驗，才有可能找到做好下一段工作的方法。总之，我們的实践是不断的，認識也是不断的，做一段工作，总结一段經驗，这就如同毛主席說的：“实践、認識、再实践、再認識，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認識之每一循环的內容，都比較地进到了高一級的程度。”（《实践論》）

在总结經驗的时候，必須运用“一分为二”的辯証分析方法。人們的实践一般不是一下子就正确，一次就取得成功的。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是很可能犯錯誤的，很可能遭到失敗的。而且有的事情，在这方面是成功的，而在另一方面却是失敗的。因此，人們要認識和运用客观規律，就要有一个过程，既要有正面的、成功的經驗，也要有反面的、失敗的經驗。有了正面的、成功的經驗，又有了反面的、失敗的經驗，經過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經過正面和反面的曲折发展，反复实践，反复学习，认真研究，才会使人們看問題、認識事物比較全面，才能够逐步地使自己的認識合乎客观的規律。应当看到，丰富的經驗是逐步积累起来的。人們在階級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积累和总结起来的正面的、成功的和反面的、失敗的經驗愈多，就愈能預料到实践所产生的間接的較远的自然后果和社会后果，就愈能在更大的程度上認識、掌握和运用客观規律。那种只看到成績和成功的一面，而看不到缺点和失敗的一面，就自以为是，驕傲自滿的人是錯誤的；同样，只看到缺点和失敗的一面，看不到成績和成功的一面，就垂头丧气，悲观失望的人，也是錯誤的。这两种人都存有片面性，因而都不懂得总结經驗，都不可能認識事物的必然性，都不可能摆脱盲目性的支配，使自己变成自由的人。

我們的时代，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时代，是大有作为的时代，摆在我們面前，还有最伟大的任务——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需要我們去完成。而現在一个新的革命和建設的高潮已經形成。在这个革命时代，在这个高潮时期，我們必須結合自己的实践，认真地学习毛主席关于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科学原理，认真地学习毛主席关于不断地总结經驗的指示，发扬敢于革命、敢于前进的精神，反对停止的論点、悲观的論点、无所作为和驕傲自滿的論点，发扬高度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地去总结經驗，提高自觉性，反对盲目性，力求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創造，有所前进，逐步地認識和掌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規律，推动着时代的車輪飞速地前进！

从徐寅生同志的“讲话”中 学习辩证唯物论

林 临

徐寅生同志《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是一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好作品，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值得我们认真地反复地学习。

徐寅生同志从自己的成功与失败的实践中认识了“为革命而打球”的道理。他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做到“身在球场，心怀祖国，放眼世界”，敢拼敢闯，用大无畏的精神，攀登世界体育高峰，为祖国争光。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志气。他的这种凌云壮志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他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这种革命志气，不经过斗争的锻炼和日积月累的平时努力，是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徐寅生同志说得好：“雄心壮志要靠平时努力”，“有些人平时不注意改造思想，不注意培养意志，以为到了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其实，这种‘勇敢’是空架子，没有坚实的后盾。”无数人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正确的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有在严酷的斗争中才能锻炼出坚强的革命意志，才能锻炼出革命的才干，离开实践斗争，坐在房子里苦思冥想，是决不能有什么革命决心、革命才干的。

徐寅生同志还说过，“不应该害怕过硬，不要把思想过硬看得高不可攀”。所谓思想过硬，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思想武装起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所谓不要害怕过硬，就是说，只要善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断地在革命实践中锻炼自己，最大限度地“拼”掉、“搏”掉自己的个人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可以学得到的，思想过硬是可以办得到的。徐寅生同志是思想过硬的榜样，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榜样，他说：“我们学毛主席著作……要把毛主席的话想想如何用在我們打球上。如果嘴里讲的尽是毛主席的话，却一点不联系我们的实际，那样的人学了有什么用呢？”徐寅生同志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实践，在实践中进一步领会了毛泽东思想，树立了“为革命而打球”的信念，这样，他的思想就过硬了。思想过硬，技术过硬也就有了“坚实的后盾”。

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者看来，不但思想过硬不是“高不可攀”，而且任何事物也不是“高不可攀”的。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无高不可攀”。徐寅生同志说得对：“一个革命者，必须心怀大志，不断革命；一个运动员，要想为祖国争光，就要树立攀登世界高峰的远

大目标。”“高不可攀”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停止的論点，悲观的論点一旦在人的头脑中发生作用，那末，人們就会无所作为。从認識論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認識的事物，而只有尚未被認識的事物，我們通过不断的实践，就可以認識事物的規律性，并运用这种認識反过来能动地指导自己的实践，从而得到預期的結果。旧中国由于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統治，所以在許多領域內都是很落后的。解放十五年来，我們在各方面虽然都有了輝煌的发展和进步，达到了可观的水平，但是我們还要繼續前进，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現代化，赶上和超过帝国主义国家，在各个領域內攀登世界高峰。我們一定能够赶上和超过資本主义国家。这是說得出就做得到的。我們的原子弹不是爆炸成功了嗎？一万二千吨的水压机不是制造成功了嗎？西方資產階級能够做到的，我們也一定能够做到。別人有的，我們要有，別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这是历史賦予我們无产階級革命者的使命。西方資產階級，在一些科学技术方面，目前虽然比我們“高”，但是，他們这个“高”是植根在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之上的；我們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我們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領導，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六亿多的革命人民，这是一股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无比坚实伟大的力量，凭着这股力量，我們完全能够做出許許多多惊天动地的事情，赶上和超过西方資本主义国家。西方資本主义国家現在所拥有的“高”，并不是固定的、不变的，我們現在的“低”，也不是固定的、不变的，只要我們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奋斗，我們就可以迎头赶上，后来居上。我們一定要树起雄心壮志，一定要在各个領域內攀登世界高峰。相对于科学技术的世界高峰來說，在一些領域內，我們的水平可以說是低的，但是，“高”和“低”的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轉化的。今天是“高”的东西，明天可以轉化为“低”的东西，今天是“低”的东西，明天也可以轉化为“高”的东西。不断地由低而高地发展，是事物发展的規律。我們認識了这个規律，还一定要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具体地分析情况，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解决主要矛盾，不断地解决一个問題又一个問題，这样才能創造条件达到轉低为高的目的。这也就是徐寅生同志說的“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的道理。

但是，只有敢于“攀高”的思想，并不等于实际地解决了“攀高”的問題，這個問題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解决。敢于攀高的問題，不仅是思想認識問題，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問題。敢于“攀高”是和勇于实践，敢拼敢闖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敢拼敢闖，勇于实践，人們才能有所作为。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是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人的实践也就不能老是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打乒乓球的技术就是不断发展的。就拿徐寅生同志的經歷來說，他的技术也不是一开始就过得硬的。他的技术現在已有較高的水平，但是他仍然不断磨煉。他还說，他的对手的技术也在进步。为了战胜对手，不繼續前进是不行的。所以，勇于实践，是要用革命精神去实践，不断地探索事物发展的規律性，不断地破旧創新，破除一切框框，一浪高过一浪地前进。永远不要把“現狀”凝固化，不要把已达到的水平当作是不可再高的水平。許多农村和工厂的經驗告訴我們，生产能不能“突”上去，

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人敢不敢“攀高”，敢不敢做革命的闖将。增产到頂論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它把已經达到的指标看作是固定的、不变的，沒有看到最活跃、最革命的生产力——人的因素，也看不到其他条件的变化。我們一定要做革命的闖将，不做无所作为的庸人。我們一定要大破庸人哲学，树立敢于攀高的思想。在敢于“攀高”的思想指导下，我們就能敢拼敢闖，不断克服前进过程中所碰到的困难，这样才能变低产为高产，变高产为更高产。說勇于实践，敢拼敢闖，并不是要盲目地拼、盲目地闖，而是要善于实践。这就要解决向哪里用气力，怎样用气力的問題。徐寅生同志打球所以打得好，就是因为他能够运用辯証唯物論，具体分析“敌情”，不断提高技术，灵活使用战术，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徐寅生同志和其他許多先进地区和单位的經驗都告訴我們：要在学习和掌握唯物論和辯証法方面去用气力，要在按照唯物論和辯証法进行实践方面去用气力。唯物辯証法之所以无往而不胜，就是在于它用不断革命的思想鼓舞人們勇往直前，指引人們按照客观規律發揮主观能动性，指示人們集中力量解决关键問題。毛主席說过：“世界上只有唯心論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們瞎說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論和辯証法則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論和形而上学方面去。”（轉引自《人民日报》1965年3月14日社論：《做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愚公》）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虽是省力，但却不能把事情做好，祇能把事情办得很坏。徐寅生同志批評女乒乓球運動員的“练这不管那”、“思想上只考虑一种情况，准备一种打法”，不从实战出发，等等，指的都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徐寅生同志談的是打乒乓球的情况，但他指出的这些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和片面的、孤立的、靜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在我們許多人的工作中也是經常反映出来的。我們一定要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

当然，要按照唯物論和辯証法进行实践，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它需要在实践、認識、再实践、再認識的过程中才能学会，这就需要我們善于总结經驗。在这方面，徐寅生同志也是我們的一个好榜样。他在《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中，总结了乒乓球比賽的經驗，指出了我国乒乓球運動員和主要对手双方的情况，他們之間斗争的辯証法，說明了我国乒乓球運動員的战略战术和訓練方向。善于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經驗，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只有善于总结实践的經驗，才能使人們認識事物的規律性，并运用这种对規律性的認識，反过来指导自己的实践，以求取得預期的結果。徐寅生同志說：“一九六二年訪問日本，在东京团体赛中我們輸了。那以后我老想着东京的比赛，哪些地方吃了亏，一定要根据对手的特点，练出一套有效的技术，而且思想要过硬。拿起球板就想起这件事，躺在床上也想着这件事。特别是荻村，在东京比赛时他的技术發揮得很好，比木村、三木难对付。我决心一定要逐条逐条地破他。从破他的发球直到破他的放高球。因为这样每天留心，有目的地去练习，所以当領導上要我出场参加决赛时，我也有比較强的信心。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决赛时也就比較順利地获胜了。”規律性，是全局性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見的，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把丰富的感性認識認真地用腦子

思考，才能掌握到。由于人的实践往往是通过許多失敗和錯誤，才走向成功和正确的，这就要求我們善于总结經驗。对实践进行一分为二的辯証分析，要从失敗中找出成功的因素，从成功中看到缺点的一面，不断地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不断地使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样才能使人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創造，有所前进。

我們进行生产斗争，向大自然开战，也需要不断地总结經驗。一万二千吨水压机的制造成功，就是由于参加設計和制造的同志們能够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經驗。临沂地区的人民經過不断实践，总结出改造洼地的重要經驗。他們从反复实践中認識到，要治水就要同时治山。他們从本地情况和条件出发，找到了当地农业生产不稳定的关键，从山、林、水、田相互联系、相互制約的关系中抓到主要矛盾，制定了綜合治理方案。这样的認識是用很大的气力才得到的。这就是要經過反复的实践，不断总结，不断地对片面地孤立地看問題的毛病作斗争。这个指导思想和方案經過实践的考验和修正，証明是符合唯物辯証法的，是正确的，因而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任何人要对事物具有“真知灼見”，都必須总结自己的經驗。徐寅生同志如果不总结他和获村比赛的經驗，他就不能認識彼此之間的技术特点，更不能有什么針鋒相对地对付获村的战术，从而也不能取得什么胜利。設計和制造一万二千吨水压机的同志們，如果不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經驗，而靠“洋本本”来过日子，那末，一万二千吨的水压机肯定是制造不出来的。同样，临沂地区的同志如果不是总结自己的經驗，找到了符合唯物辯証法的方案，那他們也肯定不能摆脱那种只是旱了抗旱，涝了排涝，既怕旱，又怕涝，永远打被动战的局面。許多事情都說明：只有善于总结，才能善于实践。

一个人革命一輩子，也就是一輩子实践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之中，而一个人在一辈子的实践过程中，又总是既有成功，又有失敗，既有教訓，又有經驗。凡是事情做成功了，主要的总是因为他是按照唯物辯証法的思想行事，凡是事情做失敗了，主要的总是因为他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所謂善于总结，也就是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学习到更多的唯物辯証法的东西，逐步清除自己思想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使自己的实践成为唯物辯証法思想指导下的实践。这就是徐寅生同志能够不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也是一切革命者能够不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

略論生产新高潮的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

若 文

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目前正在我国的城市和农村，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形式出现和发展着。这次生产新高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基本完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任务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全面好转的必然趋势；是深入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群众的阶级觉悟普遍提高的必然趋势；也是胜利地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必然趋势。应当看到所有这些都是当前生产新高潮出现的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充分地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正确估计形势，在组织生产新高潮的行动中，走在形势的前头，取得主动权。

大家知道，一九五八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飞跃。正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光辉的指引下，我国实现了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的国民经济大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从一九六一年起，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经过这几年的伟大实践，我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了，这条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更加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了。我们不但有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而且有了一系列实现这条总路线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我们不但有了三年大发展的经验，而且有了巩固大发展的成绩、纠正和克服贯彻总路线的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经验，有了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难作斗争的经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是一个不断地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总结经验 and 不断实践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从实践中获得的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必然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发展的伟大的精神力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革命和建设并举的总路线，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更加深入了。几年来，我们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的指引下，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党领导着全国人民更自觉地抓住了阶级斗争这条纲，来推动一切工作，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密切结合起来。全国农村和城市许多地方进

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根据社会主义的彻底革命的原则，在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四个方面进行清理和基本建设，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正是由于我们深入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广大工农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更加坚定了，这就使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巨大变化，大大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目前，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工农业生产战线上，闪烁着共产主义精神的比学赶帮运动正方兴未艾，并不断深入发展，先进的要求达到更先进，落后的要求赶先进、超过先进。广大人民群众的这种高涨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和冲天干劲，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曾这样说：“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可见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的提高，后来居上的革命精神，是促进生产高潮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以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当前生产新高潮必然出现的最重要的精神条件。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是保证建设事业按照正确的轨道发展，少走弯路的必要条件；而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高涨，和已经取得的同各种困难作斗争的比較丰富的经验，则可以使我們更好地实现高速度建设，并大大增强了我們克服前进中一切障碍和困难的信心。在生产新高潮中，所有这些精神力量都必将轉化成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

由于我国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三年大发展的成绩得到了巩固、充实和提高，直接导致了工农业生产的全面高涨和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为国民经济新的大发展創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几年来，我们在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集中了主要力量，加强了农业战线，对农村中在三年大发展期间发展起来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生产技术，进行了巩固、充实和提高的工作。首先是对三年大发展时期兴建的許多农田水利，进行配套、修整、加固，使之更能充分发挥作用。以广东省来说，在几年的调整期间，大力巩固和兴建山塘、水库；大搞江海堤围和涵闸的维修和建设；大抓疏涌、挖河；大开排灌渠道；由于工业部门的大力支援，建立了許多电动排灌站，使水利系統配套成龙。现在，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河网地区，已经基本完成了电力或自流排灌网，初步做到了旱涝都能保证較好的收成。五年間全省已经新建起四千多座排灌站，共拥有三十五万多匹馬力的电力排灌设备和十五万多匹馬力的机械排灌设备，使六百多万亩农田初步达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所有这一切农田基本建设，发挥了很大威力，对农业的发展，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有着非常巨大的意义。其次是强调了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在农村中大搞肥料，既大搞小型肥料厂以生产有机肥和无机肥，又积极推动大种绿肥和圈家畜肥，对解决农业发展所需的肥料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再次是注意了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和改良稻种，并且做了大量的工

作。最后是注意在大力解决水、肥、土、种的基础上，大抓提高耕作技术和生产管理水平的
工作。广东在这方面，提出了学习潮汕先进经验的口号，许多地方都请潮汕地区有经
验的老农来传授耕作技术，而潮汕地区本身，也在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推广先进耕作
技术。在农业生产力这方面大抓上述四项工作，也就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
宪法的过程。事实证明，这些工作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农业生产获得了迅
速的发展，在还继续遇到各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三年来获得连续增产，主要农业牧业
产品都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广东省已经出现了不少粮产千斤县，不少过去一向低
产的山区，也都达到了千斤以上的高产。今年农田基本建设、采用耕作新技术、提高生
产管理水平等，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时期，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
于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的一系列的重要政策，健全了人民公社的制度，这就必然促使农
业生产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就工业方面来说，我们调整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并
且使工业和其他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使工业的发展规模同农业
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更加相适应，根据农业发展的需要和农业技术改革的规
划，来调整和安排工业的生产和建设，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加强了。由于工业有了明
确的发展方向，工业本身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几年来为农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生产资
料。以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五七年比较，全国拥有的农业用拖拉机台数增长了四倍，排灌
设备的马力增长了十二倍，农村用电量增长了二十二倍，国家供应的化学肥料增长了两
倍以上。广东省也和全国各地一样，集中力量抓了化肥、水泥、农业机械、食糖、钢材、
木材、农药、农用尼龙薄膜等重点支援农业的产品和与农业生产关系较大的产品生产。
到一九六四年，全省工业支援农业的工作，已成为历年来成绩最大、效果最好的一年，
全年直接支援农业的产品产值比一九六三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强，其中化肥的产量，
比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三年五年间的总和还多，为广东省历史上最高的一年。我们又调
整了工业内部的关系，加强了薄弱环节，发展了新兴工业，尤其是基础工业。例如我们
在轻工业方面，大大增加了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在重工业方面，加强了对轻工业提
供原料、材料和燃料，加强了石油工业，使石油的生产增长很快，现在已达到了基本自
给的程度。等等。现在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自己能够制造各项工
业的成套设备，过去不能制造的许多重型设备和精密设备，现在能够制造了。由于我们
认真贯彻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工业方面还实现了产品质量、品种
的新跃进。四年来，主要工业产品的品种大约增加了两万四千种，比一九五八年到一九
六〇年大发展时期所增加的品种还多两倍。产品质量普遍提高，有些已经达到或者接近
世界先进水平。从广东省来看，一九六四年就有百分之八十的产品质量比前一年有显著
提高，有三十六种省管产品、品种，如过磷酸钙、水泥、敌百虫农药等，已赶上和保持
全国先进水平。

经过几年来的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使得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的关系，得以在新的基础上比较协调地发展，并使工农业生产呈现出全面高涨，因而市场供

应状况有了越来越显著的改善，物价稳定，国家的财政收支平衡，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我们的经济力量比过去增强了，物质基础更雄厚了，这就为国民经济新的大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当前工农业生产新高潮的形成，正是由于具备了上述的精神条件与物质条件和它们的相互结合的结果，而精神条件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精神条件主要体现了人的积极能动作用。无论做什么事情，即使物质条件具备了，如果没有人的革命的干劲，也就是没有了人的积极作用，事情还是办不起来的；相反，如果人们有了向前奋进的革命积极性，即使必要的物质条件暂时还不完全成熟，还是会千方百计地根据客观规律去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加速物质条件的成熟，从而把事情办成功。生产新高潮的形成，是我们党中央，善于将这些精神的和物质的有利条件很好地结合起来，因势利导，及时提出了组织工农业生产新高潮的号召的必然结果。生产新高潮的形成，是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自觉地按照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促进事物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显示了作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唯一指针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无限威力。通过组织今年的生产新高潮，我们将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某些尚未完成的任务，并且为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使我国国民经济更好地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开展比学赶帮,促进生产发展

——簡述南海化肥厂是怎样追赶全国质量先进水平的?

黎定权 丘德良

一九六四年广东省南海化肥厂在生产上又取得了优异成绩。八月份磷肥质量已经从二级品上升到一级品,进入第四季度,质量继续上升,全部达到优等品。质量中的主要指标含有效磷,年初只有百分之十七点七,年底已经达到百分之十九以上。

南海化肥厂一九六四年的赶先进目标,要求在年底前达到全国先进企业江苏南通磷肥厂一九六三年底的水平。磷肥质量好要求含有效磷高,游离酸低,水份少和轉化率高,而在一九六三年底,南通磷肥厂和南海化肥厂磷肥质量指标的对比是:含有效磷分别为百分之十八点二和百分之十七点八;游离酸分别为百分之三点五和百分之四点四;水份分别为百分之十点二和百分之十二点九;轉化率分别为百分之九十四和百分之八十九点七。至一九六四年底,不仅在质量指标上已大大超过南通厂一九六三年底的水平,而且全部十四个技术经济指标,都已超过和达到南通厂的一九六四年同期水平。

在提高质量的同时,也全面完成了国家计划。一九六四年全年磷肥产量比一九六三年同期增长近一倍,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五十九,每吨磷肥成本比一九六三年下降百分之十一,产品价格虽然降低了百分之十七点九,但全年利润仍超额百分之十七点四完成了计划。

南海化肥厂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曾走过弯路,有过教训。一年来,他们是怎样追赶全国先进水平的呢?

一、坚持一分为二,从成绩中找问题,克服骄傲自满情绪

在这个问题上,南海化肥厂不是一开始就那么自觉的。这个厂的底子原是一间老火柴厂。几年来由于坚持不断革命,贯彻自力更生和勤俭办企业的精神,实现了土硫酸炉的改造,建成了磷肥生产过程的机械化流水綫,生产技术比较过得硬,质量一直稳步上升,成本逐步下降,是广东省佛山专区一间生产比较好的化肥厂。

有了成绩是好事,但如果不能正确看待也会变成坏事。一九六三年底,在全国磷肥会议上,南海化肥厂出名了,全国各地前来参观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一片赞扬声,上级

又批准了兴建一座沸騰炉。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滋长了自滿情緒，在“三南一湛”（南京、南通、南海、湛江）上自我陶醉，认为現在的生产技术已經差不多了，比南通“各有千秋”，湛江化工厂是洋法生产，条件不同，对其他同类型兄弟厂不看在眼里，对别人的进步不服气，抓住一点缺点否定别人成績。上級号召赶先进，他們說：要再提高产量和繼續降低成本，非洋炉投产不行；要再提高质量，上級必須解决洋設備的“天桥抓斗”。看不到形势的发展，看不到群众的力量。特別严重的是，在解决生产突出問題上措施不力，因而去年初硫鉄块矿减少供应以后，自己制造的粉矿球赶不上，两条硫酸炉被迫停产，磷肥缺酸窝工，第一季度生产計劃落空，成本上升，质量下降，整个生产处于被动。

就在他們沾沾自喜、自我陶醉的时候，其他兄弟厂赶上来了。在专区第一季度磷肥評比會議上，評为倒数第一。中共南海县委催肥料，生产局面打不开，兄弟厂步步赶上来，形势迫人，于是领导思想上又来个大轉弯，出現惊惶失措。

被动局面一直拖到一九六四年五月，在县委的一再督促下，厂党支部深深感到問題严重了。于是召开党支委会，认真检查前段工作，分析原因，批判驕傲自滿，反掉坐等洋炉、洋設備的思想；在生产上，抓住关键打歼灭战，把领导精力和技术力量集中围攻粉矿球設備，抓好硫酸炉的技术改造，以矿保酸，以酸保肥。結果立竿見影，硫酸产量激增，磷肥生产正常了，第二季度任务完成了，从被动轉向主动。

生产虽然正常了，但是磷肥质量与先进地区差距还很大。吸收了前段教訓，在总结上半年生产的同时，又进一步批判了等待“抓斗”和怀疑别人的自滿思想，看到自己的落后；并且实行“井外观天”，由领导帶領十多人到省内外先进企业“取經”，别人来厂学习，就抓住机会虛心請教，无论大厂、小厂，逐个环节与之对照，找差距，发动群众查原因，搞革新，集中力量抓好磷肥质量。因此，七月以后磷肥质量逐步上升，八月份全部达到一級品，含有效磷达到十八点六，赶上南通，九月份又上升到十九点一。生产提高了，质量赶上去了，是不是就沒有問題呢？不！第三季度过后，领导上又发动群众針对企业的各个方面进行“五查”，批判职工中“人肥遮百羞，质好各样好”的思想，在肯定成績基础上又揭发出不少問題。現在，他們正根据存在問題进行整改。

“虛心使人进步，驕傲使人落后”。一年来，南海化肥厂的事实生动地說明了这一真理。“一分为二”的观点永远是前进的动力，要想从先进走向更先进，关键是善于从成績中找問題，經常保持清醒的头脑。

二、眼睛向下，挖掘企业内部潛力，依靠群众，貫徹自力更生精神

抓关键突破薄弱环节，是提高生产技术、改变落后面貌的重要方法。但是如何去抓？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依靠少数人，“閉門造車”，依賴好設備，等待外面支援；一种是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綫，实行自力更生。南海化肥厂在这个問題上也有过一段反复。

一九六四年五月初，硫铁矿解决了，但是硫酸产量很少，洋炉未建好，三条土炉的日产量仅能满足磷肥生产的百分之五十。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党支部在批判“貪洋等大”思想基础上，研究决定面向土炉，挖掘现有硫酸炉的潜力，过好硫酸关。方向找到了，关键抓住了，于是集中力量改造二号炉。二号炉的主要问题是产量低。产量低的原因又主要是该炉除尘器和转化器过细，气体流速快，流量少。因此，在改造中将除尘器和转化器加大，扩大除尘器和转化器之间的流量。但是由于外地加工的曲喉铸管没有搞好，尾部的吸收系统无法安装。这座炉的好坏关系全厂的生产，怎么办？当时干部中有两种不同意见：一些同志认为，要改就彻底改到底，应暂时停下来，待曲喉回来再搞；另一些同志则认为，时间拖长了生产更被动，应把原有的旧吸收系统先安上去使用，边生产边等待。两种意见争论不下，眼看第二季度生产又要落空。最后只有一个办法：交给工人讨论，征求群众意见。讨论结果，群众认为原有的吸收系统还可使用，赞成采取第二个方法。接受群众意见，把旧系统安上去以后，产量立即比过去增加百分之七十多。事实教育了干部，增强了领导的信心，于是再组织群众研究，利用本厂的机械力量，自己制造铁管，采取铁管加耐酸砖的办法代替曲喉铸管，改造了新的吸收系统，产量又提高百分之三十。全厂硫酸炉改造后，硫酸产量上升一倍，不足变有余，磷肥产量也上升一倍。被动局面扭转了，而两个多月以后才到厂的曲喉铸管已经用不上了。

能否坚持依靠群众，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关键在于企业领导有没有决心解决问题，有没有改变自己的领导作风和思想作风。一九六四年初，企业向工人传达了南通厂的先进经验和提出赶南通的口号之后，群众积极性很高，很快就把南通厂的高速搅拌经验推行了。但是把速度从原来每分钟六十八转提高到九十转之后，操作台震动很大，有些人害怕了，而当时领导既没有深入研究，也没有发动工人想办法，就认为是操作台不牢固，因此推广几天就停了下来。其实事情并不在于操作台本身，而是领导的思想作风。一九六四年夏天，该厂到各地先进企业参观学习回来，感到不解决不行了，于是才下决心重新组织工人研究，深入车间，同工人一起分析震动原因，结果发现震动大是由于皮带轮的重量不均匀，经过工人研究，在皮带轮上加上一块小铁，操作台就平稳了，搁了半年的关键问题也就解决了。

三、从实际出发，正确运用别人的先进经验， 把学习外地经验和总结本厂经验结合起来

南海化肥厂的磷肥质量提高得比较快，是同他们正确学习别人的经验分不开的。一年来，由于他们根据企业的具体条件，总结了本厂的经验，从实际出发，吸取别人的先进经验，从而找到了一条提高磷肥质量的正确道路。

在一九六三年全国磷肥会议上，江苏南通磷肥厂的磷肥质量评为全国第一。南通厂磷肥质量高的主要经验是工艺上执行“三高一细”（硫酸浓度高，硫酸温度高，搅拌线速

度高，磷矿細)的結果。全国各磷肥厂普遍学习这一經驗。但是，与南通厂对比起来，南海化肥厂几年来执行的工艺却是“三低一粗”，刚好相反。

怎样学习南通厂的經驗呢？他們沒有原封不动地把南通厂的經驗硬套，而是通过层层对照，找出差距，把自己的做法与南通厂的經驗进行对比，研究試驗，找出改进方向。經過研究对比，肯定了南通厂的硫酸溫度高(摄氏八十五度至九十五度)，攪拌綫速高(每秒七公尺)和磷矿粉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通过一百目篩)是提高质量的有效办法，但对硫酸浓度高(含酸量占百分之七十四至七十八)則有不同見解：根据本厂間歇攪拌生产設備的实践証明，硫酸浓度一般保持在百分之六十二到六十四最为适宜，其优点是可减少游离酸，縮短后期熟化時間，减少倉庫压力，减少硫酸消耗，降低成本；但缺点是水份大，有效磷提不高。以一九六四年第二季度为例：南通厂磷肥含水量是百分之十点零四，有效磷为百分之十八点三七；而南海厂含水量是百分之十三点六五，有效磷是百分之十七点九一。根据理論和本厂的实践经验，每降低百分之一水份，可以提高百分之零点二的有效磷。就是說，如果以第二季度的情况，把水份降低到南通厂的同等水平，有效磷則可提高为百分之十八点六四，赶上南通厂。由此看来，要提高质量，除了学习南通厂的有关經驗外，还必须采取措施减少水份。經過不断研究、試制，采取了加强化成車的抽风，把抽风机的轉速从原来每分钟一千四百轉，提高到二千六百多轉，增加吸收水份能力，取得了显著效果。同时根据南通厂的先进經驗，把硫酸溫度从九十多度，再提高到一百度至一百二十度；把攪拌綫速从原来每秒钟三点四公尺提高到五点三公尺；把磷矿粉細度通过一百目篩从原来占百分之六十提高到七十至八十。从而总结出一套适合于本身設備条件的“两高一稀一細”的工艺規程。在提高攪拌綫速的同时，还改革了攪拌桨叶，把上下层叶片傾斜方向改为相反方向，使磷矿粉和硫酸攪拌均匀。經過一系列的革新，加上天气干燥和其他有利条件，磷肥质量显著提高，全部从二級品上升为优等品。

四、开展群众性的比学赶帮，推广先进操作技术，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企业的生产技术是否过得硬，与职工的技术熟练程度有着密切关系。而开展群众性的比学赶帮活动，广泛推广厂內的先进操作技术，又是提高职工技术熟练程度，提高企业生产水平的重要方法。

为了开展群众性的比学赶帮活动，南海化肥厂从一九六四年第二季度开始，即着手进行树立先进榜样的工作，在群众性評选活动的基础上，經過深入調查总结，在全厂职工中树立了“兩組”、“三人”、“九能手”的先进榜样，他們中有多年风雨不改，天天提前上班，坚持学习毛泽东著作和讀报的鉗工組；“三个一样”、“五个成风”的碎矿甲組；深入細致做好班組政治思想工作，善于抓活思想，事事带头的五好組长；以及技术革新、烧粉矿技术、磷矿粉干燥、內燃机修理、烧鍋炉等等工种的能手。由于树立了这一批先

进人物，全厂各車間、各主要工种都有了自己的学习目标，为开展比学赶帮运动树立了各种各样的活榜样。

有了先进榜样，还必须具体細致的做好推广工作。几个月来，他們运用上技术課，召开技术座談会，采取派出去、請进来、送經上門，以一带二、熟帶生、分炉竞赛等多种形式，使先进經驗迅速在全厂开花，把企业的生产水平提高了一步。如全厂长期以来未能攻破的“烧粉矿技术关”，几年前就曾經尝试用硫鉄矿粉代矿块生产硫酸，但技术一直未能过关。一九六四年底工厂又派出十多人到电白等县参观学习，回来后也只有少数人能掌握操作，經過这次总结推广本厂烧粉矿的先进經驗后，全厂六十九个烧炉工全部学会了烧粉矿技术。又如鍋炉工段的甲、乙两班工人，过去煤耗大，汽量小，經過总结推广丙班烧鍋炉能手陈玲好的先进操作經驗后，全工段煤耗由过去每班六百公斤降为四百公斤以下。

总结先进經驗和推广先进經驗，有效地推动了企业管理工作。如磷肥車間攪拌工段，是控制磷肥质量带有关键性的一个工段，原先攪拌是采用丙班先落酸后落粉的操作方法的，但在总结、推广先进經驗过程中，乙班提出不同見解，认为酸、粉一齐落攪拌的效果更好，但甲班却提出相反意見，认为先落粉后落酸的經驗好。究竟那个操作方法先进呢？經過企业领导人員、技术人員和生产工人組成“三結合”队伍，到現場試驗，发动群众总结对比，結果总结出一套“三匀”（配磷矿粉均匀、攪拌均匀和落酸落矿均匀）、“三勤”（勤检查仪器、勤检查酸浓度和酸溫度、勤观察浆料情况）、“一准”（磷矿和硫酸計量要准确）的先进操作經驗，并納入技术規程，作为攪拌工段崗位責任制的内容之一把它固定下来，对提高磷肥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

一年来，南海化肥厂在生产上取得不少成績，但当前在生产、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还有不足的地方，今年初由于机械事故，磷矿粉幼度达不到要求以及其他原因，影响质量的稳定，而且一項新的生产技术——沸騰炉已投产，今年生产任务要比去年有較大幅度的增长。因此，要巩固已得成績，全面完成各項任务，并把各項技术經濟指标全面赶上全国第一水平，任务还很艰巨，仍需做許多艰苦深入細致的工作。目前工厂的党支部和领导正在提出大力支援农业的口号，积极組織生产高潮，并且在降低成本方面已取得了比較显著的成績，广大职工的干劲更加高涨，技术革新也在不断取得成績，产量增长，生产高潮正在形成中。

一九六五年三月

关于扩大第三类产品經營的一些問題

陈 庆

第三类产品，絕大部分是沒有納入国家生产、收购計劃的产品。有种植的，有野生的；有农副业生产的，也有工业、手工业生产的；有数量大宗的，也有数量小宗的。在商业經營上，通常都叫做小商品。这些小商品，在正常的情况下，大概要占商业部門營業額百分之二十左右。小商品的特点，品种多、价值小、生产零星分散，生产和收购計劃都难于安排，商业經營上也容易忽視。可是，这些小商品却用途广泛，消費面广，有些是工业、手工业的原材料，有些是医疗上的必需藥物，有些是城乡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有些是出口物資。因此，商业部門經營好第三类产品，对农副业生产和对工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对城乡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对支援工农业生产新高潮，貫徹“及时收购，积极推銷，生意做活，活而不乱”的原则，有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商业經營好工农业生产的第三类产品，一举四得：第一、可以促进生产队开展多种經營，增加收入，巩固集体經濟；第二、可以为工业、手工业提供原料，有力地支援工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第三、可以增加出口物資，为国家提供外汇；第四、可以繁荣市场，丰富城乡人民生活。

我国农业生产情况一年比一年好。在貫徹以粮为綱、全面发展的方針中，随着农田基本建設进一步发展，自流灌溉、电力排灌、机耕面积扩大，生产队可以逐步騰出較多的劳动力从事副业生产，而第三类产品資源丰富，生产門路极广，投資少，收益大，只要生产队有計劃地安排劳动力，购置一些必要的生产工具，就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农副业生产的第三类产品搞起来，收入增加，不仅可以改善社員生活，提高生产积极性，还可以为生产队积累农田建設資金，巩固和发展集体經濟。但是，农副业中第三类产品的商品性很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往往取决于产品的銷路。一般的情况是商业部門多收购，生产队和社員个人就多生产，商业部門少收购，他們就少生产，商业部門不收购，他們就不生产。因此，商业部門积极安排第三类产品的生产并及时收购，大力打开銷路，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农业生产新高潮起促进的作用。对于商业來說，生产是处在支配的地位，而不是相反。但是，我們的商业工作做得好，却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如果认为商业工作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不起作用的，这种观点是錯誤的。商业部門經營好农副业生产的第三类产品，可以更全面地体现商业部門的生产观点。

农副业中的第三类产品，不少是工业、手工业十分需要的原料。商业部門通过組織生产，安排收购，把零星的、分散的产品集中到商业部門手上来，就可以有計劃地供应

工业、手工业生产的正常需要。工业品中第三类产品，大都生产分散，生产计划性不强，大部分是手工业部门自产自销，好销就多生产，不好销就少生产或不生产。手工业部门由于对市场需要不十分了解，生产上往往有很大的盲目性。生产单位一面搞生产，一面搞推销，销售方面就有一定的局限性，会给生产单位带来困难。忙于推销，产品的质量提高也不容易。国营商业不插手经营或少经营，投机倒把、长途贩运，也就应运而生。小商品是客观需要的东西，不管社会主义商业经营不经营，同样在市场流通。市场阵地，社会主义不占领，资本主义就会占领。因此，社会主义商业经营好工农业生产的第三类产品，不仅促进了生产，而且通过商业的桥梁作用，可以做到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可以密切城乡经济联系，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可以有力地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缩小自由市场，扩大社会主义商业阵地，真正贯彻“生意做活，活而不乱”的原则。

我国各地有许多土特产品、野生动物、河涌鲜活水产等都是出口畅销的物资，经济价值大。如出口一吨蜂蜜，便可换回三吨钢材或六吨化肥。如果商业部门把这些物资收购起来，供应出口，便可以为国家增加外汇收入，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工农业生产的第三类产品，有许多是必不可少的小商品。如野生草药是中医配方不可少的，没有它，就不能配方治病；农业生产使用的粪箕、扁担，在目前条件下，还是不可少的生产工具；工业品中的鞋带、顶针、钮扣、边带，没有它就不能配套，还有塑胶鞋、发夹、烟盒、鼓油碟、扫把、棋子等，没有它，群众就感到不方便。商品虽小，哪桩也不能缺，有些小商品是大商品代替不了的。因此，经营好工农业第三类产品，对保证城乡人民生产上、生活上需要，对丰富城乡人民生活，对繁荣市场、增加市场商品的花色品种，都有重要作用。

既然目前扩大工农业第三类产品的经营有它的必要性，小商品又是大商品代替不了的，社会主义商业就必须千方百计做好工农业第三类产品的经营工作，扩大第三类产品的经营。对此，我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供同志们参考。

一、扭转“重大轻小”的经营思想。现在有些商业部门的同志把收购第三类农副产品看作“三难”货。所谓“三难”就是零星分散，收购调运难；品种复杂，加工保管难；购销额小，完成任务难。嫌第三类工业品太“杂”，觉得经营它是“三多、三少、三麻烦”：花色品种多、销量少，接待顾客多、成交少，交易笔数多、金额少；陈列麻烦、出售麻烦、盘点麻烦。总之，认为经营工农业中第三类商品购销额少，费力多，似乎不值得经营。这笔账该怎么算呢？一件第三类产品的买卖，购销额虽少，但它品类繁多，消费面广，是人人都需要买、能够买得起的商品。我国六亿多人口，每人买一元就有六亿元。何况这是生产需要、人民消费需要。社会主义商业的基本方针是为生产、为人民生活服务，不能怕麻烦而不去积极经营。“重大轻小”，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作风的反映，是缺乏生产观点、群众观点的表现。社会主义商业既要经营好大商品，也要经营好小商品，不能顾此失彼，有所偏废。

二、按照工农业第三类产品的特点，要采取灵活多样的经营形式。工农业第三类产

品生产比较容易，产品零星分散，生产組織和销售規律变化大。这种特点，决定了产銷完全直接納入国家計劃有困难，但离开了国家計劃的指导，又会盲目产銷。对农副业中的第三类产品，商业部門应当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通过收购合同，尽可能把它納入国家計劃軌道，沒有安排生产和簽訂合同的，也要通过物資交流会，組織产銷协作。地产地銷零星小土产，允許农民上农貿市场出售。对工业品中的第三类产品的經營方式，要区别对待，可以根据生产的集中和分散、銷售面的广窄、质量稳定不稳定、花色品种变化大不大等，分別实行商业包銷、訂购、选购和工业自銷。但是从整个第三类商品的經營來說，主要的、基本的流通任务，应当由商业部門来承担。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商业担負領導市场，統一安排市场的重大責任。积极扩大第三类产品的經營才能更好地貫徹“发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总方針。

三、最好能設立工农业第三类产品单独經營的机构。工农业第三类产品由于品种多，生产分散，价值低，在采购上容易被大商品挤掉。从組織机构上来保証这类商品的經營看来是十分必要的。在这問題上，我认为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考虑，即：在不增加編制的原則下經營第三类产品比較多的公司、二級站单独設立第三类产品經營科，負責第三类产品的經營指导和采购、調拨工作。县、市公司設立第三类产品的采购批发部，以便利采购和零售单位选购。这样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形成一条第三类产品的流通渠道，使第三类农副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第三类工业品能够深入农村、山区，更好地沟通城乡物資交流，促进生产的不断发展。

四、要發揮基层采购单位和零售单位的經營积极性。由于工农业第三类产品单价小、花費劳动多、花色品种容易过时、陈旧、残損，如何使基层采购单位和零售商店經營工农业第三类产品不致亏损，發揮他們的經營积极性，这是一个实际問題。解决这个問題的办法，就是在加强对从事第三类产品經營的人員的政治思想教育，积极提高他們的政治觉悟，使他們能更自觉地努力做好工作，改善經營管理的同时，适当扩大經營单位的毛利率，即大于大商品的毛利率。經營农副产品中的第三类产品，应当保持基层采购单位有合理的利潤。只有这样，才能补偿經營单位的損失，才有利于工农业第三类产品的扩大收购和銷售。

以上論述各点是一己之見，仅仅是从認識上去探討。如何做好第三类产品的經營工作，也只是談了一般性的原則問題。要經營好第三类产品还需要摸清第三类每一种产品的經營規律，解决一些政策問題和具体問題，例如社会主义商业經營第三类产品应当占整个商业營業額的比重多大，才能做到大、小商品并举呢？要怎样經營第三类产品，才算活而不乱呢？怎样对工业品中的第三类产品，具体划分商业包銷、訂购、选购、自产自銷呢？怎样加强經營第三类产品的計劃性，平衡生产与消費，避免一时一地的积压脫銷現象呢？等等。看来，要学会做这門生意，真正做到把生意做活，活而不乱，还要从不断实践中去創造和总结經驗，相信通过实践，通过不断总结經驗，我們一定能学会做第三类产品的生意。

农作物良种經濟效果問題初探

譚錦維 侯曉昌

(一)

农作物的优良品种具有一般品种所不及的某方面或多方面的优良性状特性，如产量高、品质好、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强、生长期成熟期更适应于合理的耕作制度的要求等等，这是农作物良种在技术上的合理性的表现，是它成为良种的自然基础。农作物优良品种，除了必须具有技术上的合理性以外，还必须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如能够增加社会产品、劳动生产率高、土地利用率高等等，这是它成为良种的社会基础。这也就是说，农作物生产的良种问题，同其他农业技术措施一样，既是一项技术问题，又是一项技术经济问题。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农作物良种应该是生产性能要好，经济效果要高。

在农业生产中，良种化的程度是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近几年来，各种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成功和在生产中的大面积推广，使农作物良种经济效果问题的研究，成为农业技术经济的一个刻不容缓的新课题。

经济指标是衡量经济效果的手段，也是反映经济效果的形式。采用什么指标来评价农作物良种的经济效果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人建议采用一个综合指标来评价^①。这个意见值得商榷。通过调查，我们认为，评价农作物良种的经济效果，必须采用一系列的经济指标，包括单位面积产量、单位面积产值、劳动生产率、资金利用率、单位产品成本、单位面积纯收入，还有单位面积用工量、单位面积投资、单位面积成本、单位追加成本产量(产值)等等。这是因为：一、农作物良种的经济效果，同它的性状特性相适应，集中地表现在某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必须通过一系列指标，从各个方面加以考察和分析，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出来；二、无论那一个指标都有它的一定的局限性，即使最综合的指标也只能包含有限的因素，反映有限的内容，适用于有限的范围，例如成言农等同志所提出的“产量成本综合指标”，就不适用于评价同一作物品质不

① 参见成言农等：《谈评价农作物生产经济效果的综合指标》和馬正：《也谈评价农作物生产经济效果的综合指标》(分别见《光明日报》1964年7月27日和11月9日)。本文的主要任务不是探讨评价的指标问题，故未深入讨论。

同的品种的經濟效果；三、評價農作物良種經濟效果的任务，不仅仅在于考查其經濟效果的大小，还必须进行各种經濟分析，只采用一个指标是无法完成的。

評價農作物良種經濟效果的任务，主要有三个方面：一、評定在一定的自然和經濟条件下，采用某一農作物良種的經濟效果究竟有多大；二、分析某一農作物良種經濟效果大或小的原因，研究它所需要的經濟条件和配合措施与当地对这些条件和要求的保證程度，确定推广某一農作物良種的范围；三、研究进一步提高農作物良種經濟效果的途径。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我們在广州市郊区黃埔公社棠下大队上社片四个生产队，进行了一次農作物(包括蔬菜、水稻、花生)良種的經濟調查，对農作物良種的經濟效果問題做了一些初步探索，現在提出来請同志們指正。

(二)

上社片四个生产队位于广州近郊，与华南农学院及广东农科院毗邻，两个单位选育成功的新品种，常常在这里先行推广，1962年以来，先后推广了蔬菜良種“宁青”黃瓜、“施美娜”菜豆，水稻良種“珍珠矮”、“二九矮”、“溪南矮”，花生良種“獅选57—64”、“獅头企”，等等。調查的結果說明，在農作物生产上，因地制宜地采用良種，是經濟效果高而又具有广闊发展前途的增产途径。

根据上社片四个生产队1963年和1964年的調查，采用農作物良種的經濟效果，具体表現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产值)。单位面积产量(产值)指标是反映土地生产率的指标，它是評價農作物良種經濟效果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因为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資料，而产量(产值)又是生产成果的最直接最集中的表現。因此，能否使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往往是良種能否成立的基础。上社片采用的几个農作物良種，都显著地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产值)。1963年早造試种水稻良種“珍珠矮”5亩，平均亩产达521斤，比全片的平均亩产438斤提高19%；1964年早造大面积推广了200亩，平均亩产达587斤，比1963年早造提高34%。以第一生产队1964年早造水稻“珍珠矮”75亩和“广场13号”8亩作比較，两者的土地和栽培条件基本相同。但良種“珍珠矮”的平均亩产为601.3斤，而“广场13号”只有451.2斤，前者比后者高33.3%。其它作物良種的单位面积产量(产值)比一般品种也有显著提高，比如黃瓜良種“宁青”，1962年引种，經過两年試驗，1964年較大面积推广，平均每亩产值达174.17元，比当地黃瓜品种“二青”的137.50元高26.7%。

二、降低了单位产品成本，增加了单位面积純收入。大家知道，農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产值)的提高，常常是同精耕細作即同单位面积上的人力、物力消耗的增加相联系的。在一般情况下，采用農作物良種的結果，只有单位面积产量(产值)提高了，而单位

产品成本又降低了，即在单位土地面积上，成本增加的幅度，小于产量(产值)增加的幅度，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上社片采用农作物良种在经济效果上的一般趋势是，按单位土地面积计算的成本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是由于单位面积产量(产值)有更大程度的增加，因而按单位产品计算的成本则是降低的，纯收入是增加的。例如，黄瓜良种“宁青”与一般品种“二青”比较，每亩成本高11.5%，但是由于它的每亩产值比“二青”多26.67%，因而每百元产值成本低17.3%，每亩纯收入高72.58%。水稻良种“珍珠矮”和花生良种“狮选57—64”，也有类似情况。可见下表：

单位：元

指 标	黄 瓜		水 稻		花 生	
	宁 青	二 青	珍珠矮	广场13号	狮 选 57—64	狮头企
每 亩 产 值①	174.17	137.50	57.90	41.29	61.47	43.73
每 亩 成 本②	115.25	103.36	25.51	24.91	35.69	36.51
每百斤主产品成本	4.68	3.86	3.75	5.02	12.79	18.88
每百元产值成本	62.15	75.17	44.06	60.33	58.06	83.93
每 亩 纯 收 入	58.92	34.14	32.39	16.38	25.78	7.22

注：①按1964年平均实际收购价格计算；

②生产资料消耗按1964年国家牌价计算，活劳动消耗按1963年实际劳动日值计算。本文其他有关计算，均同本例，不另注明。

三、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农作物生产上，因地制宜地采用良种，不仅能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产值)，而且也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宁青”、“珍珠矮”、“狮选57—64”等良种的经济效果大，既表现在单位面积产量(产值)的提高上，又表现在单位活劳动消耗的产量(产值)的提高上。其中以“狮选57—64”表现最为突出，同“狮头企”相比，它的亩产多73.30斤，即高40.56%，而每亩直接用工却少2.5人工日，如果以“狮头企”的每直接工日产量6.68斤为100，那么“狮选57—64”则为155.38。其他两个良种的劳动生产率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宁青”比“二青”高25.08%，“珍珠矮”比“广场13号”高25.80%。

四、提高了投资效果。投资效果是显示资金占用及其利用的合理程度的一项指标，一般是以资金投放量与所取得的产品产量(产值)之比，即以资金利用率来表示。大家知道，在农作物生产上，采用不同的品种，就有不同的栽培措施和不同的人力、物力投放及结合方式，就有不同的资金投放量和资金结构以及不同的投资效果。从经济上来考察，凡是经济效果大的良种，一般都应该具有投资效果大这一特点。上社片所采用的三种农作物的良种就具有这个特点。黄瓜良种“宁青”的每元投资产值为1.97元，比“二青”的1.80元高9.44%；水稻良种“珍珠矮”每元投资产量比“广场13号”高32.73%；“狮选57—64”比“狮头企”高36.00%。

兹将上社片1963年和1964年采用三个农作物良种的经济效果，列表综合如下：

本表是絕對數

指 标	黃 瓜		水 稻		花 生	
	寧 青	二 青	珍 珠 矮	廣 場 13 號	獅 選 57—64	獅 頭 企
每 亩 产 量(斤)	2,460	2,680	601.30	451.20	254.00	180.70
每 亩 产 值(元)	174.17	137.50	57.90	41.29	61.47	43.73
每 亩 成 本(元)	115.25	103.36	25.51	24.91	35.69	36.51
每百斤主产品成本(元)	4.68	3.86	3.75	5.02	12.79	18.88
每百元产值成本(元)	62.15	75.17	44.06	60.33	58.06	83.50
每 亩 純 收 入(元)	58.92	34.14	32.39	16.38	25.78	7.22
純 收 入 率(%)	51.52	33.03	126.96	65.76	72.23	19.77
每直接工日产量(斤)	54.91	60.63	32.43	25.78	10.37	6.68
每直接工日产值(元)	3.89	3.11	2.97	2.36	2.51	1.62
每 元 投 資 产 量(斤)	27.84	34.88	41.56	31.31	12.10	8.89
每 元 投 資 产 值(元)	1.97	1.80	3.80	2.87	2.93	2.15

本表是相對數(%)

指 标	黃 瓜		水 稻		花 生	
	二 青	寧 青	廣 場 13 號	珍 珠 矮	獅 頭 企	獅 選 57—64
每 亩 产 量(產值)	(100)*	(126.70)	100	132.98	100	140.56
每百斤主产品(百元產值)成本	(100)	(82.70)	100	72.50	100	67.74
每 亩 純 收 入	100	172.58	100	197.74	100	357.06
每直接工日产量(產值)	(100)	(125.08)	100	125.80	100	155.38
每元投資產量(產值)	(100)	(109.44)	100	132.40	100	136.11

注：有括弧的是表示按產值計算的相對數。“二青”是春植品種，“寧青”是夏植品種，其單位土地面積上的生產率既受產量影響，又受季節差價及質量差價的影響，故按產值計算較為合理。

(三)

在農作物生產中，因地制宜地採用良種為什麼能夠提高經濟效果呢？從上社片的具體情況和具體材料來分析，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原因：

一、在一定的自然經濟條件和栽培條件下，採用良種能夠更有效地發揮水、肥、土等增產因素的作用，提高人力、物力的生產效能，使產量增加，經濟效果提高。這可以從兩種不同的情況來說明：一種是在相同的土地條件下，單位面積上投放的人力、物力基本相同，良種的產量(產值)比一般品種高，經濟效果因此就全面提高了。另一種情況是土地條件相同，單位面積上的人力、物力投放和產量(產值)都有增加，但由於產量(產值)增加的幅度大大超過人力、物力增加的幅度，因而仍然取得較高的經濟效果。請看下表：

指 标	作物种类 品 种		黄 瓜	
	水	稻	宁 青	二 青
每亩直接用工(工日)	18.5	17.5	44.8	44.2
每 亩 投 资(元)	14.41	14.41	88.37	76.84
每 亩 成 本(元)	25.51	24.91	115.25	103.36
每 亩 产 量(斤)	601.30	451.20		
每 亩 产 值(元)	—	—	174.17	137.50
每亩追加直接用工(工日)	1.0		0.6	
每亩追加投资(元)	0		11.53	
每亩追加成本(元)	0.6		11.89	
每个追加直接用工产量 产值增长数(斤、元)	150.10		(61.10)*	
每元追加投资产值增长 数(元)			(3.18)	
每元追加成本产量产值 增长数(斤、元)	250.01		(3.09)	

* 括弧内数字为产值数。

从表列数字可以看到,“珍珠矮”和“广场13号”比较,每亩投资同是14.41元,每亩投工只多一个人工日,而“珍珠矮”的亩产却多150.10斤。这也就是说,每个追加直接工日的产量增长数为150.10斤,比“广场13号”的每直接工日产量25.78斤差不多高五倍;每元追加成本产量增长数为250.01斤,比“广场13号”的每元成本产量18.10斤更是高出十二倍以上。因此,“珍珠矮”比之“广场13号”,每百斤主产品成本低27.50%,按每直接工日计算的劳动生产率高25.80%,按每元投资产量计算的投资效果高32.40%。“宁青”与“二青”相比,也有同样的情况,它的每个追加直接工日产值增长数比“二青”的每直接工日产值,高出十八倍以上,每元追加投资产值增长数比“二青”的每元投资产值高77%,每元追加成本产值比“二青”的每元成本产值高1.25倍,因此,它的每百元产值成本比“二青”低17.30%,劳动生产率高25.08%,投资效果高9.44%。如果“宁青”同“丝瓜”(不采用“宁青”的代替品种)相比,则更为明显,“宁青”每亩用工多35.35%,每亩投资多一倍以上,但它的亩产值比“丝瓜”高一倍半以上,因此,“宁青”的每百元产值成本比“丝瓜”低33.56%,劳动生产率高90.69%,投资效果高26.28%。

二,采用农作物良种,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土地,通过提高土地利用率来使产量增加,成本降低。例如,花生良种“狮选57—64”,结荚集中,成熟齐一,既可以适当提高密植程度,从“狮头企”的8×6提高为7×5以至7×4,增加单位面积株数,使产量增加,又可以减少收获的劳动消耗,从而使产品成本相对绝对降低。第三生产队做过一次富有经济意义的调查:花生老品种“珍珠豆”,平均每株22粒,其中不实粒14粒,“狮头企”平均每株36粒,其中不实粒22粒,“狮选57—64”平均每株34粒,其中不实粒只有10粒,而且果荚集中,因此收获时比较省工。“狮选57—64”一般每人工日可收湿花生90—100斤,而

“獅头企”最多只能收65斤。根据調查，“獅选57—64”每亩直接用工为24.50个人工日，比“獅头企”的27.00个人工日少2.5个人工日，主要是收获省工的结果，这一項使每亩成本少1.5元，占每亩成本的4%以上，加上亩产量比“獅头企”高40.56%，因而每百斤主产品成本只等于“獅头企”的67.74%。“宁青”黄瓜对提高土地利用率的作用，则表现在生长期短，加快了土地的周轉速度，它由播种至初收获为36天至38天，全期共52天至60天，而同一时间种植的絲瓜一般要三个月以上。

三、有些农作物良种抗逆性强，能够更有效地抵抗自然灾害，即使在不利的自然条件下，仍然能够发挥人力、物力的生产效能，取得較好的经济效果。例如，水稻良种“珍珠矮”的重要特性之一是矮秆抗倒伏，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广东水稻早造熟期因风倒伏减产的损失，使前期投放的人力、物力保持有效，十分有利于稳产高产。上社片的早稻，过去几乎是年年倒伏，1964年早稻熟期遭遇两场台风，“广场13号”因高秆全部倒伏，每亩损失稻谷100多斤，每亩还多用了一个人工日来收割，而“珍珠矮”则没有什么损失，获得大幅度的增产。黄瓜良种“宁青”的经济效果高，主要原因是它能够抗细菌性雕萎病，在高温高湿此病严重发生的夏季，它能够正常生长，保持黄瓜的全部优良性状，并且不需要为抗病追加任何投资。当地黄瓜品种“大青”、“二青”则不同，在夏季种植这些品种，很容易因发生此病而迅速全田雕萎，全部失收，从而使黄瓜生产所投放的人力、物力全部变成无效消耗。

四、有一些农作物良种，可以免除或减少某种消耗量大、成本高、运输量大或供应比較困难的生产资料的需要，因而在生产上采用这种良种时，既可以减少投资，又可以减少活劳动消耗，使成本降低，经济效果提高。例如，第三生产队1963年试种、1964年小面积推广的蔬菜新品种“施美娜”菜豆，同一般品种的菜豆比較，它不是蔓生，无需插竹引蔓，光这一項每亩播种面积就节省引蔓的篱竹费用15.96元，每亩还可以因此节省5.5人工日，两项相加，一般占到一般品种菜豆成本的20%左右，很有推广前途。

五、一些蔬菜良种能在一般品种不适宜的季节进行生产，它的产品能在淡季上市，一些品种能够滿足国民经济某方面的特殊需要(如外贸需要)，虽然它们的产量不一定很高，但也能取得較高的经济效果。例如，上面說过的“宁青”黄瓜，单位面积产量并不是最高，但由于它在淡季上市，能更好地滿足城市副食品的需要，它的品质好，价格較高，每亩产值自然也就提高了。而这里的价格因素的作用，是由于质量差价和季节差价所引起的，是正常的、合理的。“宁青”和“二青”，亩产分别为2,460斤和2,680斤，平均每百斤价格为7.08元和5.13元，亩产值为174.17元和137.50元。这也就是说，“宁青”的产量比“二青”少220斤即低10%，按“二青”的平均单价計算，每亩少收入11.30元，但“宁青”的平均单价比“二青”多1.95元即高36.06%，按“宁青”的亩产計算，每亩多收入47.97元，两相抵銷，“宁青”的亩产值仍比“二青”多36.67元即高26.70%，其他经济效果指标也相应提高了。

(四)

根据上社片的实践经验，要进一步提高农作物良种的经济效果，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贯彻良种的“四自一辅”(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之以调剂)方针，公社和生产队要有计划地建立留种地，年年精选良种，以繁育和供应自己所需要的种子。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避免混杂，及时得到足够的纯净优质良种，这对按时按质按量播种，保证增产有着重要的意义；二是可以减少开支，降低成本。城郊农业以蔬菜为主，贯彻这一方针尤为重要，因为蔬菜生产季节性强，复种指数高，生长期短，种子供应不及时或质量不好就会严重地影响到经济效果。

二、采用农作物良种，要注意进行品种配套，这是全面而充分地发挥良种的增产作用的重要环节。所谓品种配套，就是根据生产需要和当地的自然经济条件，正确选择、安排和储备各种不同作物和同一作物不同要求的品种种子，做到瞻前顾后，相互配合，使各种不同作物都配备有相应的良种，使同一作物有若干个不同特点的品种，如肥田有肥田的品种，浅瘦田有浅瘦田的品种，使不同作物前后茬品种的搭配能够密切配合，并且备有足够数量的各种品种的优质种子。这对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建立合理的轮作制度，保证年年全面增产有着很重要的作用。目前，上社片的品种配套工作仍存在品种单一、品种安排缺乏计划、前后茬品种搭配不恰当等等问题，影响了良种的增产潜力的充分发挥和经济效果的更大提高。

三、采用良种必须进一步改善水、土、肥条件，在水、土、肥的基础上，以良种为中心，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这是当前农业技术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提高良种经济效果的一个重要环节。上社片长期以来的实践证明，由于肥料不足，往往使蔬菜产量少收10—30%。1963年以来该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解决这个缺肥产量提不高的老问题，这些措施包括大力发展养猪，取得厩肥，扩大花生种植面积，取得绿肥和花生麸，改进蔬菜残叶的利用和有机肥的沤制，组织专业积肥组长期积肥等等，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此外，采用良种，必须建立相应的耕作制度和采取相应的栽培措施，如适期播种、合理密植、合理施肥、合理间种等。第四生产队把“宁青”黄瓜与白菜间种，效果显著，很有前途。

“写中間人物”論是“暴露黑暗”論的翻版

蔡 运 桂

我国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历史，是无产阶级文学同资产阶级文学斗争的历史。资产阶级总是在不同的时期里提出各种各样的文学主张来反对无产阶级文学，其中之一就是实质相同而名目不断更换的所谓“暴露黑暗”的文学主张。邵荃麟同志的“写中間人物”論，就是“暴露黑暗”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是中国新社会制度的搖籃。歌頌革命的延安，歌頌共产党和革命的工农兵，是革命的文艺家义不容辞的責任。但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延安却有一些作家，反对写工农兵、歌頌工农兵。他們說什么“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說什么“我是不歌功頌德的，歌頌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等等，并在創作上写了許多暴露革命根据地的所謂“阴暗面”的作品。

毛主席坚决駁斥了这种资产阶级的所謂“暴露黑暗”的文学主张，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中說：“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創造者，为什么不應該歌頌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應該歌頌呢？”在这个《讲话》中，毛主席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彻底地解决了文学的歌頌和暴露問題。毛主席說：“許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們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簡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們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謂‘一半对一半’。”这里很清楚地闡明：文学是歌頌光明，还是暴露黑暗，是由社会制度和时代条件所决定的。生活在旧时代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有一部分人不滿现实，但又由于阶级地位、世界观和各种条件所决定，他們只看到旧社会的黑暗，看不到劳动人民的反抗和斗争，他們找不到光明，就只能写所謂“暴露文学”。然而到了革命根据地延安，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文学就是以歌頌光明作为主要任务了。歌頌光明，歌頌工农兵、特别是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光荣使命。社会主义文学也有暴露对象，但这只能是侵略者、剝削者、压迫者，这只能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外一切反动派，而不能是人民群众。至于人民群众的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来克服”（《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毛主席根据对不同时代文学的性质和任务的分析，明确地指出：“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

而“刻画无产階級所謂‘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不認識这一点，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不能真正区别資本主义的旧时代和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从而錯誤地混淆了两个不同性质的历史时代。

歌頌光明与暴露黑暗之爭，实质上是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两种立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毛主席指出：“你是資产階級文艺家，你就不歌頌无产階級而歌頌資产階級；你是无产階級文艺家，你就不歌頌資产階級而歌頌无产階級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全国解放以后，我国已經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文艺家，他們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足，对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缺乏足够的認識，因而对于放下他們熟悉的旧事物而去描写社会主义时代的工农兵还有所抵触。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国际和国内的階級斗争形势的起伏，就有一些頑固地站在資产階級立场、死抱住資产階級世界观不放的人，一再提出資产階級文艺主张，来反对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綫，反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于是，延安时期所謂“暴露黑暗”的文学旗号，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手里变成描写劳动人民“精神奴役的創伤”，到文艺界資产階級右派手里則变成所謂“写真实”。这期间經過了多次較量，資产階級的文学旗号虽被打倒了，但資产階級並沒有完全从文学的领域中敗退，它仍然頑强地在爭夺文学陣地，时刻在寻找反扑时机和它的代言人。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間，由于我国連續三年的自然灾害，經濟生活发生了暫时的困难，城乡資本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階級斗争又进入尖銳化阶段。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現了“写中間人物”的資产階級文学主张。

为什么說“写中間人物”論是“暴露黑暗”論的翻版呢？首先，这是因为無論是“暴露黑暗”論者、“写真实”論者，还是“写中間人物”論的倡导者們，都是以資产階級的世界观和形而上学的眼光，来观察我們时代的现实和革命的人民的。透过他們的有色眼鏡，他們看不到社会主义时代的光芒，只看到一片灰暗的景象。“写中間人物”論者看不到千百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把人民群众大多数都丑化为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的“中間人物”，說什么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苦难的历程”；他們看不到或者不能理解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看不到或者不能理解工农兵英雄人物崇高的光輝品质，他們从自己的阴暗心理出发，以为英雄人物也一定有“阴暗心理”。这种反动的文学主张，都是以否定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为出发点。其次，还因为他們的这些主张，都貫串着一条共同的黑綫，就是反对創造无产階級英雄形象，反对歌頌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而是提倡作家热衷于写落后，写动摇，宣扬或者‘暴露’人民的‘缺点’，引导人民向后退。”（《文艺报》編輯部：《“写中間人物”是資产階級的文学主张》）因此，这类反动的文学主张，在实质上都是要把我們的文艺引向資产階級方向，使社会主义文学变质，成为資产階級的“暴露文学”。

邵荃麟同志說：“阴暗心理可以写，为阴暗而阴暗就不对了”。这句话是令人費解的。从来的作家，都不是“为阴暗而写阴暗”，他們写“阴暗”都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的。旧时

代是这样，新社会也是如此。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主张写“阴暗”，其目的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社会涂成一片漆黑，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前途丧失信心，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邵荃麟同志主张写“阴暗心理”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教育“中间人物”吗？如果我们文学中充满了对社会主义发生怀疑、动摇的，带有自私自利的“阴暗心理”的人物，那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何处体现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是怎样前进的呢？以“阴暗心理”的描繪去“教育”带有阴暗心理的人，其效果将是什么？

从邵荃麟同志所赞扬的一些写“中间人物”的作品来看，实际上是宣扬或“暴露”人民的缺点的作品，也就是“必定渺小”之作，而邵荃麟同志却视为“杰作”，当作短篇小说创作的“典范”，并在大连创作会议上加以推荐。人民群众中的缺点或落后现象不是不可以写，但正确地批评人民群众中的缺点或落后现象，同“暴露”人民的“缺点”或“阴暗心理”，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者是作者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对人民群众中的落后现象进行批评斗争。在作品的具体表现中是树立正面形象，让正面形象有力地扫荡歪风邪气，从思想上对落后现象给予有力的批判，给读者的印象是正气之树常青，而邪气的杂草得到根除。从而体现毛主席所指出的，描写反面人物，也是为了“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而不是展览落后。而后的所谓“暴露”作品，作者却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不是对人民群众的落后现象采取“治病救人”的批判态度，而是采取欣赏或冷嘲热讽的态度。在作品中，不树立高大的正面形象，而是把反面或落后人物作为作品的中心，极力渲染落后人物的“内心矛盾”、“精神负担”、“阴暗心理”。它不表现落后现象被克服，不让“阴暗”之处得到阳光，即使写落后人物有了转机，也是由于个人的欲望得到了满足，而不是从思想上清除落后的东西。它给读者的印象是邪气呼风唤雨，而正气却无所作为。如《赖大嫂》就是这样的作品。作品一方面是表现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邪气“理直气壮”，另一方面是抒发赖大嫂从个体经济走向集体经济的“痛苦心情”。这就是邵荃麟同志所鼓吹、欣赏和同情的人民群众思想改造的“苦难的历程”，也就是邵荃麟同志号召作家要有“勇气”去描写的人民群众的“阴暗心理”。试问，象《赖大嫂》这样的作品，对人民有什么教育意义？它除了煽动自私自利、个人发财的心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拉农民的后腿之外，还可能起什么积极的作用？如果我们文艺家听从邵荃麟同志的话，大家都来写这样的“中间人物”，我们的文艺就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而必然蜕化变质成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文艺。

如果作家采取正确的批判的态度，并且作为“光明的陪衬”，我们的文艺也不能写象赖大嫂这样的人物。但是邵荃麟同志却要求作家一定要写赖大嫂式的人物，而且要求让这样落后的人物占据文艺的主要地位，据说这乃是“现实主义深化”。邵荃麟同志的“现实主义的深化”的标准，是看你有没有写出人民群众身上“旧的东西”，是否概括出“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也就是说看你有没有写出人民群众从个体经济走向集体经济中所走的“苦难的历程”和这场斗争中所表现的“阴暗心理”。如果写了就是“深

化”，不写这些，而是写人民的革命精神，歌颂光辉的无产阶级英雄，那就不是“深化”，而且根本谈不上“现实主义”。邵荃麟同志的“现实主义”，不是要求文学正确地反映我们时代的现实，表现人民群众火热的革命斗争，而是要求作家更多地表现社会主义生活和人民精神领域中的所谓“阴暗面”。这也就是要作家回避热火朝天的斗争现实，抛开人民群众“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革命精神。这种“现实主义”，是不见社会主义的阳光，只见资本主义的“阴影”，不见生活的欢笑，只见“皱着眉头看生活”的“现实主义”，这是抽掉了革命性的现实主义。但是，邵荃麟同志却说，在这种“现实主义深化的基础上”，将要“产生强大的浪漫主义”。这真是奇谈怪论。我们知道，革命的浪漫主义，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邵荃麟同志既然反对写体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英雄人物，取消文艺创作中的革命理想，怎么可能产生什么“强大的浪漫主义”？实际上，他只是从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仓库中找出旧武器，来反对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其结果只能是在社会主义文学中取消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代之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把社会主义文学引上资产阶级暴露文学的老路，成为歪曲我们革命的社会现实的工具。

由此可见，邵荃麟同志所提倡的“写中间人物”论，实质上是要求文艺不要歌颂社会主义时代的光明，而去“暴露”革命的人民，使社会主义文艺蜕化为资本主义文艺。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七日

作家一定要有鮮明的态度

中山大学中文系
二年級乙班 鍾一鳴

邵荃麟同志主張我們的文艺要大写“中間人物”(其实是落后人物),用来排挤英雄人物在社会主义文学上的主人公地位,已經是很荒謬的了;他更提出:在写“中間人物”时,“可以只提出問題,不解決問題,可以不表示鮮明的态度”。也就是說,写“中間人物”的目的,不是为了批判他們,促進他們轉变,而是“不解決問題”,讓他們原封不动,保持旧思想的存在,这就更加錯誤了。

什么是問題?問題就是矛盾。所謂提出問題就是暴露矛盾;所謂解決問題就是矛盾的轉化。毛主席說过:“事情不是矛盾的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轉化。”(《矛盾論》)可見,只是提出問題并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的目的是在以革命精神創造条件,解決問題,促使事物朝有利于革命的一方轉化。不是为提問題而提出問題,不是为了制造思想混乱,更不是为了維持現狀,阻止事物的发展。“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錯誤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辯証法,促成事物的轉化,达到革命的目的。”(《矛盾論》)这是我們对待矛盾,也即是社会生活中的問題的基本观点。

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当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实际生活,也不能一律要求在一篇作品中解决所有矛盾。但是,文艺是一

种斗争武器;創作文艺作品的最終目的还是在于通过艺术形象的感染和教育作用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每个作家都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通过艺术形象来发表本阶级对生活的看法,按照自己阶级的需要来回答生活中的問題,表明事物发展的何去何从。一切剝削阶级的作家,由于沒有也不可能用辯証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指导来反映生活,因此他們的理想发展方向与客观事物的实际发展方向往往是矛盾的。尽管如此,他們还是要通过文艺来改造世界,企图使事物的发展符合他們的主观愿望。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由于有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作指导,阶级的理想同客观事物的实际发展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就能够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去反映事物,就能自觉地站在革命的一方,推动历史前进,对新事物进行热情地歌頌,对旧事物进行不調和的斗争,以便完成“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革命文艺的使命。当然,一篇具体作品并不一定要写出革命一方彻底胜利的全部过程,但必須鮮明地显示出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向——革命的一方必胜,必須强烈地体现出作家的无产阶级的爱憎和共产主义思想。如果作品中連反对什么,提倡什么,否定什么,肯定什么这样最基本的态度都不表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实际上,世界上并不存在象邵荃麟同志所宣扬

的那种“不表示鮮明态度”的文艺作品。因此可以說，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和反映生活中的矛盾，是区别革命作家同不革命或反革命作家的一个重要标志。而社会主义文艺最显著的特色就是通过对生活中矛盾的正确回答以及鮮明的无产階級感情所表达出来的强烈的战斗性。正是在这个原則問題上，邵荃麟同志同我們大唱反調，說可以只提出問題，不解決問題，可以不表示鮮明的态度。在我們看来，他提出這項主張是根本背离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的。

邵荃麟同志挖空心思地为他的文艺主張找寻各种各样的“理由”，尽管这些“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比如，他的“理由”之一，是条件不够，“不能一下子解决”。但是我們要問：面对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是积极地創造条件呢，还是消极地等待条件的成熟呢？是借口反正不能一下子解决而干脆不去解决呢，还是正因为一下子解决不了，所以要坚持不断革命，逐步地去解决矛盾呢？我們从来不认为矛盾一下子就可以解决，也不要求每一篇作品都必须具体解决問題。但現在的問題，是用什么态度来对待矛盾？社会主义文艺到底是鼓舞人們向困难作斗争还是用困难来吓唬群众呢？邵荃麟同志的态度显然不是革命的态度。大家知道，在我們的现实生活中，有党的领导，有群众的力量，有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这些都是生活中的主流，是最本质的东西，文艺反映生活就应该揭示出这些生活中最本质的占主流的东西。抓住了这些，文艺作品不但能够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問題，而且也完全可以解决問題的。許多优秀的文艺作品的成功就是証明。我們认为是社会主义文艺应该做而

且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事情，邵荃麟同志却这样不热心，就是因为他的眼里完全看不见我們实际生活中的主流和本质。

他又說：“过去的社会問題剧，只是提出問題，让观众自己去判断”，因而我們的文艺作品也可以不解决矛盾了。这更是錯誤的。我們知道，过去的社会問題剧是属于资产階級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那些作家由于世界观的局限性，頂多只能提出問題，而无法解决問題，或者只能作錯誤的解决。他們虽然能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黑暗，但暴露得极为有限，更重要的是他們根本不可能正确地指出应该怎么办，或者只能从維護他們本階級的利益出发，暗示出他們的资产階級的愿望。高尔基早就指出：“这种形态的现实主义过去并不曾而且現在也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的个性，因为它只是批判，并不肯定什么，或者——更坏一些——轉而肯定它曾經否定了的东西。”（《高尔基文学論文选》）今天我們有先进的世界观作指导，完全可以对生活中提出的問題作革命的解答，以完成革命文艺推动历史前进的使命。在这个时候，邵荃麟同志却拜倒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膝下，抱住这“不能培养社会主义个性”的文艺死死不放，引导人們向后看，他究竟要把社会主义文艺引向何处去，不是很清楚了吗？

“写中間人物”而又“不解决問題”，“不表示鮮明的态度”，这些，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很明显的，就是保护旧事物，反对新事物。不写出矛盾发展的趋势——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斗争和取得胜利，这就取消了对落后的批判。看来，邵荃麟同志是多么怕触动“中間人物”的痛处啊！但是，純客

观的描写是沒有的，把“中間人物”的言行展覽出来，不消毒，不批判，就只能被认为是同情、欣賞和宣扬，就是使旧事物的存在合法化，使它們得到地盘，万古长存。邵荃麟同志不是常說“以中間人物来教育中間人物”嗎？但是，无批判地写“中間人物”不是什么“教育”，而是长他們的志气；而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則只能起消磨斗志的作用，起潜移默化地腐蝕作用。

旧事物逐漸失去地盘和新事物逐漸取得支配地位，这是事物发展趋向的两个方面。不破則不立，既然不破落后思想，就不能立先进思想；既然不写落后的轉变，就必然不写先进力量的斗争和带动，即不写英雄人物。看来，邵荃麟同志是連一点地盘也不給英雄人物了！他不是說过“还是要写英雄人物”嗎？但这是以不能触犯旧事物为前提的。而同旧事物作不調和的斗争正是英雄人物最主要的特色。因此，这实际上就取消了英雄人物，或把对旧事物旧思想迁就妥协的人当英雄来歌頌。足見“还是要写英雄人物”的說法的虛伪。英雄人物是矛盾的主导方面，是解决矛盾推动生活前进的主人，他們永远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現，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在他們的身上最强烈地体现着时代精神——革命精神。邵荃麟同志說过：“也可以指出方向，让讀者自己去得出結論”，但是，排挤了英雄人物，“方向”又从哪里体现出来？从“中間人物”身上嗎？但是邵荃麟同志又不准批判“中間人物”身上的旧思想，不让它們得到克服，那么这种“方向”就絕不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的。这也就使文艺失去共产主义教育作用。

其实，邵荃麟同志反对解决问题，仅

仅是反对向先进的轉化，并不反对向落后的轉化。他的所謂“方向”是指出了，不过是資本主义的方向。因为在阶级斗争中，“中間路綫”是沒有的。在思想領域里，“真空地带”是沒有的。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領，资产阶级思想就一定去占領。不向旧事物作斗争，就是妥协、投降，这只能使旧思想泛滥。被当作“写中間人物”的艺术标本的《賴大嫂》就是一个証明。賴大嫂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滿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农村妇女，但是她的这些思想从小說开头至結尾都沒有受到批判。另一方面，她养不养猪的矛盾却解决了，她終於分得一头小猪，也乐意去养了。但这却是干部向她让步迁就，委曲求全的結果，是她終於相信养猪可以“发财”的結果。“让讀者自己去得出結論”嗎？只能得出这样的結論：賴大嫂的資本主义思想将恶性发展，她只会得寸进尺，更加放肆，走上資本主义的道路。至于对她的行为听之任之的人，也会消磨掉任何一点斗争性。按邵荃麟同志鼓吹的主张去写文艺作品，我們的文艺不就变成向人民灌輸资产阶级思想的文艺了嗎？

邵荃麟同志为什么不愿意看到問題朝革命方向解决呢？为什么說可以不表示鮮明的态度呢？原来他自己就站在旧事物的一方，不愿看到旧事物的死亡和新事物的胜利，而是要頑固地表現自己，对抗新事物。他的思想感情正是与那些“中間人物”和不革命的人物相通，爱他們，写他們。二十多年前他的一本題名为《英雄》的短篇小說集，几乎都是写一些委瑣卑微的人。他还在这本书的《題記》里說：“对于这些卑微的人物，我却是爱好的，好像是朋友在

一起厮混得久一些，自不免有一种眷恋之情”。二十多年过去了，他这种“眷恋之情”并没有割断，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人家要批判这些人物就使他感到心痛。而对于新事物，他却是害怕的，但又不敢公开反对，只好先稳住自己的阵脚再说，就拼命抵制新事物对他们的冲击，要作家对革命运动不表示鲜明的态度，企图让旧事物长期存在。其实，他自己的这种态度，不就很鲜明吗？一切反动派和旧思想的俘虏们最怕一个“变”字，而一切革命者则靠着“变”字吃饭，革命就是变革。面对着矛盾，他们怕解决，而革命人民和一切革命者则要解决矛盾，要革命，要消灭一切旧的东西，推动时代前进。我们要使社会主

义文艺成为“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的武器，他们却要使社会主义文艺成为欣赏和同情“中间人物”的工具，这就是我们同邵荃麟同志的根本分歧。

总之，邵荃麟同志关于不解决问题，不表示鲜明的态度的主张是反动的。它阻止文艺作品向旧事物作斗争，企图使他们的“中间人物”来同我们的英雄人物分庭抗礼，争夺地盘，唱对台戏，进而夺取我们整个文艺阵地，变成宣扬“阴暗心理”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场所，他反对塑造英雄人物，不让共产主义精神去教育人民，使社会主义文艺失去战斗性和革命性。他还号召向批判现实主义者学习，企图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拉回到资本主义的歪路上去。

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大力描写 工农兵火热的斗争

暨南大学中文系二年级 林凤西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毛主席向作家指出了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到工农兵中去，写工农兵，写工农兵火热的斗争，为工农兵服务。

但是邵荃麟同志却大唱反调，他要作

家“熟悉什么就写什么”，说什么“平平常常与轰轰烈烈的問題，根本问题是生活基础。各有各的路子，各有各的风格”。他实际上是在说，作家不必要到工农兵中去，不要以反映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作为首要任务，原来的生活基础是什么就写什么，“熟悉什么就写什么”。对于这种对抗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反对作家与工农兵结合、改造思想感情的主张，我们不能不生气，不能不说话。

社会主义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服务，就必须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反映社会主义的

政治和經濟基础，反映轰轰烈烈的三大革命运动。今天，全国人民正在投入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伟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条战线上的英雄人物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面对着沸腾的斗争生活，作家描写工农兵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斗争和生活，比其他一切题材都更能集中而充分地反映社会的本质，表现生活的主流，有更大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有更强烈的战斗力。因为这些重大题材本身所包含的深刻的社会意义，给作家提供了这种可能。然而，“写中间人物”论者不断嘲笑我们写工农兵英雄人物的作品“简单化”、“概念化”，似乎这些作品不足以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不能概括时代风貌，表现时代精神，而“从一粒米”却能“看大千世界”，这岂不是可笑的逻辑吗？

作家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点去认识生活，长期地深入工农兵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从工农兵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虽是平凡但具有普遍意义的小事情，加以集中概括，也可以写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时代的某些本质特征的作品。这是不应当反对的。但是，第一，这些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东西，必须是工农兵群众火热的斗争海洋中的一朵浪花，而不是什么“身边琐事”；第二，必须看到，这种从侧面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总有其局限性，它的意义和作用，是不能与正面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作品同等看待的。而邵荃麟同志主张写的“平平凡凡”却是要求文艺描写那些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人物”，写他们平庸琐碎的生活事件，他们的卑微渺小的精神面貌，他们的

阴暗低沉的心理状态，并且以此来反对文艺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反对描写工农兵火热的斗争。

事实证明，许多革命作家，正因为他们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指导下，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艺术地表现人民群众在党领导下的伟大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才创造出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作品。如陈其通的《万水千山》，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假如这些革命作家不对轰动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对打破封建枷锁的史无前例的土改运动，不对我国人民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的合作化运动等重大事件中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进行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的艺术概括，就不能产生这些能够反映时代风貌，表现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不能给人以巨大的教育和鼓舞。

邵荃麟等同志提倡写“平平凡凡”，其实质是要引诱作家脱离工农兵群众，躲避火热的斗争，拒绝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拒绝进行思想改造。他们害怕艰苦，不革命也不敢革命，因此就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腐朽思想找借口。说什么都要写“重大题材”势必使创作路子变窄，势必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欣赏的要求。我们不可否认每个作家所写的都应当是他所熟悉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革命作家，他应当首先熟悉的，不正是当前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生活和斗争，不正是这些生活和斗争中的先进人物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吗？革命作家不能只是停留在过去所熟悉的东西上面，而是要按照时代的要求，去熟悉他应当熟悉的东西。作家

应当努力熟悉新的时代，熟悉新生事物。因为事物总是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许多过去熟悉的事物，今天已变成了旧事物，在人们前进的道路上，还将不断出现许多不熟悉，甚至使人惊奇的事物，这就需要作家以革命的热情去熟悉它，热爱它，描写它。如果听从邵荃麟等同志的话，最后只能使作家的创作源泉枯竭，拼命去写身边琐事，走上资产阶级作家的老路。

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方向的前提下，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题材、体裁、风格的多样化。我们认为：这和提倡反映工农兵火热的斗争，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并不相抵触。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题材本身就包含着无限丰富的内容，工农兵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也是丰富多彩的，各行各业的英雄也各有值得人钦敬和学习的地方，这些都是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就是表现同一题材，各个作家由于风格不同，所采用的形式、手法不同，艺术概括能力的差异等，也会

产生作品内容和艺术形式不同的多样化的作品来，决不会象“写中间人物”论者所侮蔑的那样必然产生“简单化”、“概念化”的作品。所以，题材的丰富性首先应该是工农兵火热斗争这一重大题材范畴内的丰富性，要求革命作家更深入工农兵群众，热情地发现不平凡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新生事物，更深刻、全面地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反映我们的时代。

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列宁、毛主席早就期望作家描写重大题材，描写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描写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新生事物，描写群众的火热斗争。今天社会主义时代为革命作家创造了空前的有利条件，一切革命作家应当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回答这个要求，应当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写工农兵群众，做工农兵群众忠实的代言人。应当大力描写革命的现实题材，描写建国十五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题材，更好地反映我们的时代。

英雄人物的“现实性不足”吗？

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二年级 文新兵

邵荃麟等同志主张“写中间人物”，反对创造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一再指摘写英雄人物的作品“现实性不足”，或者“现实主义不够”。他的理由说来说去，无非就是：

英雄人物是“少数”，是“萌芽”，而“中间人物”是“大多数”；写英雄人物的大公无私、共产主义风格，没有写矛盾错综复杂的“阴暗心理”，人物的“现实性”就不足。这

里面有一个怎样看我們的社会主义现实和怎样看社会主义文艺的现实性問題。

我們知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推倒了三座大山，而成了国家的主人。在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以后，中国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随着毛泽东思想逐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中国人民发挥了最大的革命精神，进行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旧中国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在这社会主义时期中，出现过多少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象舍身救火的向秀丽，象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象“脚踏污泥，心怀天下”的董加耕这样的英雄模范人物，象馬口英雄、大寨英雄、南柳英雄、大庆英雄和南京路上好八连……正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英雄人物成了我們伟大时代的主角，在我們的社会中，英雄人物已是大量的社会存在，可以肯定，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随着毛泽东思想更进一步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更多的英雄人物，更多的英雄事迹，将会更成千迭万地涌现。

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人物来自人民群众之中，又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相連的联系。我們决不能同意“写中間人物”論者把我国人民的大多数丑化为“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这种論調企图取消现实生活和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的群众基础，从而在政治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但是，伟大的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决不是少数人所能抹煞的。以农民来说吧，他們中間的大多数并不是动

搖于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的所謂“中間人物”。早在一九二七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中，就充分估計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农民彻底摆脱了几千年来个体經濟的鐐拷，经过互助組、合作化，走上人民公社化的道路。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和《介紹一个合作社》等文章中，都反复強調指出：我国农村中广大貧下中农，是积极拥护集体經濟，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是农村中的大多数，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而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間的是上中农，是少数。

积极拥护集体經濟、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农民中的大多数，所以，我們正是依靠这些大多数，才克服了集体化道路上的各种歪风邪气，战胜了連續三年的自然灾害，取得粮食大丰收，巩固了人民公社的集体經濟，保证了农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之中，出现了无数动人心弦的新事物。就拿我們熟悉的潮汕地区来说吧，一九六三年，潮汕一带苦旱八个月，地富反坏分子和一些上中农在幸灾乐祸，可是广大貧下中农，坚信在党的领导下，人定胜天，终于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了旱魔。有个老貧农，从早晨到深夜，天天挑水上山，硬是把他包管的五亩山园地浇得綠油油一片。有一位女队长，和三个妇女包管一架大水車，其中一个富裕中农成份的妇女不想干了，队长对另外的妇女說：“踏吧，她的脚是走自发的，我們的脚是要走社会主义的。我們拉滿弓射給他們看。”三个人还是坚持踏下

去。又有一个生产队长，领着社員在田头安营下寨，夜以继日挖井打水，家里的母猪病死了，也顾不得管。他老婆埋怨說：“母猪死了，家当丢了一半啦！”他回答說：“家当，我們的家当在队里。沒有队的家当，那有各家各戶的家当。”象上面所說的老貧农，好干部，在农村，何止千万，他們絕不是邵荃麟同志所說的“少数”。他們坚决走集体化道路，大公无私。但是，邵荃麟等同志却硬說农民身上充滿“旧的东西”——“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負担”，有着“阴暗心理”、“自私自利”，說他們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間。我們不禁要問，邵荃麟等同志到过农村調查研究沒有？邵荃麟等同志自己有“阴暗心理”，却硬說別人有“阴暗心理”，这完全是閉着眼睛瞎說話。这种对广大貧下中农的污蔑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是我們社会主

义现实的写照。英雄的时代、英雄的人民向作家提供了創造英雄人物最雄厚的现实基础，同时也要求作家創造更多的英雄人物，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把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新人新事和英雄人物英雄事迹，进行集中概括，塑造出有社会主义教育意义和艺术感染力的英雄人物形象，来歌颂我們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人民，来教育和鼓舞人民，乃是革命作家义不容辞的責任。但是邵荃麟同志却說什么写英雄人物的大公无私、共产主义风格，就“现实性不足”。这不过說明他脱离生活，对我国人民新的精神面貌和大量涌现的先进人物視而不見。邵荃麟同志首先用阴暗的眼光来歪曲实际生活，然后又以此为根据来反对描写体现无产阶级理想的英雄人物。他对英雄人物“现实性不足”的攻击是完全沒有根据的。

評李贄《忠義水滸傳序》

黃海章

李贄在《忠義水滸傳序》中，肯定《水滸》為發憤之作。他說：

“太史公曰：《說難》、《孤憤》，聖賢發憤之所作也。由此觀之，古之聖賢，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

至於發憤的原因何在，他以為由於施耐庵、羅貫中，憤於宋王朝政治的腐化，使“大賢處下，不肖處上”；憤於宋王朝對外來侵略的異族“納幣稱臣，甘心屈膝于犬羊”，“馴致夷狄處上，中原處下”，所以作《水滸傳》以泄其憤，而復以“忠義”名其傳。

這種看法，和金聖嘆截然相反。

金聖嘆以為“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發揮出來，只是飽暖無事，又值心閑，不免伸紙弄筆，尋個題目，寫出自家許多錦心繡口，故其是非皆不謬於聖人。後人不知，却于《水滸》加上‘忠義’二字，遂并比于史公發憤一例，正是使不得。”（《讀第五才子書法》）

在我們看來，如果施耐庵作《水滸》，只把它當做飽暖無事後的消遣品，從而賣弄筆墨，則整部《水滸傳》，一點社會意義也沒有！而轰轰烈烈的農民反抗腐惡統治階級的革命鬥爭，也就毫無足道，只可使人們對於施耐庵塑造《水滸》人物的生動形象加以欣賞欣賞而已！這完全是一種謬論，而且和他自己的論點也發生了根本的矛盾。

聖嘆《第五才子書序二》說：

“施耐庵傳宋江，而題其書曰《水滸》，惡之至，進之至，不與同中國也。而後世不知何等好亂之徒，乃謬加‘忠義’之目，嗚呼！忠義而在水滸也哉！”

按這樣說，施耐庵之傳《水滸》，豈不是抱有極端憎惡強盜作反、加以強烈的譴責的企圖么？這種“有所為”的創作態度，可不是和孔子作《春秋》一樣么？這可不是否定了所謂“飽暖無事，伸紙弄筆”的說法么？

金聖嘆害怕把“忠義”歸于水滸，會造成“無惡不歸朝廷，無美不歸綠林，已為盜者讀之而自豪，未為盜者讀之而為盜”（《第五才子書序二》）的危害，所以激烈地反對李贄的言論。他完全站在反動統治階級的立場來咒罵農民起義，是無可置疑的。但是李贄肯定把“忠義”歸于水滸，就它的內容分析起來，是否完全正確呢？我看並不是這樣。

《忠義水滸傳序》說：

“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理也。若以小賢役人，而以大賢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猶以小力縛人，而使大力者縛于人，其肯束手就縛而不辭乎？其勢必至驅天下大力大賢而盡納之水滸矣，則謂水滸之眾，皆大力大賢有忠有義之人可也。”

這段話說明，由於腐惡的統治者對大力大賢加以強烈的逼害，使他們走頭無路，最後只

得“逼上梁山”，而这些都是富有忠肝义胆的人物，所以“忠义”在水滸而不在朝廷。

他在《焚书·因記往事》中，評論“橫行海上三十余年”的林道乾，也有同样的用意。

他痛恨当时統治階級的腐朽无用，一般高談理学的先生，“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終日匡坐，同于泥塑。……其稍学奸詐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則面面相覷，絕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輩，故临时无人可用。”而象林道乾一类“有才有胆有識者”，不但弃置不用，“又从而弥縫禁錮之，以为必乱天下，則虽欲不作賊，其势自不可尔！設国家能用之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当胜兵三十万人已邪？又設用之为虎臣武将，則閩外之事，可得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惟举世顛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驅之使为盜也！”

逼林道乾下海，和把林冲等逼上梁山，“逼”的方式虽有不同，其被逼为盜則一。李贄大胆地把“忠义归于水滸”，以为“水滸之众，一一皆忠义”，受到了金圣叹等反动文人的批駁，他的思想，虽然没有接触到階級压迫和剝削这个根本原因，在当时來說，無疑地是进步的，这一点我們应加以肯定。

但是李贄所謂“忠义”的内容，是包涵着許多錯誤的。他以为最忠义的莫过宋公明。宋公明又是怎样“忠义”呢？他說：

“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辞，則忠义之烈也。”

原来李贄认为宋公明最忠义的所在，就在于：“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就在于最后能使梁山泊的弟兄們“同死而不辞”！

我們以为宋江之值得贊美，是在于他平日能“闢人之急”，“扶人之困”，使山东、河北一般英雄好汉，都称他为“及时雨”。是在他上了梁山以后，能把英雄們团結在一起，对腐惡的統治者进行大規模的武装斗争。如三打祝家庄，連破高唐州、青州和华州等的胜利，都是在他亲自参与和直接指揮下取得的。他扩大了梁山泊的队伍，壮大了梁山泊的声势，威懾着統治階級腐惡的集团，使官兵“不敢正眼覷他”，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农民革命巨流，冲击着封建社会黑暗势力的統治，这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然而在宋江身上，也存在着許多弱点。他原来是一个“刀笔吏”，又是一个“孝义黑三郎”。他存在着“显亲扬名、封妻蔭子”一套封建思想，他并不想反抗朝廷，而只痛恨貪官污吏。由于他好結識江湖好汉，私放晁盖，闖下祸来，中間几經曲折，直到自己遭到刺配，作了囚徒，于是一肚牢騷，在潯阳樓題反詩，被判死刑，押赴法场，被梁山泊好汉搶救出来，感到走投无路，才和弟兄們跑到水泊中，树起“替天行道”的农民革命的旗帜。尽管积极方面立下了不少功勋，起了不少巨大的推进作用，然而妥协投降的思想，也时时冒出头来。他的心灵深处，銘刻着“招安”两字。他一再声明：“某等众人，无处容身，暫占水泊，权时避难。”“見今宋江暫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竭力报国。”在所作《滿江紅》詞中，也明白說出“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定”。尽管李逵对着他圓睜怪眼大叫說：“招安！招安！招甚鳥安！”并一脚把桌子踢起，攪做粉碎，也不能根本打破他“招安”的迷梦。又由于在梁

山泊队伍不断地壮大中，大量吸收了从統治阶级內部分化出来的人物，如卢俊义、秦明等，这些都是“暫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的人，于是梁山泊妥协投降的路綫，日以发展，虽有李逵、魯智深等激烈反对，終不能挽回頹势。結果招安的愿望达到了，悲剧也从而产生。不但把梁山泊农民起义的英雄业绩，完全断送，即宋公明自己最后也受到封建統治者的逼害，服毒而死。在他服毒之前，还恐怕李逵将来要造反，忍心騙他前来，用毒酒酖死他。他自己以为这样，才彻底做到了“决心不負朝廷”，达到了“忠”的最高标准。而一般弟兄們，“服毒自縊，因死而不辞”，也就是最高的“义”的表现。

李贄对宋公明领导梁山泊英雄們冲击封建黑暗势力方面，倒沒有給以高度的贊扬，而对于他妥协投降走向灭亡的“招安”路綫，反而极端贊美，认为宋江之所以成为大忠大义，就在于“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对宋江的被毒死和一般剩下来的弟兄們陪他同归于尽，也贊扬为“忠义之烈”。他以为：“燕青涕泣而辞主，①二童就計于混江，”②这些中道逃亡不甘为統治阶级一网打尽的人，不过“小丈夫自完之計，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辱。”这是彻头彻尾的维护封建統治的反动言論，然而某些評論李贄的人，却一字不提。

《忠义水滸传序》中，談到宋江受了招安以后，“犯大难，成大功”，当然南征方腊，也包括在里面。我們試看这种功績，是不是值得贊扬的？方腊这支部队，是堂堂正正的农民起义軍。在起义以前，方腊曾涕泣对农民說：

“今賦役繁重，官吏侵漁，农桑不足以供应。吾儕所賴为活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錙銖遺。夫天生蒸民，树之司牧，本以养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无慍乎？且声色狗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糜費之外，尚賂西北二虏銀絹以百万計，皆我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輕中国，岁岁侵扰不已，朝廷奉之不暇，宰相以为安边之长策也。独吾民終岁勤，妻子冻餓，求一日飽食不可得，諸君以为何如？皆憤憤曰：唯命！”（《清溪寇軌》）

这些话充分表达出农民群众反抗腐恶的統治者残酷剝削和苟安媚敌的憤怒的呼声，他們的反抗朝廷，是农民阶级对于封建統治者的斗争。残酷腐恶的統治者，采取狡猾的手段，把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欺騙出来，利用他們强大的力量，去消灭方腊統率的农民起义軍，使他們两败俱伤。結果方腊被打平了，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也陣亡过半了，这是何等的悲剧！然而李贄也把它算进“犯大难成大功”里面！可見他认为农民反抗，归根到底，还是“犯上作乱”的行为，是應該把它消灭的。他在《藏书》中，把黃巢列入《盜賊传》，张角、张魯列入《妖賊传》，反对农民革命的态度，非常明显，这也是维护封建制度一种突出的表现。

他还以为《水滸传》的作者，“憤二帝之北狩，則称大破辽以雪其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称灭方腊以雪其憤。敢問雪憤者誰乎？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强人也，欲不謂之忠义不可

① 宋江等平定方腊后回京途中，燕青曾苦劝主人卢俊义与自己一同辞官退隐，卢不从，燕青泣辞而去。见《水滸传》一百十九回。

② 二童，指童威、童猛。混江，指李俊。燕青走后不久，李俊詐中风疾，乞宋江軍馬先行，留童威、童猛照看自己，宋江应允。后来三人与費保等八人出海投化外国。亦见《水滸传》一百十九回。

也。”可見他认为“灭方腊”和“大破辽”一样，同是“忠义”的行为。把抵抗外来的侵略者和消灭农民起义軍等量齐观，也就明显地表示他是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场，来大談其所謂“忠义”！

所以在肯定李贄的在反封建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更应当看到他的思想中，也仍然有其階級的烙印。单就他对《水浒传》的評論來說，不能因为他把“忠义”归于水浒，和反动文人金圣叹站在相反的方向，就从而全部肯定下来。照上面的分析，他所贊扬的“一意招安专图报国”的路綫，实际上就是妥协投降的路綫。他所贊扬的：“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辞”的“大忠大义”行为，实际上就是任由統治者一网打尽最蠢笨的行为。李贄有这些思想，我們并不奇怪，因为他到底还是封建士大夫，不可能站在农民革命的立场，来歌頌农民革命，而止憤恨封建統治者把有才能的人物“逼上梁山”而已。然而“逼上梁山”，最后还希望他們“走下梁山”，为封建統治者卖力，为封建統治者“殉节”。这正証明李贄的階級的局限性。

一九六五年二月五日

周谷城的艺术創作論的反动实质

毛 軍

我們在《艺术創作和欣賞中情与理的辯証关系》(見《学术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六期)一文中曾經指出：周谷城先生把艺术創作和欣賞中的思想和感情分割开来，模糊了思想对情感的支配和制約作用，片面強調情感，把艺术的审美教育作用归結为动人情感，把艺术欣賞看作是离开理性認識的“直觉”活动，从而否定艺术作品中的思想性、艺术的社会認識和教育意义，实质是否定了艺术的社会作用。

否定艺术的思想性从而否定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資產階級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种慣用手法。周谷城所制造的一套关于創作的“理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这种故技的重演。不过，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当前的时代条件下，周谷城大肆宣扬这种“理論”，其目的不仅为了否定社会主义文艺的战斗作用，还企图为資產階級文艺爭夺地盘，爭夺生存权利，最后复活資產階級文艺。因此，我們必須通过进一步的批駁，彻底揭穿他这一套創作論的反动实质。

—

我們知道，任何階級的作家，不管他承认不承认，在他进入創作之前，总是要考虑他为了什么而創作，他的創作对于本階級是否有利。无产階級作家，出于高度的革命責任感，更必須自觉严肃地考虑为什么人的問題。在今天，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我們一切創作活动的出发点。所以，理解文艺的社会作用，絕對不能离开无产階級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不能离开当前时代的要求这样一个根本前提。

可是，周谷城却不加区别地把不同階級性质的創作，都归結为純粹个人的主观活动。他认为，創作活动只有在“生活发生波瀾或震动”、“問題或矛盾”时，也就是在客观现实与“自我相违”，使“生活陷入不稳定，甚至很痛苦的境界中；主客观互相分离，心、身不能統一”时，才可能发生。而創作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摆脱这种“痛苦难安”的“困境”，使心、身統一起来。按照这种說法，似乎一切創作活动都是和階級无关的，在社会生活中也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一种創作活动呢？回答是否定的。毫无疑問，創作活动主要是通过作家个人的方式进行的，但这并不是决定文艺的社会性质和社会作用的根据。“作家，

是階級底眼睛、耳朵和聲音”(高爾基)，他的作品一經產生，便成為一定階級的武器和工具，便要在社會生活中起這種或那種性質的作用。就拿周谷城說過的“無病呻吟”的詩來說吧，在他看來，這是沒有任何思想感情要求的“為作詩而作詩”的東西。實際上，“無病呻吟”本身，就是沒落階級的一種精神病態。這種詩歌的製作，正好起了填補他們精神上的空虛的作用。不僅如此，“無病呻吟”的詩引導人們脫離政治脫離現實生活，本身就起着為反動沒落階級服務的作用。

其實，周谷城自己所鼓吹的那種創作，就帶有明顯的階級性質。在陽光燦爛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感到“與現實不能相安”和“痛苦難安”，這種心理和情緒的產生，難道是無緣無故的嗎？毛澤東同志早就說過，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後，世上就沒有過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周揚同志也曾經指出：“只有那些在精神和沒落階級相聯系的作家、藝術家才不願看見我們生活中的這個偉大變化，不願承認新事物的強大的生命力，對着蓬勃發展的新的現實，他們所感到的，只是黑暗和缺點。有陰暗心理的人，看一切事物都是陰暗的，對於他們，陰暗就是唯一的真實。他們害怕看到光明，社會主義的逼人的光芒，他們看了是很不舒服的。這完全是他們的階級本能的反映。”（《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所謂現實“與自我相違”、“心、身不能統一”、“痛苦難安”，拆穿了，就是在社會主義革命中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的陰暗心理和絕望情緒的表現。鼓吹主觀的自我表現、自我滿足和自我擴張，無非就是想要我們的文藝，象電影《早春二月》、小說《三家巷》、《苦鬥》那樣，去頑固地表現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情緒、願望和要求，並用它們來腐蝕革命人民的鬥志。周谷城要求作家的，難道不正是這些見不得人的東西嗎？

由此可見，把文藝創作說成是超階級的个人主觀活動，不過是周谷城企圖通過切斷文藝和社會階級的關係，抹煞不同階級文藝的不同的社會作用的區別，從而掩蓋他的理論的階級實質的一種手段。

社會主義文藝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是無產階級作家必須遵循的唯一方向。周谷城把一切創作的目的都歸結為追求個人“主觀”的解脫，實際上就是蠱惑今天的作家不要表現工農兵，不要反映社會主義的偉大鬥爭生活，而把文藝當作個人的事業和工具，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為了達到從根本上取消社會主義文藝的戰鬥作用的目的，周谷城還在主觀和客觀的關係上大做文章。

主觀和客觀的關係問題，在我們看來，就是作家的世界觀和社會主義社會客觀現實的關係問題。對那些靈魂深處還有一個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王國的作家來說，要解決主觀和客觀的關係問題，根本的道路，就是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投身到工農兵群眾的火熱鬥爭中去，積極參加三大革命運動，在革命實踐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不斷地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逐步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這樣才能與迅速發展的社會主義客觀現實相適應。不這樣，就永遠不能真正成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作家。可

是，周谷城却根本反对作家世界观改造过程中的这个革命轉化。他从自己的矛盾調和論出发，认为通过創作，就可以使主观征服客观，从而解决主观与客观现实的“尖銳的对抗冲突”；就可以摆脱主观不适应客观的“困境”，达到心身統一的“无差別境界”。这种主张，无异于要那些人原封不动地保存灵魂深处的資產階級王国，为他們拒絕参加革命实践、逃避思想斗争制造理論根据。其实质也就是反对作家深入工农兵，反对作家建立馬克思主义世界观，反对文艺战綫上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資產階級思想的斗争。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的今天，周谷城所“另辟”的这条“可行之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作家革命化的关键，是革命文艺的灵魂，是革命文艺对历史发展产生推动力量的源泉。否定了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作家的創作过程中的作用，就不可能有革命文艺。这就是周谷城的創作論所追求的目的之一。

二

当然，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周谷城是不敢明白說出来的。所以，他在談到文艺的社会作用时，說什么“防洪水、除猛兽、驅蛇龙”，“打倒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需要“机智勇敢”，因而要通过艺术去“填补不足”；說什么“农民因被土豪劣紳蹂躪”，因而需要通过艺术去伸张“正义、公道”，以“糾正錯誤”。这种模糊不同階級艺术社会作用的、超时代的胡言乱語，許多同志已駁斥过了。我們要問的是：生活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周谷城，难道真有那么一副热心肠，要文艺去“填补”或“糾正”那已成为远古的原始社会或封建社会的“不足”和“錯誤”嗎？事情显然不是这样，也不是他的真話。周谷城这种主张，完全是針對今天“我們的生活”提出来的。

矛盾斗争是产生一切“問題或麻煩”的根源，这是周谷城反动創作論的思想核心。在他看来，只要社会存在矛盾斗争，生活就只有“劳”，沒有“逸”；只有“紧张”，沒有“輕松”；只有“紀律严明”，沒有“心情舒暢”。人們的“心、身不能統一”，陷入痛苦的“困境”，是因为生活上发生了“矛盾”、“波瀾”和“震动”。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斗争，更是社会产生一切不幸的“乱源”。总之，在周谷城眼里，社会的一切矛盾斗争，特别是階級斗争，都是要不得的，“錯誤”的。“爭則乱，乱則穷”，誰要搞斗争，就会“痛苦难安”，天下大乱。因此，要根除“問題或麻煩”，就必须去掉这个“生活的反面”，創造一个取消一切矛盾斗争的“无差別境界”，这才是“最理想”的。

显然，社会主义的客观现实是不能滿足周谷城的要求的。所謂“无差別境界”，历史上不曾存在过，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是根本不存在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結。在有階級存在的社会內，階級斗争不会完結。在无階級存在的社会內，新与旧、正确与錯誤之間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結。建国十五年的历史証明，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着階級斗争，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的斗争，“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

变”的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也是不以周谷城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为了彻底消灭资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我们还要把阶级斗争继续下去。对于那些害怕革命、害怕斗争或者抗拒革命、抗拒改造的人来说，自然是“痛苦难安”的。他们企图逃入一个“自自在在，无罣无碍”的“境界”里去躲藏起来。但是，在充满阶级斗争的今天，这是永远不会实现的。这便是周谷城所感到的严重“不足”的真实内容。而这种“不足”，在他看来，正是阶级斗争所造成的。

正是因为这样，周谷城竭力想把反映阶级斗争这一内容从我们文艺作品中轰出去。他认为，对自然的斗争或对社会的斗争，如克服自然灾害，打倒帝国主义的斗争，都是“客观的斗争”，是“礼所涉的范围”，而不是“乐所涉的范围”。只有“主观”的“情感”才是“乐所涉的范围”，也是“一切艺术所涉的范围”。在这里，周谷城表面上似乎是在划分“礼”和“乐”，主观和客观所涉及的范围，实际上他是在给我们的文艺规定应该表现什么和不应该表现什么的范围。按照这一规定，文艺作品只应该表现“主观情感”，根本不能触及阶级斗争，不能反映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而他的所谓“情感”，正如前面所说，不过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心理和情绪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扩张。如果依了这种主张，让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塞满我们的文艺作品，社会主义文艺岂不就蜕化为资产阶级文艺？

也正是因为这样，周谷城拼命鼓吹他的一套时代精神“汇合论”，要求我们的文艺去表现所谓“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的，“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思想意识，以“填补”和“纠正”客观现实的“不足”和“错误”。许多同志已经指出，这种“汇合论”的反动实质，就是阶级调和论。它一方面企图通过文艺，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和平共处，合二而一，从而抹煞阶级斗争；另一方面是公开提倡表现反革命精神的文艺，也即资产阶级文艺，并为它们制造合法存在的根据，让它们大摇大摆地向无产阶级、向社会主义进攻。

这就不难理解：周谷城所要“填补”的“不足”和所要“纠正”的“错误”，就是要求文艺起取消阶级斗争的作用，反对我们对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进行斗争；他的所谓要“改造客观现实”，就是公开鼓吹用资产阶级文艺去“改造”社会主义的客观现实；他的所谓“获得较高的新现实”，实际上就是利用文艺去帮助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旧现实。这就是周谷城所宣扬的在超阶级幌子掩盖下的艺术社会作用论的真面目。

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是革命文艺一项重大而光荣的任务。毛泽东同志早就要求我们的作家，必须把“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以“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创作实践也证明，只有通过反映阶级斗争，才能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帮助人们指出前进的方向；才能充分体现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时代精神，即是推动我们时代向前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才能更好地表现在斗争中涌现的新人物，更好地歌颂和表彰人民群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丰功伟绩。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好作品，如《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

忘記>……等等，正是因为能够深刻地反映了階級斗争，才在生活中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的作用。资产阶级反对文艺反映階級斗争，就更说明了反映階級斗争的正确和必要。他们愈是反对，我们就愈加要坚持。

也许周谷城会辩解，他不是还主张文艺要起“发扬优点”的作用吗？但是，这丝毫也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请问：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现实，既然是“生活的反面”，存在着那么多“不足”，非要通过文艺“纠正”它的“错误”不可，那“发扬优点”云云，岂不是一句骗人的鬼话吗？同时，按照周谷城的说法，艺术创作只能在生活发生“波澜或震动”、“问题或矛盾”，陷入了“痛苦难安”的“困境”时产生，那么，在“生活圆满，心情舒畅”的“无差别境界”内，又何来艺术创作呢？没有艺术创作而大谈艺术“发扬优点”的作用，岂不是十足的欺人之谈。周谷城抬出“发扬优点”只是把它当作幌子，掩人耳目，以达到他的所谓“填补不足”和“纠正错误”的目的。

•

艺术的社会作用问题，归根结蒂，是艺术为哪一个阶级服务的问题，是帮助革命的阶级推动历史前进，还是帮助反动阶级把历史拉向后退的问题。文学艺术要起到帮助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就必须坚持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周谷城则与此相反，他的取消阶级斗争、取消社会主义文艺、复活资产阶级文艺的创作论，彻头彻尾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把历史拉向后退的。

第一次鴉片战争时期 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活动

师 东

第一次鴉片战争前，英国的对华贸易和鴉片走私都居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首位。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比较后起的美国，一开始就追随着可耻的英国鴉片贩子的后面闯进了中国。美国在中国的鴉片走私的不断增长，形成了英美在华竞争的早期矛盾。但是，英美两国在贩毒方面的利益冲突，并不妨碍它们在扩大对中国侵略方面的合作。当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鴉片战争的时候，美国就站在英国一边，加入鴉片战争，对中国进行侵略。

一

美国进行鴉片贸易这一罪恶活动，除了在英商手里转运大量的印度鴉片以外，还横渡重洋到更远的土耳其去贩运。直到一八三四年，贩运土耳其鴉片一直是美国的独家生意。^①美国进行鴉片走私的手段，是非常阴险和毒辣的。它不仅是秘密走私，而且在船上挂着美国国旗公开走私，更有武装走私。美国的鴉片商们，特制一种“飞剪式”船，航行特快，“武装齐全”，“专门包揽”鴉片走私。^②对于这种船只，当时我国人称之为“快蟹”或“扒龙”，“炮械毕具，亡命数十辈，运桨如飞，所过关卡均有重贿，遇兵役巡船向捕，辄敢抗拒，互致杀伤”。^③

美国政府当局是鴉片走私的公开保护者，美国领事包庇袒护鴉片贩子的活动，协助他们逃避中国官吏检查。^④美国政府的各级官员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鴉片贩子或者与之有密切关系。那些经过“遴选”的美国驻广州的历任领事们，都是由同鴉片走私这种“非法业务关系密切的商人充任”的。鴉片战争后，来中国强迫清政府订立望厦条约的美国特使加勒·顾盛，就是在中国住了二十五年之久的大鴉片贩子约翰·顾盛的本家兄弟。就在顾盛使团带领的舰队中，不仅配有强大火力的军舰，而且有一只装满鴉片的

① 参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235—236页。

② 摩理逊：《麻塞诸塞海洋史》，第277—278页。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以下简称《卿书》）第37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卷，第3页。

④ 参见：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109页，及陈庆华：《鴉片贩子的美国人》一文。

“飞剪船”“羚羊号”。在这只船上充当押运员的唯一乘客，则是使团的秘书、美国国务卿的儿子韦伯斯脱。象这样一个号称“堂堂正正”的外交使团，还不忘用外交官的身份作掩护，用军舰护航来贩运鸦片，那么，其他美国商人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连美国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供认：“美国旗正被广泛地利用来包庇鸦片走私，美国公民即使不是以公司身分，至少也是以个人身分积极从事于这种贸易。”^①

由于鸦片贩运是一种走私，而且美国商人走私的手段又特别多，所以简直无法统计美国通过这种罪恶贸易掠夺了多少中国财富，甚至连象英国的鸦片贸易那样不完整的统计数字也没有。不过，据一八一七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估计，这一年各国向中国贩卖的鸦片总数是四千五百担，其中属于美国的竟达一千九百担之多，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

在进行鸦片走私的同时，美国还特别注重对中国进行文化思想的侵略。即派遣大批带着特殊使命的人物来中国，以宗教、慈善、文化的“和平”事业为招牌进行活动。“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式船来到中国”。——就这样，物质的鸦片和精神的鸦片一同坐着美国鸦片船，走私贩运到了中国。这些“宗教家”、“慈善家”和“和平使者”的活动经费，是“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及商人手中接受捐赠”。^②他们到中国来，举凡侵略者所需要的他们都干。如做鸦片贩子的帮手和宣传员：“他们都說，鸦片无害于中国人，象酒无害于美国人一样。”^③如用开医院、办慈善以及文化事业来骗取中国人对他们的好感，暗地里为美国资产阶级当收集中国情报的侦探，成为美国资产阶级心目中的“中国通”。

可见，早期美国对中国的关系，就是用杀人不见血的手段，进行侵略与掠夺的。

二

对资本主义侵略者来说，战争政策是“和平”政策的继续，“和平”政策是战争政策的准备。对华贸易和鸦片走私居于首位的英国，终于在一八四〇年借口中国的禁烟问题，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一向觊觎中国的美国资产阶级，在鸦片战争时期采取了极为狡猾的两手政策，即一方面与英国合作，积极怂恿和支持英国的侵略活动；另一方面又以“中立”者自居，与清朝政府维持“正常”的关系。其手法是：

第一，同英国周密计划与合作，以不同手段来破坏中国的禁烟运动。一八三八年，美商就同英商一起，破坏广州地方当局处死鸦片贩子的正义行动。一八三九年初，又对清朝官吏在美商馆附近处死鸦片贩子的事件而同英、荷等国领事联合提出所谓“抗议”，甚至美国领事士那还煞有介事地降下了美国旗，并且表示如得不到国务院的指示或环境有所改变，决不再悬挂起来。^④很显然，这是用所谓强硬态度来进行恫吓。但是，不久以

①④ 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109页、88页。

②③ 摩理逊：《麻塞诸塞海洋史》，第278页。转引自《卿书》第39—40页。

后，当林則徐到了广州，雷厉风行地展开禁烟运动的时候，狡猾而善观风色的美国侵略者，一方面把滿載鴉片的美船开往别处，另一方面更利用英国寻求同盟者的要求，和英国合作，把美国沒有来得及运走和无法隱藏的鴉片，由英国义律統一代交，并把繳烟問題有意扩大成国家关系問題。

这样，美、英两国便完成了在抵制禁烟运动上的合作。英国的义律負責“保持外国人的团结一致来和林氏的措施相抗衡，而情愿为美国人手里的印度鴉片負担完全責任”，而美国領事士那則負另外“兩項責任”：（一）、“証明美国人的鴉片貿易关系不能同英国相提并論”，以求脫出身来，为美、英的共同利益而活动。（二）、“解决有关甘結性质方面的爭論”。^①

第二，用战争叫囂和对中国的武装恫吓来帮助英国实现其侵略政策。美国政府虽未正式派兵参战，但是美国却派了以海軍副少将加尼率領的东印度舰队前来中国进行所謂“武装保侨”，而它負担的实际任务則是：如果英国的侵略計劃能够实现，那么，英国所攫得的一切权利，美国也要同样得到；如果英国被打敗，加尼的舰队就要加入战斗，以作英国的后援。

此外，那些美国政客和传教士們，更千方百計地为英国的侵略战争辯护和叫好。当时美国前总统亚当斯姆，把自己妝扮成历史学家，歪曲事实真相，謬称英国发动战争是正当的，“战争的原因是叩头”，是中国“妄自尊大”。^②在中国传教多年的倪維斯也为英国发动侵略叫好。他說：“不管正当不正当，这个战争是按照神意用以开創我們与这个广大帝国关系的新紀元的”。^③一八四〇年四月随美国海軍分遣队来到中国的随軍牧师，也为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事业而祷告。^④

第三，在“中立”幌子下，一方面发战争財，一方面帮助英国实现侵略計劃。鴉片战争中，中英貿易断絕，美国就利用“中立”的合法地位，几乎包攬了广州的进出口貿易，特别是从广州到香港的貨运。当时美国在广州的大商人福士，曾經記載了他們在广州是怎样发财的情形。他說，在林則徐下令封鎖对英貿易以后的几个月，“美国人經办着陆上調配所的业务，香港、广州間的運費比香港、美国之間的運費还要高”，“每一种能浮得起的船只，都硬被投入服务”；其中“还有不少空閑下来的英国船”，也非法地挂上美国旗参加載运。英国貨不能直接运进广州了，美国人就“为英国人把貨物运进运出，有时在香港把英国貨装上船，繞一趟馬尼拉，不开仓就运回广州，通过这样一套形式，来逃避法网。”^⑤这不仅使美国資本家发了大財，而且对英国侵略者也确实帮了大忙。請看义律的招供吧：

①② 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83、84、94頁。

③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43頁。

④ 参见同①，第88頁。

⑤ 同①，第85—86頁。

“亲爱的福士：你没有采纳我的意见，离开广州，女王真的应该向你好好道谢。我们已经把我们所有的货物运进，并且运出大量的茶、丝。……现在当令的贸易已经过去，而且我们身边有了强大的力量，我们能够使中国人屈服了。”^①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美国在这段期间，不仅没有中止鸦片走私，而且更大规模地运来鸦片，有的甚至跑到新加坡大量收购贩运。他们到那里后，先放出鸦片再也不能进中国的空气，造成烟价猛跌，他们便乘机以每箱二百五十元的低价在一天之内，收购七百多箱，然后运到防范较松的福建沿海以每箱二千五百元的高价走私。^②甚至就在广州的美国商馆之内也屯集了一批没有交出的鸦片，而在林则徐销烟之后即刻便在广州私售了。

鸦片战争期间，美国玩弄的这套两手政策，一方面帮助英国侵略者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成为英国侵略者的帮凶，而另一方面又在“中立”的幌子下，乘机发了战争财。但是这些都没有满足美国侵略者的欲望。早在一八三九年五月，即林则徐在广州厉行禁烟的时候，在广州的美国商人就联名上书美国国务院，要求“美国政府应该采取直接行动；如果认为合宜，也不妨会同英、法、荷兰等国或其中任何一国的政府，共同行动，力求在安全体面的基础上和这个帝国建立商业关系”。^③这个呈文还提出了强迫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其中包括使节驻京，公布确定的税则——实际是协定关税，开通商口岸，外人能享有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的特权，等等。

这个早就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中国的美国侵略者，在当时所以没有公开地同英国联合发动战争，主要是因为它还没有作好侵略中国的全部战争准备，同时它也感到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实行这种两手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比直接发动侵略战争或公开武装参战更为有利一些。

从美国本身来看，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它对外武力扩张的主要对象还在家门口。即在北美大陆兼并印第安人和墨西哥的土地，以扩充其领土；在中、南美洲开始同西班牙等争夺殖民地和市場。那时候，它还无力全面策划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同时，在这个时期，它还没有在太平洋上建立起武装侵略亚洲大陆的中間站，而绕道好望角来中国一程就要半年的时间，各方面的补给都是很困难的。加上其武装力量特别是舰队的力量当时也还是薄弱的。因此，美国要发动大规模的侵略中国的战争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特别是从当时的具体形势来看，英国是贩烟的主凶（美国的鸦片虽然也很多，但是它用狡猾的手段逃避了中国人民斗争的锋芒），禁烟运动主要打击的外国对象是英国。这种形势被美国乘机利用了。美、英两国虽然在贩烟和侵略中国这些根本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但在它们之间，作为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侵略者，又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它们早就为争夺中国的市场开始了竞争。禁烟运动的兴起，必然会影响英国的对华贸易，这就使美国有了可乘之机：它一方面装着“恭顺”的样子向清政府缴烟（实际上是大量运走轉

①③ 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87页。

② 陈庆华：《鸦片贩子的美国人》，载《美国侵华史料》一书。

卖),来騙取清政府的好感,爭取繼續保持“正常”通商,以利用英国对华貿易的危机来夺取英国在中国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积极慫恿和支持英国发动这次战争,企图假英国之手来打开中国大門。

基于上述这种情况,美国政府就制定了一个保证不論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有利可图的“一石二鳥”的两手政策,充分暴露了它的阴险狡猾的本性。

三

鴉片战争期間,中国人民以英勇不屈的反抗精神,給了英国侵略軍以沉重的打击。但是,腐朽了的清朝政府却采取了妥协、投降的政策,終於在一八四二年与英国侵略者訂立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約。南京条約的訂立,使清朝政府在外国資本主义面前暴露了它的腐朽的本质。于是在过去还不敢貿然发动侵略战争的美国侵略者看来,这是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大好时机。这时,在美国上下,迫使清政府訂立不平等条約、扩大英国在鴉片战争中所掠得的权益的叫嚷,一时甚嚣尘上。

在南京条約签字仅一个多月后,率領东印度舰队协同英国侵略中国的加尼,就“心情急迫”地向清朝当局要求,享有英国在中国取得的一切权益,以便美国“商人”与“别国商人一样”得到清政府給他的“施恩惠顾”。^①接着,他更以国家代表的姿态在一八四三年一月向两广总督提出咄咄逼人的带有最后通牒性的信件,“再一次声明,凡皇帝陛下給予他国商人的一切,本国元首也为他的商人作同样要求。”^②美国国会也迫不及待地通过決議,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对中国采取措施。国务卿韦伯斯脫为了选择适当的人选和制定詳細的計劃,他遍发信函到紐約、波士頓、沙伦等地,广泛征求美国第一批侵华商人和最早的美国的“中国通”們的意見。曾經是旗昌洋行主要人物的約翰·福士,代表七个波士頓商号和个人起草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建議书”。在这个“建議书”中首先提出,使团要帶領一支“令人尊重的舰队”,用炮舰政策对清政府进行威胁和恫吓,以达到“步英国人的后尘,訂定一項条約”的目的;同时提出执行炮舰政策的最有效的策略是直接北上威胁京畿地区。^③

美国政府在研究了这些建議之后,决定派遣美国著名政客、律师、国会外交委员会委員加勒·顾盛为全权公使,以国务卿的儿子韦伯斯脫充任秘书,組成了一个庞大的使团。同时,派出了一个以伯駕为司令、由四艘軍舰組成的舰队随行,作为对清政府进行武装恫吓的資本。

美国資产阶级和鴉片販子們出錢培养起来的“中国通”——美国的传教士、医生等,在鴉片战争中他們是美国参战的积极鼓吹者和謀士,是負責刺探中国情报的間諜。到美国

① 朱士嘉:《十九世紀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輯》,上册,第3—4頁。

②③ 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95、118—120頁。

正式派出侵华使团时，他們搖身一变又成了使团的外交官和顧問。巴駕、裨治文、卫三畏等，都在顾盛到中国后，先后被选用为中文秘书。巴駕更是早在福士的“建議书”中就被指名推荐的人物。在美国政府看来，这些人“具有比当时在广州的其他任何欧洲人都好的語文知識，具有对中国仪节和思想方法以及美国对华关系早期历史的更好了解”，而且他們在中国早已用各种手段“贏得”了“尊敬和信任”以及非常的“荣宠”。^①

就是这样一個由一批最狂妄的侵略分子組成的，帶着压迫中国訂立不平等条約这种公开侵略目的，用軍舰武装起来的侵略使团，却被当时的美国总统称之为“和平使团”和“和平使者”。^②

在美国总统給他的“和平使者”顾盛的証书中，委任他来中国有用一切手段来“簽訂所能締結的任何条約”的全权。^③ 国务院的訓令明确規定，顾盛来华的主要目标，是爭取使美国“按照英国商人享受的同样优惠条件”，进入南京条約所規定开辟的口岸。目的是要說明美国侵略中国是“和平的”，是“沒有怀着敌意或有意找麻煩的目的而来的”，是为了“表示敬意和好感，并創立友好来往的途径”，是要建立两国在“重大政治問題”上的“彼此关注和有益关系”，^④ “俾使中美两国之間不致发生任何妨害和平的事端”。“象这样两个大国的政府應該和平相处。两国應該彼此尊重，聰明行事，方是适宜的，也才是合乎天意的。”^⑤ 但是，“如果中国方面許給其他任何政府的臣民比給予美国公民的特权或商业便利更大，美国政府就会觉得无法和中国皇帝繼續以友誼和尊敬的态度相处。”这就是美国国务院最后指示給顾盛要向清政府“表示”的“坚决的詞句和断然的态度”。^⑥ 这就是美国式的“和平相处”！这就是美国侵略者的邏輯！

顾盛这个“和平使者”，在一八四四年二月到达澳門，立刻对两广总督提出要求。表示要帶着舰队到北京覲見皇帝，非欽差大臣不与之談判，甚至连两广总督程喬采都不承认是談判的对手。而同时他却又胡說什麼压迫中国訂立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約是“商議两国民人相交章程”，是訂立“永远公議和好各条約”。^⑦ 他来中国是为“会商两国万年和好之雅誼”，是“欲与中国以礼相交”。^⑧ 甚至于他率領“兵船进迫黃埔”，也是一种“不过欲与中国修睦和好”的美意！^⑨ 但是，如果清政府不接受他提出的条件，那就是侮辱了他的“修睦和好”的誠意，他就要“把这种行径，看作中国企图再与一个大国战争的証据”，^⑩ 他就要使“中国人民再罹兵燹之灾”。^⑪ 他更进一步对清朝的官吏进行恫吓說，新組成的两支舰队，已經从美国先后启程开往中国了。^⑫

一手拿着橄欖枝，一手拿着箭的美国强盜，的确比英国侵略者的侵略手法要“高明”得多。心有余悸的清政府在这种甜言蜜語和炮舰政策的威胁下，終于被迫派出了鴉片战争中著名的投降派、曾經同英国訂立南京条約的耆英同顾盛談判。在談判过程中，連耆

①②③④⑤⑥ 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126—127、124、123、121—122、124、126頁。

⑦⑧⑨⑩ 朱士嘉：《十九世紀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輯》，上册，第9、13、17、13頁。

⑪⑫ 末尔：《国际公法汇覽》，第5卷，第418—419頁。轉引自《卿书》，第60頁。

英这个卖国老手也說，这些美国强盜“时而恭順，时而桀驁”，“情詞甚为閃爍”，“人頗狡猾”，“动以北駛为挾制之詞”。

最后，經過了几个月談判，終于一八四四年七月訂立了美国对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約——望厦条約。在这个条約中，不仅包括了南京条約的主要內容，而且在不少方面得到了扩大。所以連美国資产階級学者也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說“这是美国的巨大的胜利。”^① 顾盛自己說的更明白：“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須感謝英国，因为它訂立了的南京条約，开放了中国門戶。但現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必須感謝美国，因为，我們將这个門戶放得更寬闊了。”^②

望厦条約的訂立写下了美国侵略中国历史的第一章。它有力地說明了，美国侵略者很久以来就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但是直到一九四九年我国革命已經取得胜利的时候，美帝国主义者还在老着脸皮說什么美国对中国的“友誼”。打开別个国家的大門，让美国进去充当統治者，这就是美国的“文明”，这就是至今还被美帝国主义继承下来并加以“发扬光大”的对別的国家“友誼”的传统！

①② 詹逊：《美国外交史》，第1卷，第488頁。轉引自《卿书》，第79頁。

貫串着周谷城的 《中国通史》(近代部分)的一条黑綫

史 群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結合，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但是，周谷城的《中国通史》近代部分，却极尽歪曲和篡改的能事。他一方面美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它們涂脂抹粉，另一方面又极力丑化和抹煞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他的《中国通史》的近代部分中，始終貫串着一条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汇合”論的黑綫。本文仅就其中的若干論点加以揭露和批判。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应声虫

整个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历史，都貫穿着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尖銳对立，中国人民不断进行着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民族革命斗争。这本来已經是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种起碼的常識；但是，周谷城却用所謂“工国农国互相激荡”^①这个沒有阶级內容的命题，来掩盖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历史，从而把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对立斗争的关系歪曲成先进的“工国”与落后的“农国”的“互相激荡”的关系。說什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要在中国取得通商自由”^②和使落后的中国在先进的工业国的“激荡”下走上“产业化”的“現代国”的道路。^③

事实胜于雄辯。在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不但对中国进行了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教育的侵略，而且还多次采取了血腥的軍事侵略，先后发动了第一次鴉片战争，第二次鴉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軍侵略中国的战争……。通过这些侵略战争，它們同清朝政府訂立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約，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約，中国的領土主权完整被破坏，中国的經濟命脉被控制，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被掌握。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使中国长期地处于民生凋蔽，工业落后，农村破产的状况。这些无可辯駁的历史事实，有力地揭穿了周谷城所謂帝国主义帮助中国

① 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下同），第301頁。

②③ 同①，第304頁、430頁、405頁。

实现“产业化”的“现代国”，原来就是帝国主义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既然周谷城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說成是帮助中国实现“产业化”，这就使他在美化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同时，又极端恶毒地丑化和污蔑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第一，周谷城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中国人民逼出来的。他說，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因为“林则徐除令外商服从烟禁之外，又須令外商当局繳出杀人凶手，如此情形，終于成了中英开战之端。”^①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因为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情绪，既已紧张到了极度，这自然引起帝国主义的反攻。英法联军攻打中国，便是这样引出来的。”^②而帝国主义組織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是因为义和团倡“仇教灭洋”宗旨，“这样一来，各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兴問罪之师了，于是发生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八国联军入京的惨举”。^③第二，周谷城认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仅一定是失败的，^④而且“民族反抗，仅得了較前更悲痛的结果！”^⑤义和团“引出了丧权辱国之大祸”，“使中国国际地位低落到最甚”的地步。^⑥

按照周谷城的邏輯，那就是：只許帝国主义侵略，不許中国人民反侵略。在侵略者面前，只能投降，不能抵抗。如果起而反侵略，就会迫使“各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兴問罪之师”。而战争的结果又注定是要失败的，失败則带来了“丧权辱国”的大祸，造成“国际地位低落”。这是赤裸裸地为帝国主义开脫罪責的奴才哲学。

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战争無論何时何地总是由剝削者、統治者和压迫者阶级挑起的。”^⑦近代中国历史上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許多次战争，就是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事实上，中国人民并没有跑到美国、英国、日本……这些国家的領土上去侵略它們，而是这些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侵略。中国人民反对罪恶的鸦片貿易，反对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約，反对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是为了免除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剝削。中国人“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正义反抗，怎能說是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帝国主义“不得不兴問罪之师”呢？

中国人民对付帝国主义这只凶恶的老虎，从来没有絲毫的怯懦。众所周知，在历次反侵略斗争中，象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三元里的抗英斗争和沿海、沿江一系列英勇斗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中法战争时期中越人民并肩抵抗法国帝国主

① 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第308頁。

② 周谷城：《中国近代經濟史导論》。轉引自罗思鼎：《周谷城的历史观面面观》，载《光明日报》，1964年11月19日。

③⑤ 周谷城：《中国近代經濟史导論》。轉引自李星等：《周谷城的反动历史观和时代精神汇合論》，载《人民日报》，1964年9月3日。

④ 参看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第308—309頁。

⑥ 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第340頁、357頁。

⑦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31頁。

义的侵略战争；甲午战争中邓世昌等的顽强抗战；义和团在华北地区的伟大反帝斗争，等等，都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英勇反抗精神。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全面总结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过程，指出：“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①在这样铁的事实面前，周谷城怎能说是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都是失败的并带来了“丧权辱国”的大祸呢？

周谷城不去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去揭露清朝政府的投降卖国罪行，反而极力美化帝国主义，丑化和诋毁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周谷城看来，帝国主义既是那样可亲可爱，自然不应反对；而它又是那样可畏可怕，自然反对不得。那么，中华民族的出路就只能按周谷城所提倡的“互相依靠”、“互相融合”、彼此“合作”，甚至“如胶投漆，融成一团”。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近代史，歪曲为“工国农国互相激荡”的历史的本质所在。

在政治上怎么“融合”法呢？谁“融合”谁呢？周谷城虽然没有很明白地说出来，但是从他在把义和团运动描绘成“丧权辱国”的同时，对李鸿章等“与各国妥协”，使“南方各省因此也得保偏安”^②的百般赞扬看来，周谷城所提倡的无非是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国的道路。至于中国同帝国主义实行经济“合作”，那他是说得十分清楚的。他说，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特别是对中国的投资贷款，这都是它们把非洲南洋等“最落后的地带活跃”起来，“已经产业化”之后，^③来帮助落后的中国进行“产业化”的。周谷城在一九四六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之现阶段》一文说得更清楚：“事实上，正因为一方（指中国）落后，一方（指美帝国主义等）先进，最好合作。落后的一方，可以提供劳动；先进的一方，可以提供资本；只要平等合作，当是无碍的。”这就很清楚了，周谷城所标榜的什么“平等合作”，什么帝国主义帮助中国实现“产业化”，实质上只不过是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商品和资本输出的市场，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产地。

可见，周谷城宣扬中国在上政治上、经济上和帝国主义“合作”的道路，根本不是什么“产业化”的“现代国”道路，而是彻头彻尾的殖民地化道路。周谷城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如此卖力美化帝国主义，丑化中国人民，岂不就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应声虫吗？

阶级“汇合”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标本

从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封建统治者逐步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人民要反抗帝国主义，自然不能不反抗封建主义。“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26页。

②③ 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第343页、430页。

的走狗。”^①因此周谷城要抹煞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鼓吹中国走殖民地化的道路，自然不能不抹煞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鼓吹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合作。在《中国通史》的“近代中国”部分，周谷城使用了种种或明或暗的手法，无孔不入地贯彻他这个反动观点。

我們知道，太平天国革命，乃是近代中国一次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但是，周谷城却把这次反封建斗争說成什么“种族战争”，同时又将太平天国各项政策的反封建内容统统加以阉割，使这次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变成一次没有阶级内容的种族“反抗运动”，抹煞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此外，周谷城还通过歪曲“图强御侮运动”来极力美化封建地主阶级，使这个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腐朽的反动的阶级，变成在“图强御侮”、“富国强兵”方面，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大有作为的进步阶级。

周谷城說，近代中国“图强御侮运动的目的，在效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以图强御侮。这可分为三方面：经济方面的图强御侮，政治方面的图强御侮，教育学术方面的图强御侮。”“图强御侮运动如果成功，中国或可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现代国。”^②什么是经济方面的“图强御侮”呢？他說，由于“中国被各国压迫”，“使中国人无论朝野上下，一致致力于新式生产事业之创兴”。“我国创办一般的新式工业，为时很迟。最初创办的人，为大官僚李鸿章、张之洞等。”^③什么是政治方面的“图强御侮”呢？他說，这“可分两项述之：一曰戊戌维新，二曰辛亥革命。”什么是教育学术方面的“图强御侮”呢？他說，这主要是张之洞提倡的废科举、兴学校、派留学；而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代表了“图强御侮”的“时代精神”。^④

非常清楚，周谷城所谓要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图强御侮运动”，是包罗了以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搞的洋务运动、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戊戌维新运动和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即它是由三个不同性质的运动“汇合”而成的一个统一的运动。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是从不同方面去推进这个运动，共同“合作”，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可见，周谷城的“图强御侮运动”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阶级“合作”运动。

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是不是象周谷城描绘的那样呢？显然不是。李鸿章、张之洞等搞的洋务运动，是封建地主阶级洋务派企图借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洋枪、洋炮、军舰、机器之类）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运动，也是他们为适应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把中国推上半殖民地半封建轨道的运动。因此这个运动根本上是反动的。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在不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础上，改革当时腐朽的封建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以发展资本主义，求得民族独立。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517页。

②③④ 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第359页、404页、361—362页、392页。

这是一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着一定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辛亥革命是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以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可见，被周谷城“汇合”成“图强御侮运动”这个“统一整体”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不论是就其阶级内容来说，还是就其路线纲领来说，都是各不相同，不但不可能“汇合”成为“统一整体”，而且是根本对立的。历史事实表明，李鸿章等洋务派办的“洋务”，一方面把新式海陆军用来镇压人民大众的反抗和作为个人的政治资本，一点也不愿拿出来抵抗外国的侵略，一心一意媚外卖国；另一方面他们办的新式工业，“只许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厂”，实行经济垄断，多方压制民族资本的发展。而戊戌维新运动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这两大问题。谭嗣同、康有为都曾痛陈亡国的惨祸。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还提出工商业民营的口号，要求“富民”，反对洋务派的垄断政策。攻击洋务派的“变法”是“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是“饰粪墙，雕朽木”，毫无用处。同时，维新派还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和封建文化代言人展开了激烈论战，提倡资产阶级“民权”思想。这个时候，洋务派同封建顽固派站在一起，疯狂地向维新派反扑。张之洞写了《劝学篇》，提出“中体西用”，拼命攻击变法维新运动。“戊戌维新”终于被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的联合力量所扑灭。戊戌维新只是一个改良运动，不是革命运动，它并不要求推翻清廷的统治，康有为等始终还是“忠君”的。这个运动虽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它决不可能救中国，不可能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变为一个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则是要以革命的暴力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这个运动不仅被封建势力看作洪水猛兽，而且也为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所拼命反对。孙中山就曾指责过他们“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①

试问：在当时的这样三派政治势力，怎么能够“汇合”成“一致努力”的“图强御侮运动”呢？难道维护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洋务运动，同推翻这个统治的辛亥革命运动能够“汇合”成为建设“资产阶级的现代国”的“图强御侮运动”么？

对历史的公然歪曲和篡改

周谷城为了宣扬他的阶级“汇合”论，在他的《中国通史》修订版中，尽管五四运动的历史只是占着极少的篇幅，但却把历史早已作出的结论全盘加以否定。他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的直接产物”，是出席和会的“代表”“电告国内”而爆发的，其性质“本是对外的”，它的影响是“对德和约，拒绝签字”、“爱国情绪，益加高涨”、“文化运动从此产生”，从而“直接或间接增加国家之实力”。^②这是对五四运动的历史的公然

^① 《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73页。

^② 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第446—447页。

歪曲和篡改。

我們知道，中国在和会上的失敗，只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那是极其深远的。自一八四〇年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虽然经过多次革命斗争，但都没有能够解决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仍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特别是在以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封建军阀统治下，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这时，中国农民的斗争，虽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起义，但它却此起彼伏，持续不断地发展着。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的白朗起义军。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已开始壮大起来了。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工人阶级的斗争也不断发展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望到了一盏明灯。中国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潮，“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只是运动爆发的一个触发点罢了。至于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性质，也是极其明显的。第一，五四运动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爆发的；第二，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展开了一场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向封建文化进行了有力的冲击，使人们对旧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不满，促使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它为伟大的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通过中国的卖国贼进行的，所以，中国人民在反对“巴黎和会”这一帝国主义分赃会议的同时，人民的义愤，又集中在卖国贼的身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就是这时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具体内容；第四，特别是六月三日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大规模投入战斗，成为运动的主力，使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毛主席说：“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①这些论断，科学地说明了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科学地说明了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使中国从此走上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五四运动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可是，周谷城在他的历史著作中歪曲了五四运动爆发的真正的根本的原因，篡改了五四运动的阶级内容和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这在实质上也就是否定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化，取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92页、545页。

潮安县江东农业中学毕业生情况調查

管 集 調

一

江东是潮汕平原地区韓江下游的一个沙洲，是潮安县江东公社的所在地。公社现有人口四万四千八百三十四人，耕地面积二万六千二百三十五亩（平均每人0.58亩）。主要种植甘蔗、黄麻、花生、水稻、甘薯等五大作物。

为了解决貧下中农子女升学問題，公社党委决定在公社的所在地办一間中学。这就是一九五八年四月創办的江东农业中学。創辦初期，学校沒有耕地，实行了学生在校学习四天，回生产队劳动三天的制度。一九五九年，公社拨給学校耕地二十七亩，初步建立了学校农场，实行了学生在校学习四天，校内劳动一天，其余時間回队劳动的半耕半讀制度。在公社党委和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到了一九六三年，学校农场已經有耕地七十多亩。从一九六四年开始，改为学生在校学习四天，劳动一天半，其余時間回队劳动。农忙假和寒、暑假（共計九十天），都安排学生回队参加劳动。

在学生的学习內容、課程設置和教学方面，学校創辦初期，基本上采用了原来全日制中学的一套。經過了不断摸索，不断改革，特别是比較明确地貫徹了“面向农村，面向当地，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办学思想之后，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基本上建立了与半耕半讀制度相适应的課程和教学方法。现在，学校設置的課程有：政治、語文、数学（包括代数与几何）、化学（常識）、物理（常識）、植物、动物、选种、作物栽培、植物保护、會計。并另設应用文和书法的專課。农业課程着重講授当地作物的种植，并采取了課堂教学

与田头教学、书本知識与老农經驗結合的方法；會計、应用文等課程注意实习，以提高学生运用能力；在語文、数学、理化常識等教学中，都特別注意貫徹“少而精”的原則。在学制方面，原来采用全日制中学的制度，到一九六四年，改为不分高初中的四年一貫制。

几年来，江东农业中学貫徹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坚持半耕半讀的制度。到一九六四年，学校已有四届毕业生，共一百四十六人。其中初中毕业生一百二十三人，高中毕业生二十三人。其中除了十人是来自邻近的磷溪、浮洋、彩塘等公社外，其余都来自江东公社各个生产队。絕大多數的毕业生都回原来的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江东农中各届毕业生的基本情况见附表）

二

为了考察和研究半耕半讀的农业中学这种新型学校所具有的优越性和有关巩固提高的問題，我們对江东农业中学毕业生的情况，进行了一次普遍的調查。調查所得的材料表明，在一百四十六个毕业生中，在各个工作崗位上大致有下面的一些共同的表现：

第一，“以农为荣，以农为乐”，安心农村生活，热爱农业劳动，关心集体利益，有些还成为在农村宣传党的政策、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传播科学技术知識的骨干力量。在四届毕业生当中，絕大多數都能自觉回村劳动。他們一回村，就能馬上安下心来，赤脚扛鋤，老老实实参加集体生产。如去年暑假高中毕业的李俊潮，虽然体質較弱，但刚毕业回乡，就連續几个月参加了队里的积

肥，每天挑粪走几十华里。当他听到“高中毕业的‘秀才’还回乡挑粪”的議論时，他不但沒有受到影响，还认为多干这又重又脏的活才是最大的愉快。也是刚在去年高中毕业的张落举，他在校学习成績和表现都很好，毕业时很多亲友一再劝他去参加高考，但他坚决回村参加农业劳动。回村后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还常常蹲在田間钻研农作物的栽培和病虫害的防治等农业生产技术，并为队里的生产出了不少好主意、好办法。一九六一年初中毕业生刘森树，虽然右手残废，但他想出各种办法克服困难，几年来坚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九六四年，就做了一百七十五点六一个工，受到群众称赞，还被評为五好社員。这些从农中出来的青年人，安心农村，热爱农业，听党的話，处处服从分配，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如一九六一年初中毕业的洪篤藩，几年来服从队里的工作需要，先后担任过生产队会计、抽水机手、民兵、广播員、业余夜校和耕讀班教师以及团支部書記等职务，对每一种工作，都能認真去做，他說：“为了集体利益，我服从工作需要。”去年高中毕业生蔡訓政，回村劳动几个月后，就被公社調去搞粮食工作，又代理公社出納两个月，后又又被調去担任农业知識課教师訓練班的輔導工作，最近該訓練班結束，便又回村劳动。几个月来，虽然被調来調去，但他都能愉快接受任务。

毕业生林瑞表，前几年当江东公社洪水成灾时，父亲正好重病在家，但他公而忘私，全力投入抢救集体財物，社員很受感动。在下庄村的毕业生庄泽宏、庄树藩、庄若深等，都在一九六三年抗洪斗争中被評为“抗洪功臣。”初中毕业的林展乔，去年春节前夕，他与一些社員給队里运甘蔗到汕头糖厂交貨，他看到卸蔗时不时有一些掉下河里，便顧不得天气寒冷，跳进河里把掉下去的甘蔗一根根打捞起来，一直在水里浸了一个上午，为队里捞回七百多斤甘蔗。他在团支部里也常常带动青年积肥支援穷队，帮助困难戶。初中毕业生洪篤藩，几年来也是时刻关心集体生产。去年队里推广包秧头肥先进技术时，一些社員怕

麻煩，強調沒有工具装肥料。他便把家里的脸盆等盛具拿出来使用，許多人在他的带动下，也跟着这样做，及时解决了工具不足的困难。今年二月的一个夜晚，洪篤藩和村里的一些青年正在公社戏院看戏，听到說韓江水涨，他心想：“春水涨，生产队在江滩晒的四、五千斤菜脯，如果看守的社員已睡着了，就会被洪水浸掉，那将会給队里带来很大的損失！”他連戏也不看，馬上与另一青年跑回村里发动社員一同把菜脯搶收回来。一九六一年初中毕业的林先佩，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当了队里的記工員，他白天坚持与社員一起到田間劳动，在劳动中注意观察了解各人的出勤情况、工作质量，評工記分做到分厘不苟，改变了以前的記工混乱情况，促进了社員出勤生产的积极性，連續三次被評为五好記工員，別的公社都来参观学习。毕业后回到队里当會計員、出納員的庄杰芝、黄士深、庄两发、庄若深、庄树桐等人，社員都說他們办事公道，能为大家着想，做到“日清月結”，“当天評工，当晚上牆”，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得到公社、大队的表扬奖励。还有一些毕业生，在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中能坚持原則，明辨是非，起了很好的作用。例如水头大队的毕业生蔡訓政，当他知道村里少数上中农不主张按国家計劃多种水稻，便挺身而出，与他們进行辯論。毕业生林展乔为了了解几个进行投机倒把的牛販子的材料，常常利用空余時間，不辞劳苦远道进行調查，揭发了他們的犯罪活动。

分布在江东公社各个生产队的毕业生，有百分之五、六十担負了各种社会职务。如在井美片的三十二个毕业生当中，就有二十一人兼任了队干部、团干部、青年組长、民兵、宣传員、业余夜校教师和耕讀班教师、抽紗組长等工作。他們敢挑担子，一年四季，不管是炎夏与寒冬，常常早起晚睡，坚持把工作做好。如毕业生蔡訓政，刚回到村里几个月，就把村里的十四个青年組織起来(其中高小毕业四人、初中肄业二人、初中毕业六人、高中肄业一人、高中毕业一人)，进行学习、科学实验、做好事等活动。每星期安排了一

到二个晚上学习毛主席著作、时事政治和紅色小說等，三个晚上学习农业生产技术知識，一个晚上唱革命歌曲，还利用白天的中午練写毛笔字。他們已先后学习过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他为了使大家更好学习，还跑往县城买来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人手一册。柚杭村的萧介仰，从农中毕业回村后，也把自己村里的二十多个青年組織起来，进行学习、开荒、办夜校等，成为队干部的好助手。一九六一年初中毕业的蔡松水，也由于近两年来坚持用业余时间积极認真办好夜校，被評为夜校五好教师。有些参軍的毕业生在部队中的表现也很好，如中庄大队的庄英賢、庄泽竟和庄貞全，都是“五好战士”。

第二，具有从事农活的本領和农业科学技术的知識。江东农中毕业的学生，絕大多数身体健康結实，在劳动中有力头。他們的肩挑能力，一般來說，刚从农中初中毕业的学生，以五华里的距离計算，男的能挑一百斤左右（少的也可挑七、八十斤），女的能挑七十斤左右（少的也可挑五十多斤）；高中毕业的学生，男的能挑一百二十多斤（少的也可挑一百斤），女的能挑八十多斤（少的也可挑七十斤）。高中毕业的学生，經過半年到一年的生产劳动鍛炼，一般都能达到当地农民的水平（当地农民一般男的能挑一百六十斤左右，女的可挑一百一十斤左右）。而当地的全日制中学高中毕业生，男的一般只能挑八十多斤，女的只能挑五、六十斤，而且耐久力也較差，比不上农中的毕业生。

他們的农活技能，虽然还不及一般农民那样熟練，但已能掌握一般农民所掌握的各种基本操作（只有犁、耙能力較差）。一般來說，初中毕业生所掌握的生产技能有：当地五大作物（水稻、甘薯、甘蔗、黃麻、花生）和主要蔬菜（白菜、蘿卜、芥兰、莧菜、菠菜、菜花、茄）、豆类的种植季节、放种（水稻播种能力較差）、除草、施肥、培土、起畦等，此外，还能进行主要农作物的小型田間試驗、栽培和病虫害的防治。高中毕业的

除上述的这些技能以外，还懂得作物的輪作安排，水稻、小麦、玉米等作物的杂交，当地几种土地（沙土、壤土、粘土）的鉴定等。在农药方面，他們懂得使用六六六、敌百虫、敌敌畏、滴滴涕，西力生、波尔多液、石灰硫磺合剂、松脂合剂、魚藤、毒蝇紙等，并且大都能够自配自用。他們在参加生产劳动过程中，常常还能在植物保护、防治虫害、田間試驗和輪作安排方面出主意、当“参謀”。一些新的农业科学技术措施，也往往是他們带头推广的。有个別毕业生，还担負起生产队技术員或助理技术員的工作。这些都是当地一般农民所不及的。如去年高中毕业生张藩举，一回村，就参加了村里的技术改革小組。他在去年晚造就栽培了三个优良品种。工余时间，他不是捉虫，就是采集作物病虫害的实物标本。一发现庄稼有什么病虫害，他就即时向队长报告，建議采取措施防治。如去年晚造，他发现了队里的稻田发生紋枯病，便馬上建議队长采用西力生混水泼施。恰好合作社这时沒有这种农药，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想起了在学校学习《植物保护学》中講到的另一个防治紋枯病的方法：用石灰硫磺合剂噴射。他便远道买回了硫磺和貝灰，自己进行配制，和社員們一連干了好几天，噴了十多亩地，终于把紋枯病抑制下来，避免了晚造的損失，得到社員的称贊。此外，如水稻的稻瘟病、白叶枯病，甘薯的麦蛾虫、龟甲虫、瓢虫等，他都能首先发现和提出防治建議，有队里的“植物医生”之称。农中初中毕业的庄泽宏，在推广农业技术措施方面，也成了队长的好助手。从去年到现在，他带头在队里試驗推行了几項新技术措施：一是去年早造，他把龙湖公社的先进放种技术——用磷粉做基肥育稻秧的方法带回队里，提出进行試驗，虽然部分社員和公社技术員还有怀疑，但他坚持試驗，效果很好，使水稻抗寒力、耐风力、耐晒力增强，今年已在全村推广；二是在去年晚造从澄海县引进了“澄丰种”，进行疏播試驗，收成很好（二斤澄丰种收成达五、六百斤），今年也在队里推广；三是在麦地、薯

地等試用氨水，結果使作物生勢好，产量增加。此外，还試驗了溫水催芽等，对队里、村里的生产起了促进作用。在农中的毕业生当中，象张藩举、庄泽宏这样积极钻研理論、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敢于革新技術，是比較普遍的。同时，他們也能虛心学习老农的生产經驗，如去年毕业的蔡訓政，在短短的时间里，除了积极进行田間試驗、推广农作物保护措施外，还先后認真地向本村的老农蔡怀欽、蔡木助、蔡少三等学习了播种、間苗、施氮肥等方面的經驗。

由于他們有强健的体力，又掌握了一定的农业生产知識技能，因此他們毕业回村，就都有比較强的生产劳动本領，并且很快就达到或超过了当地农民的劳动生产能力。下表是中庄村的农中毕业生去年所做的劳动工的情况：

姓名 类别	庄鏡榮	庄澤惠	庄友瑜	庄深武	庄樹桐
毕业年度	一九六一年初中毕业	一九六一年初中毕业	一九六三年初中毕业	一九六三年初中毕业	一九六四年高中毕业
劳动工	255.02	287.72	196.00	195.16	117.04
备注	一、还有庄貞全、庄澤竟、庄英賢三个毕业生已于一九六三年参军，未算入内。 二、一九六四年中庄村劳动力平均劳动工236；最强劳动力所做劳动工288.5。 三、庄樹桐于一九六四年开始回村生产，这里为五个月的劳动工数。				

江东农中毕业生的一般文化知識水平，如写应用文——书信、条据、會議记录、计划、总结、宣传稿等的能力，会计、珠算的能力，一般比当地的全日制中学毕业生强。不少毕业生回队里担任會計員、出納員等工作，受到群众好評。

根据我們的調查，在一百四十六个农中毕业生之中，只有三个毕业生回乡后表现不好，他們的思想觉悟較低，很少参加集体劳动，群众意見較多。

三

在进行江东农中毕业生的情况調查时，我們着重了解与毕业生有比較密切关系的各方面的人的反映，主要是干部、群众、学生家长和学生本人的意見。調查所得如下：

来自干部的反映 生产队长、貧农蔡端品說：“我們队里回乡的中学生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有几个普通中学毕业回来的学生，就是不大安心生产，整天溜东溜西。有一个高中肄业生，还經常一个人躲在草棚內念书，对队里的事情一点也不关心。可是农业中学毕业出来的学生蔡訓政就完全不同，安心生产，社会工作样样爭着去干，生产技術上也掌握得比較好。看来，还是边劳动边讀書好，練了功夫，又練了思想。”井美大队党总支書記刘宝秋也說：“我們大队有两个中学毕业生，同样是初中毕业，同样是貧农家庭出身，住在同一个村，又都是女孩子。她們在本村念完小学之后，一个进城讀書，一个进了江东农业中学。毕业出来后，后一个在村里积极参加劳动，样样都会干，前一个回来劳动不到两天，就跑掉了。”井美大队干部刘仁宏、刘欽榮等，还算了这么一笔賬：他們大队有从普通中学毕业回乡的知識青年二十人，在政治思想上、劳动上、社会工作上表现好的有六人，占百分之三十；农业中学毕业生九人，表现好的就有八人，占百分之八十八点九。大队里四个中学毕业的建党对象中，就有三个是农中毕业生。他們认为：有沒有劳动鍛練，是保証中学毕业生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刘仁宏还說：“农中毕业生都掌握了一定的农业技术，如我队毕业生刘楚桂发现了晚稻白叶枯病，就及时告訴生产队长，并提出防治措施；毕业生刘森树，右手残废了，不但照样劳动，而且还出色地完成了生产队的会计工作。他已經学会用左手拨算盘，左手写字，运用自如。群众說，‘农中毕业出来的学生就是过得硬！’”樟厝洲等大队的干部都談到农中毕业生的特色，他

們說：農中畢業回鄉參加生產的青年一勤，二儉，三安心，四聽黨的話，五能文能武，堪稱是農村的好後生，他們不但繼承了父輩的事業，有勞動人民的本色，而且又比父輩高出一籌，學會了文化技術，更有辦法了。

這些幹部在贊揚農中畢業生的同時，也提出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劉仁宏說：“現在這些學生大都是吃‘解放飯’長大的。他們還不懂得舊社會的苦，農業中學還要加強階級教育。”水頭大隊總支書記蔡鎮祥說：“現在農村的技术革命發展很快，農業中學必須趕上形勢，要不斷提出新的要求，以新的技術豐富教學內容，不這樣，學生畢業出來就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井美大隊的一些幹部說：“現在農中畢業的部分學生可以當‘兵’，但還不能當‘將’，希望學校注意通過一些社會工作等，逐步加強學生的社會活動能力，並且要使學生能更熟練的寫報告、做總結，回到農村就更有用處了。”紅砂大隊幹部也說：“現在農中生打算盤還不是很熟練，希望把珠算課教得更好。”

來自貧下中農群眾、家長的反映 學生家長、貧農林欽禮說：“有人說讀農中沒前途，學不到東西，我看不是。我的孩子梓標是三年前江東農中畢業，回鄉生產的學生，現在他在隊里當統計，人家說他能寫會算，計勞動，項項農活都來得，你能說他學不到東西，沒有前途嗎？”畢業生林展喬的家長、老貧農林海敬這樣說出他的心裏話：“我的孩子展喬大前年從農中畢業回來，堅持白天勞動，晚上‘算數’、開會、當民兵巡邏放哨，事事帶頭，農中真正為我們教出了好子弟。”他還說：“以前，從學堂走出來的都是文弱書生，除了識幾個字之外，有的連五谷都不分。他們讀書讀到戴眼鏡，肩不能挑，手不能持，象這樣的讀書人有什么用？我們的孩子從農中畢業出來，我就很滿意。”老貧農蔡端亮說：貫徹了這條方針（指半耕半讀），就不會有懶漢、二流子了。下中農莊任財也說：農中畢業生勞動好。過去我們一些子弟雖然讀上了中學，但是在學校閑慣了，回來不會勞動，農民子弟不會勞動怎麼行！有些學

生家長還按他們自己的要求提出意見，如學生家長、貧農莊春德說：“我家樹桐在農中高中畢業，雖然懂得一些病蟲害知識，但學得還不夠深，比不上技術站的技术員，希望今後更專一些。”此外，他們還希望農中教師平時也多到村里，不要等到有事情才上門。

來自畢業生本人的反映 一九六三年初中畢業生莊友如等說：回到生產隊，就知道讀了農中 useful。例如我們學了植物栽培、防治病蟲害，我們懂得了農作物如何種植，農藥如何配制使用，特別是病蟲害的防治，一般農民辦法很少，很多社員還缺乏常識，農村確實很需要具有農業科學技術知識的人。又如選種，我們不但與社員一樣知道如何選，而且知道為什麼要這樣選。開始我們對農中邊讀書邊勞動，不感興趣，覺得讀了農中不能升學，沒有前途；現在我們覺得農中學習的東西很適應農村的需要，農中在培養又紅又專的接班人、培養農村的新型農民方面起了作用。一九六一年畢業的莊澤惠、劉森樹等都談到這樣的體會：農中畢業生的一个最突出的地方是勞動能挑重担子，這是普通中學學生所不及的。說來也怪，同是初中畢業，年齡差不多，但好些普通中學學生身體瘦小，和農中生不同。勞動技能也比不上，如犁、耙、播種等，他們都干不來。劉森樹還舉出了這樣一个事實：他去年全年勞動得一六五個工（他所在的生產隊最高的得一八〇個工，一般的得一二〇——一三〇個工），但同隊的一个普通中學畢業生，連他受人一起，才做了一七〇個工。蔡訓政也談到，他才畢業几个月，已深深感到一个青年回到農村，如果能夠踏踏實實地工作，把學到的知識應用於實際，就大有作為。他還說：“農村需要我們，需要我們去傳播文化，需要我們去推廣技術，讀農中是很有用的。我小學畢業進農中時，爸爸媽媽都不大同意，現在却很滿意。”蔡訓政、洪篤藩、劉蘊銳等都談到他們今後要進一步提高階級覺悟，不要忘記黨的恩情，不要失去貧農子弟的本色，不要忘記念上農中是由于階級兄弟的支持和培養，並表示要下

决心在农村干一辈子，立志当个新型的农民。同时，他们也根据自己在劳动生产和工作中的感受，提出了一些意见。刘森树说：我感到不够的是学到的知识不够用。例如浸种、播种、果树移植、家畜传染病的防治等，在学校还没有学。病虫害防治学过的也不多。如水稻生白叶枯病，我们还不懂。珠算也学得不够熟练。蔡松水说：“我感到不够的是文化水平低。如语文的理解能力较差，看书有的地方不能理解。珠算、应用文、农

业技术，我都觉得学的不够。蔡训政也认为他们学到的农业技术还不够用，如水稻生白叶枯病，是后来才从报纸及有关书本上学到的。庄泽宏也提了这样的意见，他说毕业回村后，新的农业技术不断出现，光靠在学校学的东西已赶不上，在做其他社会工作中也有不少问题需要得到指导和解决，希望学校今后加强与他们的联系，继续帮助他们进修。

附表一、江东农业中学历届毕业生基本情况

类别 届别	人 数			年 龄 (毕业时的年龄)			家 庭 成 份						党团员	
	合计	男	女	平均	最低	最高	工人	贫农	中农	地主	富农	其他	党员	团员
1961年 第一届初中毕业	90	69	21	17	15	21		49	32	1	4	4		50
1962年 第二届初中毕业	16	13	3	17	16	20		7	4	1		4		4
1963年 第三届初中毕业	17	16	1	17	15	20	2	4	10	1			1	7
1964年 第一届高中毕业	23	18	5	20	19	22		16	6			1		17

附表二、江东农业中学历届毕业生工作及受奖励、表扬情况

类别 届别	工 作 和 升 学 情 况																	奖励、表扬							
	生产队长	会计员	记工员	出纳员(保管)	治安员	技术教员	民校教师	夜校及耕读班教师	农业中学教师	公社卫生员	公社广播员	县银行干部	共青团干部	劳动大学学习	参加农村社教	参军	升入全日制高中	一般社员	五好干部	五好社员	五好战士	五好团员	先进知识青年	五好教师	受大队以上表扬
1961年 第一届初中毕业	1	13	10	5		1	4	2		2	1		6	2	2	5	2	34	7	10	3	2	3	1	28
1962年 第二届初中毕业			3		1		1	1						1		2		7		1					4
1963年 第三届初中毕业		2	1					1								2	3	7			1				3
1964年 第一届高中毕业			1	2		1	3	2	1			1		8				4	1						8
合 计	1	15	15	7	1	2	8	6	1	2	1	1	6	11	2	9	5	52	8	11	4	2	3	1	43

说明：五好干部、五好社员、五好团员几项，有些队未有评，表内数字是已经评出的。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发挥 哲学課的战斗作用

——广州地区九所高等院校的哲学課教师座談紀要

最近,广东哲学学会邀請了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暨南大学、华南工学院等九所高等院校的哲学課教师,举行座談会,就如何在教学当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提高教学质量的問題,交流心得与体会,省高等教育局的負責同志也应邀参加。参加座談的同志认为,在哲学課教学中高举毛泽东思想紅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充分发挥这門政治理論課在同資产阶级爭夺青年一代,培养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中的战斗作用,这是在教学当中必須解决的根本問題。近半年多来,許多教师沿着这个方向,进行了不断的摸索。根据座談会上交流的初步經驗,主要的体会会有如下几方面:

(一)

上学期,广州許多高等院校的政治理論課程均安排了哲学課的讲授,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論》、《实践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四篇哲学著作。参加座談会的同志认为,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学生,树立无产阶级的辯証唯物主义世界观,反对資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坚持理論联系实际的原则,用毛泽东思想有的放矢地去批判和肅清学生思想中所存在的資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哲学課的教师,必須有明确的阶级斗争观念,充分发挥这門政治理論課在同資产阶级爭夺青年一代、培养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伟大艰巨事业中的战斗作用,而不能把政治理論課的作用降低为只是向学生传授一些理論知識。政治理論課教师,不但要深刻理解当前我国无产阶级和資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資本主义道路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还要具体了解学校中阶级斗争的情况,了解資产阶级通过那些渠道来影响和腐蚀青年学生,了解青年学生受資产阶级影响及其在 worldview 上的表现,了解学生的活思想,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才能在教学中的放矢地解决問題,克服教学中的教条主义和盲目性。

参加座談会的教师认为,要了解学校中的阶级斗争实际,抓好学生的活思想,就要坚持“三同”,深入学生实际,大兴調查研究之风。在上学期,許多教师搬到学生宿舍,同学生“三同”,和他們打成一片,交知心朋友。有的教师,原来以为学生很单纯,通过“三同”,深入进行調查研究以后,发现了許多学生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資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从而进一步認識了在高等学校里面,无产阶级同資产阶级爭夺青年一代的斗争的尖銳性、复杂性。有的教师通过“三同”,进一步掌握了一些后进学生的思想,并帮助这些学生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許多教师还感到:现在,我們对学生情况的了解,对高等学校里面的阶级斗争情况的了解,还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对不同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受資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特点,还摸的不清楚;对帮助不同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改造和形成无产阶级辯証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规律性还没有真正掌握,这些都是我們工作中的“必然王国”,今后必須更好地贯彻“三同”,深入实际,进行調查研究,不断地总结实践經驗,使必然轉化为自由,提高工作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

(二)

坚持理論联系实际的原则,学习毛泽东思想,就要在教学中善于启发和引导学生帶着自己思想上的問題,帶着

在参加实际斗争中的问题，到毛主席著作中去找立场、观点、方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把学到的理论落实到改造思想的实际行动中去。参加座谈会的教师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问题在于启发学生具有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自觉性，没有革命的自觉要求，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学不进去的，也就谈不上发挥学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上学期，各高等院校通过正面教育、学习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经验以及下连队当兵等活动，在这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提高了学生的自觉，取得了一定成绩。

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在讲《矛盾论》的时候，引导学生带着自己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学习《矛盾论》，批判“合二而一”论，并联系自己的思想，写学习心得。一个学期中，二年级学生共写了学术批判文章共七十多篇，二十一万字；读书笔记四百六十篇，约一百万字。通过学习，许多学生进一步认识了“合二而一”论的错误实质，并结合批判了自己“害怕矛盾，害怕斗争”等错误思想。教师们认为，这是参加现实斗争、学习理论和改造思想相结合的好方法。华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师，引导学生带着红专问题学习《矛盾论》，启发他们大胆揭露矛盾，自觉开展思想斗争。通过学习，许多学生批判了自己在红专问题上的错误思想。有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原来以为自己出身不好，红不了。通过学习《矛盾论》关于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的原理之后，放下了所谓“出身不好，就不能进步”的思想包袱，认识到一个人能否进步，决定于自己是不是愿意革命，能否同剥削阶级划清界线，并表示今后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参加政治活动，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向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华南师院政治教育系的教师，不但抓紧在校内讲课的时间，启发学生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利用下乡参加劳动的时间，组织学生带着问题学习《矛盾论》，引导他们围绕学习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辩论，通过讨论，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了认识。

(三)

座谈会上，还谈到教师本身思想革命化的问题。有的教师介绍了自己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过程中，改造思想，并用自己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体会，启发和帮助学生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解决思想问题，提高了政治觉悟的经验；许多教师也从自己切身的经历中体会到：要在教学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去学，在实际斗争中去学，首先自己要做出榜样。有的教师说，如果自己对待红专问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态度，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过程中，又不带着这个问题去学，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那也就无法帮助学生正确解决红专问题。因此，作为一个政治理论教师，必须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在参加当前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在日常的思想改造中，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不断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实现自己的思想革命化。

学术研究

一九六五年第二期（总第二十期）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学术研究編輯委员会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新华印刷厂
发行处	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訂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本刊代号：46—3 定价：每册0.50元
本刊每逢单月五日出版